

第一章 清帝国的危机

●危机四伏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838年12月26日）清晨，寒风料峭的北京城还笼罩在晨雾之中，紫禁城内一片昏暗，却又处处显得肃穆、沉静。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清皇家御林军的甲冑和刀枪在昏暗中闪着寒光，侍卫手持带豹尾纓的长枪，腰佩仪刀，排列在乾清宫门前。

清朝乾清宫的侍卫照例是由上三旗的人，即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人担任。

随着一声响亮的传唤声：“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只见身着一品朝服的林则徐庄严地向乾清宫走去。他右手紧握胸前的珊瑚朝珠，尽量地不让它发出声音，左手则提住朝服，一步一步地登上乾清宫台阶，跪伏在皇帝宝座的下面。

道光皇帝高高地坐在宝座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远道而来的湖广总督。

宽大的乾清宫内，空空荡荡，只有道光皇帝和林则徐，显得格外静寂森严。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这是道光皇帝在十一日卯刻的第一起召见。皇帝召见臣子也叫陛见，它包括引见和召见等多种。所谓的“引见”，就是由太监领着在乾清宫或太和殿的殿阶下远远地传唤一下，然后由太监唱个姓名、籍贯就算了结，一批引见的人常是数十人之多。所谓的“召见”又叫“叫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皇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面对面商议军国大事，因此又叫“应对”。召见的次序和时间都由皇帝决定。

道光皇帝此次召见林则徐，准许他跪在毡垫上，垂询达三刻多。涉及的事情几乎全是关于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和如何禁烟之事。

道光皇帝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把林则徐在九月所上的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里提出的禁烟办法和措施几乎是默记了下来，并对林则徐所提出“若泄视之，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筹饷之银”等语大加欣赏，用笔圈了又圈。对于皇帝垂询，林则徐是极其谨慎的，在从湖北赴京陛见的一个月旅程中，他反复思考了一些深刻见解，几乎都是

字斟句酌的，因此他奉答的话是平静的，措施却是十分强硬。

道光皇帝在第二、三天又召见林则徐，垂问达两刻之久。经过三天的召见，道光皇帝显然已喜欢上了这位为官清廉的南方汉人，他突然地问：“卿能骑马吗？”

林则徐微微一愣，立刻答道：“臣略会。”

道光皇帝高兴地说道：“传谕，让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

进入紫禁城，文官必须下轿，武官必须下马，这是清代的一条规定。准许臣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清代皇帝赏赐臣僚的一种荣誉。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里激动地写道：“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第四天寅刻，天刚蒙蒙亮，林则徐骑马见道光皇帝。面对一排排门卫，林则徐心里忐忑不安，他惟恐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下，因此，他紧紧地抓住缰绳。道光皇帝望着这位典型的南方人亲切地说道：“卿是南方人，不惯骑马，明天可坐肩舆。”肩舆就是轿子，在紫禁城里坐轿进宫见皇帝，这更是一种荣誉。此时，林则徐的心情十分激动，然而更使他激动不已的是，道光皇帝在当天宣布：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自此之后，道光又先后四次召见乘肩舆而来的林则徐。前后加起来，林则徐此次进京陛见，一个月

之中，道光皇帝先后召见共八次。

道光皇帝如此隆信眷顾林则徐，这几乎是清初以来“前所未有的旷典”这八次不同寻常的召见几乎都是围绕“鸦片”问题而展开这一历史决策可以说关系着大清帝国的历史命运。它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从 1644 年清军入关开始算起，到了道光时期，大清王朝已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整整五朝，已近二百年。此时大清帝国危机四伏。

在清代的皇帝中，乃至整个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中，道光还算得上是一个兢业守成的君主。他饱读诗书，恪守古训，兢兢业业，老成持重，试图用传统的方式来治理大清王朝，并以同样的标准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他力倡“天下俭为先”的做法，曾为不少人称道。据说，他平时所穿的套裤，当膝头破损时，常令人缝一圆绸盖住破处，时人称为“打掌”。道光则被人称为“补丁皇帝”。平时，他的御膳一般不过四样菜，并规定非庆典不得食肉，甚至在为皇后做生日的千秋节上，有幸赴宴的王公大臣每人也只得一碗带肉片的打卤面。他对皇子、公主的婚嫁费用也有规定，如五公主下嫁时，总计各种费用也不过 2000 两，这在当时清皇室和王公大臣中是颇节俭的。

道光皇帝勤于政务，一生并无显著政绩。在其当政的 30 年中，最为显著地莫过于前期的平定张格尔

之乱。即道光三年他任命长龄、杨遇春等人率清官兵共达 3 万人 在新疆平定张格尔等人的叛乱。直至道光八年将张格尔解京处死，可以说是道光皇帝一生中最为光辉时期。

然而在其当政的后期，麻烦事日多，整个清王朝到了此时已是江河日下，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文化科学不发达，社会问题百病丛生。

“将萎之华 惨于槁木”。这是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形容道光时期社会的名句，可以说它也是道光时代的一个写照。

就全国的总体而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构成了道光时代的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仍有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农产品，而且还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尽管在国内的东南沿海一带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清会典》记载 嘉庆十七年 全国耕地面积约有 788 万顷，其中直接在皇帝、贵族、官府手中的就达 83 万顷 占全国面积的 11% ，全国各地的官吏、地主还有大量土地，如大官僚琦善一家就占地 250 万亩。到了道光

时期，土地集中现象日益严重，“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分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广大农民“暖不号寒 半不啼饥”勉强度日的十家之中亦无三家。

加上此时吏治腐败，买官鬻爵，贿赂公行。买官又称捐官、捐纳。严格地说 捐官制度并非始于清朝，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历代统治者常以筹边、赈灾、军需等捐纳取经费，但多为一时之计，且多授虚衔。然而清代捐纳几乎是与清朝相始终。清初，始只卖虚衔并不授实职，且买官者无俸禄。康熙十三年，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需筹军费，开始授实官，捐纳制度进入新的时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 国库空虚 军费支出庞大 入不敷出 故大开捐纳 除虚衔外 知府以下实缺也可卖，只要有钱皆可买官。这种捐纳制度内涵的扩大在增加清朝政府财源的同时，也加剧了清代吏治恶化。道光皇帝明知捐纳的弊端，却又不肯贸然废除，他曾多次向有关大臣谈道：“捐纳，我总不放心 彼等将本求利 其心可知。科举未必无不肖 究竟礼义辱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嘱咐各省督抚严格考察捐纳的官员，“从严实查”而已。官场的腐败到了道光时期，已成蔓延之势，贿赂公行 政由贿成 贪赃枉法 比比皆是 这既和官员素质有关，也和清代的官俸制度及整个社会风气有关。

清代官员薪水很低，一个七品知县年俸仅 60 两银，连同政府后来发给同年养廉银也仅 250 两左右，即使像军机处的首席领班大臣等一品大员年俸也仅 150 两至 200 两左右，连同养廉银也仅 1200 两左右。这点钱既要养活官吏自己一家，还要供养官员的私属，如一个知县上任，必须自己招募三位师爷——刑钱、书吏、教读等以及部分家人，总数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这些钱必须从县官自己薪俸中开支。这对年俸仅数十两至一二百两银子的知县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清官也不够自守。地方官勒索贪污最厉害的是“火耗余羨”。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征收地丁银时，将零碎的银子按一定成色铸成整块交国库，这中间所有的损耗允许地方官提取一部分作为养廉之银。所谓“余羨”则是地方征税后在仓储和漕运过程中的损耗。这种损耗允许地方官在地方征税时按一定比例增加浮税，以弥补损耗，而地方官员借此肆意加大税收以肥私囊，并巧立各种名目，敲榨勒索。

地方官员从勒索中所得的好处，除自己享用外，还须为保住自己的位子而孝敬顶头上司。其中在夏天时的馈赠叫“冰敬”、“瓜敬”，冬天则为“炭敬”。京官外放要向原上司送“别敬银”。京官出差外地要索“程仪”。此外，下级还须向上级按各种年节、寿诞等送“节规”、“礼规”等。这些其实都是变相贿赂，用以“通声气”、“保位子”、“求升擢”和“以幸提挈”。京官、

外官，上级、下级 互有乞求 因缘为奸。

清代中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冯桂芳曾说：“廉者有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曾在道光年间任陕西粮道的扬州仪征人张集馨 在其自编的《椒云年谱》中曾提过这种情况：

“将军三节两寿 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 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 水礼两色。八旗协领八员 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两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 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陕西粮道出京留别 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件，尚不在其内。”

整个官场每天送迎客人 吃喝不停。还是以上面所说的陕西粮道张集馨为例，“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必鱼翅海参”；“每次宴会 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 总在二百金 仪程在外”；“大宴则无月无之，小宴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

地方官如此，督抚及中央大吏也如此。

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潮州，其随带物的过境扛夫多至六七百人，一连十天才将其随物扛完。其家属、随从、差役、仆从、抬夫等几千人，分住寺院及各歇宿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一住五天，实用去银两万余金。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备空虚，装备落后，士气颓靡，风气日坏，曾经驰骋疆场、剽悍威武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经过近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已成了个空架子，作战能力衰弱。

清代八旗兵、绿营兵是清王朝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属于经制兵，其中八旗兵入关后即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主力驻扎京师，建起京营各部；其二是分镇各省为驻防。据道光年间《钦定中枢朝政考》统计，八旗兵的总数为 13.3838 万人。绿营，也称营兵，也是清王朝经制兵，它除京师的五城巡捕营外，遍布各省。《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在道光年间估计全国绿营兵约 60 万左右。如果说八旗兵作为野战部队的设置，是清廷以满族驾驭、控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话，其着眼点是民族问题，那么绿营兵则完全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构成震慑，是阶级压迫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支武装力量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随着封建统治的腐败而日趋松弛、衰败。

以八旗兵而言，这是清王朝看家的命根子。它是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 1615 年即清朝入关之前已建立，它为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中国起了巨大作用，历代的清朝皇帝都以八旗兵为命脉，给予极大关注，并赋予其世袭制度等种种特权。八旗兵是世袭，子承父业，且享有免差免赋等特权，并有每月固定的俸薪，被称为“铁杆庄稼”，八旗兵也就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八旗兵所经战事日少，故士气日低，官兵中颓废已成风气。王公出征畏缩不前，有的以种种托词，如睿亲王曾以“假痘为词”不屑一顾，却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有的公爵吸食鸦片；有的公爵甚至淫其奴婢，不成者以物塞其阴户致死或裸置雪中冻死。杭州将军孚恩除吸鸦片、贪女色外，最好斗蟋蟀，凡善斗之蟋蟀无不重金购买，其癖好影响到下一代，其二子尤甚，孚恩离位之际，竟一再拖延不肯离杭。接任的杭州将军瑞征竟也如出一辙，除吸烟、贪色之外，尤爱蟋蟀，他指定衙门内置几间房专门供养蟋蟀。他还爱猫狗成癖，这些猫狗与瑞将军相处日久，瑞将军吸鸦片它们一旁借嗅，天长日久猫狗也嗜而成习，一天不嗅烟气，便尾巴下垂，精神萎靡，不蹦不跳，眼泪直淌。一天，一只野狗将一只叫琴儿的洋狗咬伤致死，瑞将军悲痛万分，饭茶不香，将狗具棺入殓，请风水先生选地安葬，还将咬死此狗的野狗抓获归案，处以极刑。整个八旗的上层骄奢淫逸，嬉戏享乐，成为风气。到了道光年间日趋严重，贪赃枉法比比皆是。下

层八旗兵吃粮当差，虽有一定特权，如固定俸薪，子承父业，世袭特权等等，其家属为无饷无差的旗民，随着生齿日繁，人口渐多，兵额有限，致使后代多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影响八旗兵的稳定和战斗力。

绿营兵虽无八旗兵的世袭制及一套特权，但此时腐败风气也十分严重，官兵吸食鸦片，开设赌场，蓄娼宿娼，其中最突出的是吃空饷。由于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吃空额来补偿。清代初期，绿营曾公开规定此种制度，此后虽在法令上废除，实际上却禁而不止，曾国藩曾尖锐批评绿营：“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之，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被人讥笑为“纸上军人”。绿营将官多出身行伍，多少有些作战经验，但清朝规定绿营高级将官在战时，往往派文官实任，或简命大将军负统帅之责，这些人往往夸夸其谈，不务实际，这就更加限制了绿营的作战能力。加上军事装备落后，刀枪箭戟还是千百年前的旧传，有的久积武库已锈蚀不堪。

正当整个清王朝江河日下之际，西方世界特别是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在欧洲，继 1566 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后，1640 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首次在欧洲大陆推翻了封建统治，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和资本主

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75 年 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 年 7 月 4 日，发表了《独立宣言》，在反对英国殖民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784 年 英国又因瓦特发明蒸汽机兴起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1789 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在欧洲一次最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其影响远及欧洲和全世界 德国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在一些生产部门和运输行业使用机器，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处于农奴制改革前夕，国内已开始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整个世界范围，欧美资本主义得到了广泛发展。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是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生产突飞猛进。进入 19 世纪后 纺织行业普遍使用蒸汽机。到了 40 年代 英国加工的棉花达 5.28 亿磅，生铁产量猛增为 13 万吨。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也发展起来，1815 年，第一艘机器轮船开始航行，1824 年 修筑第一条铁路，此后轮船、铁路被广泛使用。所有这些都使英国资产阶级在掠夺本国人民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过程中得到发展 从而使英国号称“世界工场”年出口总值达 5000 多万英镑，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居首

位。

英国国内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急剧的无计划生产，导致大批产品相对地过剩，从而迫使英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起奔走于全球，到处寻找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掠取更大利润，更好地推行商品侵略。为此他们迫切需要对外扩张以开辟新的市场，而中国则是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窥伺已久的目标。

从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政府多次用外交讹诈和武装侵略的方式，向中国提出了开埠通商和割让舟山的要求，同时，他们还于 1802 年与 1808 年分别派兵强行闯入中国广东的虎门，进行武力威胁。1825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加紧压榨国内工人阶级的同时，在国外则疯狂掠夺殖民地，中国就是他们的掠夺目标之一。他们努力推行商品侵略，还加紧进行鸦片侵略，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推动策划大规模的对华战争，阴谋用军事手段来推行既定殖民政策，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1827 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等在澳门创办《广州纪事报》公开鼓吹侵略中国。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密派林德绥（化名胡夏米）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阿美士

德”号驶往中国南海，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测绘地形，搜集情报。胡夏米还以此行所得的情报为据，拟定了一个对华作战的建议方案。

1835年，胡夏米等人还亲自上书英国政府，建议派军舰胁迫清政府，勒索补偿，并订立一份“通商条约”。

1836年，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英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109家英国公司和金融界头目参加其中活动，成为英国侵华的重要参谋部。

当然也应该注意的是，当英国在积极策划对华扩张的时候，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也在加紧对外扩张，而沙俄则通过陆地口岸进行对华贸易，不断侵扰中国的东北、西北边境。

● 烟毒泛滥

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道光皇帝几乎处于一种朦胧之中，他隐约知道一点，却又不了解大势，他似乎有所感觉却又浑浑噩噩，他力图用传统政策来挽救颓败的大清帝国，以整肃人心来解决大清王朝面临的种种危机。其结果却是，既无力解决清王朝内部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也无法遏制来自西方的

种种挑战，无法平息东南海疆日趋严重的鸦片走私问题。

早在雍正、乾隆、嘉庆时期，西方侵略者就开始骚扰中国的东南边疆，到了道光时期，麻烦事日见增多。鸦片、传教士、大炮打破了东南边疆的平静，引起了种种事端，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鸦片问题。

鸦片 植物学名罂粟，又叫阿芙蓉，俗名大烟，英文名 Opium，它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状体。作为药材，明朝的李时珍在其医学名著《本草纲目》里记载可止泻、镇静、止咳等。但它同时是一种含有大量尼古丁和吗啡，具有麻醉作用的毒品，人一旦吸食上瘾，便难以戒绝，且精神萎靡，骨瘦如柴，丧失体力，甚至毙命。

中国人最初服用鸦片，不是吸而是像吃药丸似的吞服。最迟在明代，西班牙人把美洲产的烟草带到了吕宋（今菲律宾），输入福建，中国人才开始吸烟草。17世纪中叶，荷兰人占据台湾，把烟草、鸦片等混合起来吸食，这种方法传入大陆后，才逐步流行吸食鸦片。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即以印度和澳门为基地，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数量有限，其后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向中国传入鸦片吸食方法。18世纪初期，英国向中国开始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了东印度公司制造和贩卖

鸦片的专利，对中国大量推销鸦片。从表面看，东印度公司不参与对中国鸦片贸易的走私，而只是将制成的鸦片在印度市场公开拍卖，但它实际却是那些非公司船只（散商）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的根源所在。

鸦片贸易在当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 1813 年为例，每箱在印度的成本价是 237 卢比，在印度市场的销售价为 2428 卢比，偷运到中国后，可获利为印度市场销售价的 2—3 倍。英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 300% 以上税率征税，每年高达 100 万英镑，占了英属印度政府收入的近 1/7。英国方面还将其国内生产的毛纺织品和少量工业用品等推销到中国市场，因中国老百姓对英毛纺织品和工业用品需要量少，因此英国商品长期滞销。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逆差，英国人就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来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等各种物品。

鸦片像瘟疫一样在中国泛滥和蔓延，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每年至少 200 万两银子。截止道光二十年，有人统计清王朝外流的白银达两亿两之多，造成了国库空虚，国内银价上涨，钱价大跌，引起经济生活的动荡和恐慌。

鸦片流毒问题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从雍正七年（1729 年）开始禁烟，其后乾隆、嘉庆两朝连续实

行禁烟，但却禁而不止。清廷颁布禁止外洋输入鸦片的禁令，其结果是只禁止了鸦片自传统的广州内河入口。英、美各国鸦片商将鸦片船改泊澳门，或者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在广州黄埔私售，这样，鸦片即从澳门、黄埔一带涌入国内。清廷规定的“禁止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却没有杜绝鸦片的输入。外国鸦片烟商、中国烟贩、清朝海关官员以及清朝缉毒的兵丁、清廷官吏等互相勾结，并利用被称做“长龙”、“快蟹”的特制的快艇，武装走私，加速了鸦片的输入。两广总督李鸿宾在指示巡私船收烟贩每月规银 36000 两后放私入口的同时，还不断向道光皇帝上禁烟奏折，他手下的副将韩肇庆以买放为名，每箱鸦片收银 5 元至 10 元。他们有时也拿几箱鸦片呈缴朝廷，以应付和蒙混上司，骗得晋官加级。这种状况到了道光时期更趋公开化。

● 林则徐禁烟

朝野上下关于鸦片问题形成了三派意见，一派以广东士人吴兰修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弛禁，即主张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进口，以增加税收，文武官员和兵丁不准吸食，民间吸食者一概无论；另一派以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湖广总督林则

徐为代表，主张严禁，即重治贩烟者和吸食者，以杜弊端。在弛禁和严禁两种意见的争论中，各省督抚、将军多数倾向弛禁，有 20 人；而主张严禁的只有 8 人。此外还有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一派，主张维持现状。道光皇帝举棋不定。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父林宾日是个教私塾的秀才，其母陈帙。林则徐姐妹八人，在男孩中他是长男。据说，林则徐出生时，新任福建巡抚徐嗣曾恰好鸣锣打轿从其家门前经过，因此其父便给刚生的儿子取名则徐，目的是希望儿子前程远大，像徐嗣曾一样高位显贵。这些传说当然带有神秘色彩，但林宾日这样的寒士希望儿子发达倒确实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林则徐的祖上并不是显宦，据目前所见的材料看，至少在其祖上四代里都没有任过高官的，其父林宾日虽中了秀才，终其一生仍是教私塾的穷先生。因此从史料记载看，林则徐的母亲常与其 6 个女儿从事女红、剪扎“象生花”等以佐家计，其家庭生活常处于半饥半饱之中。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一直期望儿子学而优则仕，这完全符合他的思想实际和生活目标。但必须注意的是，少年清贫的家庭生活给林则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曾亲眼见到父母宁愿自己挨饿，却将仅有的几升米接济了穷人，他也一直牢记父母“不妄取一

分一钱”的教导，加上其亲身感受的官场腐败的现实，从而使他在开始宦生涯后，能注意民间疾苦，不与贪官污吏为伍。

林则徐早年中秀才、举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后任职翰林院。道光年间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任官，先后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总督。他为官清廉，办事干练，提倡“经世致用”，做了不少兴利除弊的事，受到朝野上下的称道。其中在禁烟问题上尤为世人所注目。

从现有的史料看，林则徐在其早年任职江苏淮海道、江苏按察使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即已注意到禁烟问题。此时，他将鸦片的吸食与整肃人心风俗联系起来，提出要密访严拿开设鸦片烟馆的罪犯。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的考察，到了道光朝中期，他已看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此后，随着他在江南一带明查暗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鸦片流毒不仅在“谋财害命”，而且还给中国社会带来经济迟滞、衰落和一系列社会问题。鸦片的“害命”不仅危及吸食者本人，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而且还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因此，他在自己管辖的江苏境内，首先开始了禁烟的工作。

在江苏巡抚位上，他曾采用“熬审”的办法，对鸦片吸食者“终日不得吸食，即涕沫交流，烟瘾大发，故而以穷日力面加审讯，验其果否吸食”，以此审讯鸦

片吸食의 犯人。

与此同时，他还访问东南一带名医，以中草药之法，防治戒烟丸十余种，向民间推广，供鸦片吸食者服之除癮。

此外，他还严禁种植、贩售和买食鸦片，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他初步积累了一些禁烟的经验。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提出“弛禁”主张，挑起弛禁与严禁之争。林则徐当时恰好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到江宁办事，此后又赴清江防秋汛，办结要案，他没有参加这次论争。当他从清江返回江宁之际，已接到命其入京陛见的命令。

道光十七年（1837年）林则徐入京陛见后，道光帝命其为湖广总督。他根据在江苏的禁烟经验，继续进行禁烟的工作，要求吸食鸦片者戒烟并推广戒烟的各种良方。

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内主张禁烟的严禁派代表人物黄爵滋明确提出了“重治吸食鸦片者”的严禁鸦片的主张，锋芒直指吸食鸦片烟者和包庇走私、利用鸦片中饱私囊的鸦片受贿集团。

道光皇帝本来对鸦片的態度是游移于严禁与弛禁之间，当黄爵滋奏折提出后，面对鸦片的危害已殃及其财政和统治，因此他下令各省督抚和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各抒己见，……迅速具奏”。

林则徐在闰四月十一日接到其长子的家信和各地信函后，获悉了这一重要消息。五月二日，他接到刑部来文，立即对黄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并于五月七日复奏，提出支持黄爵滋的重治吸食、严禁鸦片的主张，并设计了六条禁烟建议：一、以尽缴烟具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二、令吸食者自新，以一年为期，以杜因循观望；三、加重开烟馆、贩烟及造烟具的罪名；四、以严于所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五、令地保、牌头、甲长等收查烟土、烟膏、烟具；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并附戒烟丸和戒烟饮法。

道光十八年七月（1838年9月）底，湖广总督林则徐在接阅邸抄后，针对道光皇帝举棋不定的心理和弛禁派反对禁烟的议论，欣然决定再上一道奏折。

林则徐在其奏折里明确指出：“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奏折十分关注，反复览阅，并在“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下面用朱笔圈出，表示重视和赞赏。在鸦片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面前，道光皇帝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决心严禁鸦片，并寄重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陛见，商议禁烟事宜，这就是本书开头所写的情景。

道光对林则徐的重召，除了因为林则徐上折支持主张严禁鸦片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卓有成效，使湖广地区禁烟运动走在全国前头。在禁烟两个多月中，除抓获大量烟贩外，还缴获了大量烟土和烟枪，仅仅汉口就缴烟土 12000 余两 汉阳、江夏两县收烟枪 1264 杆 武昌收烟枪 700 余杆 湖南收烟枪 2300 余杆 雷厉风行 远近闻名。与此同时，林则徐还采取了宽猛兼施的戒烟方针，他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鸦片积久者配制戒烟丸，服食后效果颇好，据记载：有瘾三十年者，日服一两，而断然戒也。林则徐在湖广禁烟的实际效果给了决心禁烟的道光皇帝莫大鼓舞，他期待林则徐的经验能在全国开花结果。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抵广州就钦差大臣任。

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禁烟运动已经展开。清廷在禁烟问题上形成的各个派别集团，几乎都由于道光皇帝坚定的态度而不再争议了。在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缴获鸦片 131500 余两；在广西 梧州、浔州也缴获烟土 242090 余两 云南先后缴获烟土烟膏 22000 余两，并铲去罌粟花苗地 1360 余亩；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 141 起，拿获人犯 345 人 收缴烟枪 10158 杆，甚至在清王朝的发祥地——东北的盛京（今沈阳）也缴获烟土 2400 余两。可以

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开始了禁烟的工作，尽管这些收缴的烟土、烟膏、烟具和人犯以及铲除的罂粟花苗与实际数量相差很远，但它毕竟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禁烟运动的开始，也预示着更大的禁烟风暴即将到来。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就是此时清王朝禁烟风暴的中心。他深知此行任务艰巨和广东禁烟之重要。因此，他以广州越华书院作为行辕处所，除了经常和广东的官员交换意见外，他还命人在行辕口悬挂两张告示，宣布：“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的书吏，即在公馆内给予伙食，不许借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同时宣布：“所有民间讞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关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投递。”以便集中精力查禁鸦片。

与此同时，他还分别访问了关心时务的士大夫，并借举行“观风试”的名义，召集书院生员数百人，要他们就个人所知开列贩毒的地点、毒贩的姓名，揭发官吏的舞弊情形，发表自己对禁烟的意见。此外，他还“微服私访”，深入船家、渔户和一般市民中去，收集对禁烟工作的意见和反映。

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绅的协助下，在迅速掌握了具体情况之后，林则徐立即采取了措施，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他的禁烟计划，其重点有二：一、勒令

中外烟贩交出全部现存鸦片，以打击毒贩的气焰；二、要求中外商人一律具甘结（旧时交给官署的一种保证书），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偷运鸦片，以根绝鸦片走私。

原先，一些外国鸦片商人曾认为：林则徐与清朝其他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他在广州引起的震荡，一个星期就会过去。因为在他们看来，林则徐的做法无非是向远在北京的皇帝作个样子而已。

然而，林则徐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些外国商人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二月三日（3月17日）林则徐在行辕地召集有关买办、通事（翻译）行商询问问题一直到晚间。

二月四日（3月18日）午后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州巡抚怡良，突然在行辕传见 13 洋行行商。

所谓的 13 洋行此时实际仅存 11 家，即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容有光的安昌行。其中总商是怡和行行首伍绍荣和广利行行首卢继光。行商制度，是清朝一种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制度。外国人到广州经商，必须通过公行进行。公行又称洋行，公行负责承销外商进口货物，并为外商代购出口货物，代办缴海

关之税，照料洋商饮食起居。这些公行的行商在负责对外贸易的同时，还帮助外商刺探情报、沟通官府，甚至暗中协助贩卖鸦片、走漏白银等等，从中牟取暴利。林则徐愤怒地斥责行商“只知致富由于通商，便巴结夷人为利藪，岂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你等不知感激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问及夷情，你等则多方掩饰，不肯吐露实情。试问你等良心何在，王法何在？”

在传见行商时，林则徐还将预先写好的两份钦差大臣文告发给他们，一份是给行商，另一份是让行商传给外国洋商的。林则徐大义凛然的批斥，使传见行商的场面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13行的总商伍绍荣见机立即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企图借机开脱。林则徐对此更为愤怒，他说：“本大臣不要钱，要的是你的脑袋。”在给外国洋商的公告中，林则徐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要求外国商人在三天之内向中国政府交出货船中所有鸦片，同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合同具结，保证将来不再贩卖鸦片。同时，他还鼓励行商们要洗心革面，将功补过，为朝廷尽忠。

外国鸦片贩子们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们与英国单方面任命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策划破坏缴烟。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暗中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遁，被林则徐查探截回。为了给予制裁，迫使外国鸦

片贩子缴烟，林则徐下令封锁商馆，并撤走商馆中所有中国仆役、买办。从这时起，虽然食物和用水不愁，也不危及洋人的生命，但烹调、洗衣、扫地、铺床、擦灯等琐碎事务，都得洋人自己动手，这对于那些外国鸦片商人们确是一次生活的落难。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曾以此攻击林则徐等人“囚禁”、“侮辱”甚至危及外国人的生命，但是他们无法回避的是这种所谓“囚禁”、“侮辱”恰恰是外国鸦片商人在中国贩卖毒品并抗拒执行中国法令而引起的。而且这种所谓“侮辱”和“囚禁”仅仅是撤走了中国仆役、买办，让这些洋人自己烧饭、洗衣而已。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

此后，在与外国鸦片贩子和英国官方商务监督义律的几天较量中，林则徐刚柔兼用，劝惩并施，顶住了义律等人软硬多种花招，迫使义律在二月十三日答应缴烟。但狡猾的义律在通知鸦片贩子如数缴烟的同时，却宣布所受损失将由英国政府赔偿。这样一来，他就将中国的禁烟运动和英国鸦片贩子走私毒品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中英两国政府的交涉，为对华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对于收缴鸦片，林则徐抓得很紧。二月十九日（4月2日）他宣布虎门外龙穴岛为缴烟地点，后又改在沙角炮台。他同时宣布：鸦片缴出四分之一，允许商馆雇用买办、工役；缴到半数

量 许舢板请牌 查验往来 缴到四分之三 准予开舱 贸易 缴完,一切照常。他还制定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缴烟的各个环节作了具体规定,并将贮烟地点定在东莞县镇口村(今东莞市太平镇)广东水师提督署,周围派文武官员进行看守,对于外国人所缴鸦片一箱者 林则徐建议朝廷“酌赏茶叶五斤”直到四月初 5月中旬)共收缴鸦片 237 万斤。

道光帝对林则徐等人在广东禁烟取得的成果十分喜悦 他在林则徐奏折上批“朕心深为感动 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此后 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从优议叙,并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直至四月十八日(5月30日),林则徐在广东才接到清廷所发的将烟土就地销毁的谕旨。

此后,林则徐主持的销烟工作在广东省东莞县镇口村虎门海滩边轰轰烈烈地展开。

当时 销毁鸦片方法有二 其一 以火焚化 即将鸦片拌与桐油等点火燃烧,然而烧过之后,必有残膏渗入土中,吸食鸦片者,自能掘地取土而食,十得其二三 其二 是煮化 即将烟土投入石灰、盐卤 即成渣沫。煮化较焚化科学 但须设锅灶 费物费时。林则徐与关天培等人反复磋商,摸索出挖地浸化之法,即以水池代锅,水中撒石灰代盐卤,将鸦片切下、浸泡,然后把石灰抛下,煮沸搅拌浸化,这种办法既科学又

便于大规模销毁。林则徐在广东确定采用煮化之法。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决定在东莞镇口村海滩边上建造长宽各十五余丈的方形大池，四周及池底均铺以石板，池前设一涵洞，作一排泄鸦片渣沫之网，池后通一水沟，用水车车水入池，池岸四周钉树栅栏。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陪同下，抵达虎门，监督、观看虎门销烟。

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午后2时，林则徐在怡良等人陪同下，登上礼台，在礼炮声中，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

一群群兵丁和工人先将一箱箱鸦片切成片状，投入池内浸化，然后投入石灰煮沸，浓烟滚滚，烟池沸腾，人们站在跳板上用木耙、铁锹等来回搅拌，使鸦片煮化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池中涵洞，使鸦片随退潮海水，流入大海，涵洞还穿网筛，以免大块鸦片流出。看到这一番情景，人群不禁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虎门销烟震撼人心，远近群众观看者愈来愈多，为让外国人共见共闻，林则徐还发出了告示，允许外国人现场观看。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不禁发出了惊叹：“他们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远地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道光皇帝在获悉销烟工作情况后，也情不自禁地批了“大快人心之事”六个大字。

煮化鸦片的虎门壮举，前后持续 22 天，直到 6 月 25 日才结束，除留下 8 箱作为样品运送京城外，237 万斤鸦片全部销毁。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伟大壮举，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决心和抗击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在世界禁毒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 谋划战争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要求外国商人画押具结，因义律从中作梗，使这项工作进展难度颇大。这一时期，林则徐与义律多次冲突，其中包括九龙、穿鼻和官涌六次武装冲突，虽规模很小，但都是英方失败。因此，道光皇帝在得到林则徐奏折后，作出了停止与英国贸易的决定，令林则徐将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并反对林则徐提出的“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区别对待政策，认为“恭顺、抗拒情形虽不同，究等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道光帝的这种不策略的举措，对中英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1840 年 1 月 5 日），道光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这一时期，道光帝虽也估计和预见到英人不会罢休，但在他

看来，仍不过是几只零星兵船在近海沿岸骚扰，他没有想到英国居然会漂洋过海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沿海督抚们在接到道光帝的巡查和防堵的上谕时，除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外，几乎都未认真布防，有的认为“无炮可设 无兵可添”还有的则是把早已报废的明朝的“红衣大炮”抬出，擦洗一遍，做做样子而已。除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确实是在认真布防，并在虎门设置了新的炮台外，整个清朝统治集团中，相当一批人仅认为英舰体大、转动不便，甚至认为英军只是骚扰东南沿海而已，对英军全面发动战争估计不足。

清王朝从最高统治者到朝野上下，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几乎是茫然不知，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限制着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制约着他们的精神，同时也制约着统治集团从皇帝到大臣们的脑袋，制约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思索。长时间以来，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外商与中国的贸易仅通过前面所介绍的公行。清朝的官员从总督直到州县小吏都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外商有事与政府联系要写禀帖，由公行转递，从而使一些属于平行的公函变为具有上下级意味的公文，为此中英之间闹出了许多纠纷。此外，清政府还对外商作了许多限制，诸如：不许外商在广州过冬，不许携外国女子住外国商馆，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文，限制茶叶、

丝绸出口等等。清朝政府的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当然包含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是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却并不能真正地维护国家安全，相反它却限制和束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使得中国在迅速发展世界潮流面前明显落伍了。

从禁烟运动直到鸦片战争，道光皇帝曾多次询问左右英国在何位置 英国女王 22 岁 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结婚？其夫何名？何处人？该国周围几许？其与回疆各国，有无旱路可通等。对此类肤浅的甚至可笑的问题，满朝文武大吏却无人能给以圆满的回答。

即使林则徐这样的先进人物，在刚抵达广州之时，其了解的世界知识也有许多肤浅甚至可笑之处。他以为洋人打着绑带，无法打弯，甚至他仅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看到外国人需要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即误认为外国人吃牛羊肉必得用茶和大黄打食，否则会胀肚而死。因此，他在给英国女王信函中仍说：“大黄、茶叶、湖丝皆中国宝贵之产 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等等。”这正反映了整个清王朝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闭塞。

当清王朝上上下下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之时，英国政府却清楚地了解中国。大批的传教士和商人早在明清之际即已收集了大批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特别是在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前后，一大批鸦片

商人却在印度、中国和英国策划着对华战争。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曾经写信给英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对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他还直接致函印度总督派军舰去华，并提出了对华作战的多种方案。当林则徐禁烟消息传到伦敦印度事务所，英商和逃离中国的鸦片贩子也将这一消息传到了伦敦。鸦片贩子以查顿等人为主，除了共同请愿女王政府出兵干预外，还高价聘请主要报纸来做辩护，伦敦资产阶级侵华集团“伦敦—中国协会”，还有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英克维卡和颠地等共同敦促英政府对华发动战争。一批受高价雇用的文人还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编写了不少小册子和文章，宣传英国“国旗的被侮辱”英女王所属官员和英商人被“囚禁”等等。有的文章则赤裸裸地公开叫嚣，“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战争的机会”，“不能轻易放过”。

鸦片贩子加紧幕后活动，而英国纺织工业集团的资本家也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其中 39 家企业联合上书英外交大臣。在此推动下，英国政府对华作战意图日益明显。

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1 日）英内阁会议决定对华作战，“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南海去”。此时，因顾忌国会内外反战势力，故这一秘密未能公开宣布。

九月十日（10 月 16 日），巴麦尊将作战计划发

为第 15 号训令，正式将英对华战争的決定通知义律。

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巴麦尊还将这一计划通知海军部，并发出第 16 号训令。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国会发表演说，叫嚷中国“禁烟使英商蒙受损失”对此英国政府已“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随着西南季风起，英国对华战争日趋表面化。

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兄弟二人为侵华正、副司令。同时，英国首相还发出一份致清政府的照会，要求赔偿商欠和割让岛屿等。

三月六日至三月八日(4月7日—4月9日)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进行了辩论，在野的托利党中不少人斥责和批评英国对华发动战争，有的甚至说：“我不知道而且也没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没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没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执政的辉格党则否认英政府支持鸦片贸易，而只是大谈所谓“英国受到了侮辱”等等，在他们的鼓动下，辉格党提出对华作战的决议案，终以 271 票对 262 票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第二章 国门初破

●海上狼烟

道光二十年五月下旬（1840年6月初）英国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封锁了广州湾。由乔治·懿律指挥的远征军包括军舰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载有大炮540门，除各舰水兵外，步兵约4000人。

随着战争的扩大，英国的兵力也在不断地增加，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1842年5月）英国在华侵略军实际为11个步兵团以及部分工兵、炮兵，陆军总人数12000余人，战舰达85艘，海军人数8000余人。实际总兵力为20000人。

清军方面，因为战争主要局限在粤、闽、浙、苏4省，此时4省绿营驻军额定总数约20.6万人（其中粤省6.8万人，闽省6.2万人，浙省3.8万人，苏省

3.8 万人), 4 省八旗防军 1.5 万人, 总兵力为 22 万人。在战争过程中, 清政府又从其他各省陆续抽调到粤省 1.6 万人, 到浙省 1.8 万人, 到苏省 1.4 万人, 扣除由浙省转调苏省的 9600 人 总计外省调入 4 省的兵力为 37400 人, 加上 4 省原有驻军, 总人数为 257400 余人。

从双方兵力看, 清军人数几乎是入侵者的 13 倍 在数量上有优势 但实际上 由于清军缺额大 防区分散 交通不便 调动困难 加上装备、武器落后等等, 实际劣势也是明显的。

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 年 6 月)懿律等人首先率兵攻打广州。由于林则徐等人在广州领导广大军民严密布防, 英军无隙可乘, 懿律等人遂留下 4 艘军舰和 1 艘武装汽船继续实行封锁广州湾, 其主力舰队则北上, 进攻厦门和浙江。

六月四日(7 月 2 日)英军抵达厦门海面。英舰长派人向清厦门守军投送巴麦尊致清政府书, 遭到拒收。

六月五日(7 月 3 日)清晨, 英军向清守军开炮, 企图强行登岸, 厦门守军英勇还击, 相持 3 个多小时, 英军无法在厦门登陆, 遂留下战舰和运输船各 1 艘 以封锁厦门海口 牵制福建。与此同时 英海军司令伯麦则率战舰、运输船 3 艘直扑定海。随即英主力舰等则北上, 进攻定海。

定海处于浙江舟山群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原定清军额定兵 1000 余人，实际不足 200 人，且无一艘战船，遇有战事则雇用渔船作战船。

六月六日（7 月 4 日）英军驶抵舟山，扬言要占领舟山群岛。清水师总兵张朝发派人责问英军来意，定海知县姚怀祥等人乘船登上英舰。英海军司令伯麦遂递上照会，要求中国方面必须于六月七日（7 月 5 日）下午 2 时前“献出”定海，如不投降，英军即开炮轰城。

清定海知县姚怀祥回城后，即召集文武官员商讨防守抵御英军之策，最后确定：张朝发率水师守海口，姚怀祥带兵勇保定海城。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城，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

六月七日晨，英军战舰入港。下午 2 时，海军司令伯麦下令进攻。英舰“威里士厘”号首先开炮，接着“康威”号、“鳄鱼”号、“巡洋”号相继轰击。清水师总兵张朝发率水师抵抗，后因左股受伤落水，被迫退至镇海，水师溃败。

英军在定海登陆，占领关山炮台，并向县城猛烈开炮，彻夜攻城。守城清军虽勇敢还击，无奈兵员少、武器差，加上无后援等，终被英军攻破县城。

六月八日（7 月 6 日）凌晨，英军攻破定海城东门。定海知县姚怀祥逃出北门，以“守土之义，不可以不死”而投禁宫池身亡。典史全福写了《殉难遗稟》，

在英军冲入县衙时，仍挥刀砍死一名英军士兵，后被蜂拥而上的英军乱刀砍死。

英军攻陷定海，大肆烧杀抢劫。曾参加此次侵略活动的一名英军军官曾记述了其中部分场面：

英军登岸，可怕的抢劫情景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筐，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都被收拾去了，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被可怕地割裂，被霰弹射穿。只有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才停止抢劫。

英军占领了定海县城，这是他们侵略中国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基地。在此他们补充了给养并又以此作为讹诈清廷的手段。当英军官兵占领定海县城的炮台时，发现清军使用的大炮仍是 200 年前使用的红衣大炮时，感到诧异。有的士兵则不由自主地拍着大炮的身子轻轻地吹起了口哨。英海军司令伯麦委派布尔利上校管理定海军务，伍·查克治理民事，企图长期霸占定海。

英军攻占定海后，继续北犯。

七月九日(8月6日)懿律率领战舰 8 艘抵达天津大沽洋面。

林则徐曾预料到英军的北犯，因此，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曾说：英人行为诡谲，当此南风盛发，

可能入侵舟山、上海，径达天津。并指出他们的目的是想诬蔑广东方面的禁烟活动，离间中央和地方关系。因此他建议：清廷应采取强硬措施，将赴天津的英人护送回广州，不给英人以可乘之机。

道光皇帝未能从全局考虑如何对付北犯天津的敌人，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英人来天津请求贸易，可告诉他们应去广东办理。时隔不久，他又改变主意，指示琦善，英人“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此时，道光皇帝未能认清英军侵略的本质，企图寻求妥协，失去了动员组织北方军民痛打孤军深入的英军的机会，也失去了战争初期遏制、挫败英军的时机。

直隶总督琦善是负责天津和整个河北一带防务的统帅，他对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持不同看法。当英军北犯之时，在英军气势汹汹的舰队面前，他束手无策。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天津切近京畿，……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濒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在琦善看来，抵抗英军、守卫天津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时，天津清军的作战部队有 600 余人，沿海的葛塘和大沽要口，守军编制有 3 个营。在定海陷落后，琦善担心英军北犯，已从正定、河间调官兵 1000

余人，分驻海口。与此同时，他还令张家口副将石生玉等人加强宁河县北塘防务；令清河道朱壬林、副将向荣等人赴丰润县海口。

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后，琦善遂派员赴英舰“马达加斯”号询问来意。英人马他伦狡猾地说：由于英军在广东屡遭中国军队攻击，种种负屈之处，无法上达，才来天津，要求直隶总督琦善代为奏皇上。

琦善一面派人向英军馈赠食物，一面又派千总白含章登上英舰“威里士厘”号，接受了懿律等人递上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

在这封信里，英国方面竭力攻击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是“残害诚实的英国商人”，“凌辱”“勒索”英国领事，攻击中国的禁烟使英国侨民受到重大损失，要求清廷赔偿“鸦片烟款”和“作战经费”等，并明确提出在沿海地方割让一岛或数岛给英国。与此同时，他们在信函里一方面威吓清政府，言英国水陆之师，将“封锁中国广大海口”，“拘留中国船只”。如果中国拒绝英国方面要求，必将“兵祸不断”等。另一方面，他们又将自己装扮成可怜的受害者，要求中国大皇帝“主持公道”等等。

琦善在给懿律的复照中，对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未作任何谴责，对他们提出的蛮横要求也没有反驳，反而说林则徐奉旨查禁鸦片，未能

遵照朝廷指示办事，必当仔细查明，报告朝廷。

在英军炮舰逼近天津大沽口的局势面前，清廷内部的主和派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无人敢批评道光皇帝和他的政策，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林则徐，指责其在广东禁烟“得罪”了“洋人”，致开兵衅”有的批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处置不当”；甚至还有的人别有用心地说林则徐私自接受英女王文书并私自销毁等等，把责任统统归咎于林则徐。

道光皇帝在纷至沓来的批评林则徐的奏言之中，开始动摇。尽管他也料到英国人对禁烟不会善罢甘休，但他并未想到洋人会真的漂洋过海，发动大规模战争；尽管他可能估计到洋人会在中国沿海骚扰，但他并没有料到大清王朝东南的定海等城会被英国人占领。面对定海失陷、英军北上直指天津的局势，道光在考虑新的对策。特别是道光皇帝见到琦善所呈上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后，一方面指派琦善与英军谈判，另一方面心里已开始考虑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以息英人之怒。

此后，琦善奉旨与英军代表懿律谈判，他揣摩了道光皇帝的心理，在同意惩处林则徐的同时，一再坚持“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即英人舰队必须南返。在琦善看来，这种作法既可以保住大清王朝的面子，也不致于把问题闹大。此时，英国侵略军的代表也考虑英军的实际情况，他们从好望角和

印度洋到达中国，长途跋涉，相当一批人水土不服，加上天气炎热，英军官兵中生病者增多，急需调养、治疗，因此英军代表懿律也就顺势答应了琦善的要求，南返广州。

道光皇帝获悉此讯后，颇为高兴。特别是当他看到山东巡抚多浑布编造的所谓“英人舰船南驶”途经山东时“词甚恭顺”、“俯道听命”等假话，竟信以为真，在赞许琦善“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的同时，摆出了天朝上国皇帝的架子，要为英国人作主伸冤，颁谕处罚林则徐等人。九月三日（9月28日）道光皇帝上谕斥责林则徐。九月八日（10月3日）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在道光皇帝看来，只要严惩了林则徐，给洋人出了气，恢复了中英贸易，一切都万事大吉、烟消云散。面对抵抗派包括林则徐等人此时的种种进言，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拒绝。道光皇帝此时的作法与其主张禁烟时的态度判若两人，这中间既是他对英国情况和整个世界情况漠然无知之所致，同时也有他对妥协主和派官员轻信的原因。

随即，道光皇帝颁谕琦善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国人谈判。道光在上谕中给琦善规定的原则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要以开边衅”这种原则对琦善来说，就如束手走钢丝一般很难平衡。英国人坚持要求“赔款”、“割地”，如果答应这种要求，就是违反了道光皇帝的上谕，是“失国体”反之若

不答应洋人的要求，对于贪得无厌的英国侵略者来说，必然要兵戎相见，致开兵衅。琦善进退两难。

九月八日（10月3日），琦善自北京启程赴粤。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抵达广州。同日懿律因病返回英国，副代表义律便成为与琦善谈判的主要人物。

琦善认为对英国军队想处处得胜，时时常胜，绝不可能。万一打起来，事情就不好办，只有好言相劝，方可图得平静。以“羁縻”求和平才是上策。因此他对广州防务不感兴趣，“于一切防守剿堵事宜，置之不问”，竭尽心力要在清政府能够接受的限度内，寻找同英国达成妥协的途径和办法。他到了广州，立即派守备张殿元、翻译鲍鹏去见懿律，通知他钦差大臣琦善已到广州，借此探询情况，为和议做好准备。起初，英军提出清军不得开炮轰击英船，迅速释放英俘，琦善一一照办。懿律回国后，义律提出了一个包括赔偿烟价和作战经费、重开商埠、给予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等内容极为广泛的14项要求，因为要价太高，琦善不敢报告朝廷，没有表示同意。英军便以武力为要挟，派出运载陆军的军舰，驶进虎门。英方提出中国必须赔偿烟价白银2000万两，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酌给地方，否则就要开仗。这时琦善认识到，不在赔款和给予地方两个方面作出让步，只是将林则徐革职，重开贸易，就

想了结战事，英方绝不会答应。他企图说服道光帝，对赔偿烟价和给予地方两个问题，能够有所松动。因此，他不断地把与洋人交涉的情况奏报道光皇帝，软硬兼施地劝告道光皇帝接受英国侵略者的赔款等要求，对道光皇帝施加压力。他说：目前英军势众，若与接仗，即便取胜，终非了局。英人惟利是图，而且赔偿烟价，事出有因，断难空言解释，可否以赔偿 500 万两作为谈判基础。对给予地方一节，琦善讲得比较含糊，试探地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可能引起的问题，“不得不先为之虑”，至于给什么地方好，也难选择。在没有得到道光帝指示的情况下，琦善擅自答复英方赔款 600 万两，在广州以外，再开通商码头一处。英方照会琦善，坚持要在福建、浙江、江苏三省中选择两处，作为通商口岸，并酌给寓居之所。琦善向道光帝报告说，“既据该夷改请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建议在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但“尤虑其日久计多，别添枝节”。故他只有一面奏请朝廷，一面备文答复英方，同意他们的要求。同一天，他又奏明朝廷，在浙江之英船，尽行来粤，停泊在虎门外不到十里之穿鼻洋面，兵船达二十多只。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告诉朝廷，如不同意英方要求，后果实难预料，以此胁迫清廷同意他的意见，还为他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同意英方条款的行为留有退路。

琦善的这种作法非但未能说服道光皇帝，反而使道光皇帝的自尊心受到巨大刺激。

道光皇帝原以为只要把林则徐革职，重开贸易，就可以解决问题，谁知英方却不肯歇手。此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逐步打消“议和戢兵”的幻想。他明确表示：“不但地方不能给与尺寸，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指示琦善立即停止同英方谈判，明确告诉他：所谓另辟码头和给还烟价均不准行。并决心与英一战，“断无游移”要琦善“固不可失之冒昧，尤不可稍有畏葸”。

同时，道光皇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调兵遣将，先后饬令湖南、贵州、四川 3 省共备兵 4000 名奔赴广东，令调吉林旗兵 500 名拟增援盛京，又调湖北、湖南、安徽兵 3200 名赴浙江，调江西赣镇精兵 2000 名待命。

他指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倘有英船开近浙江口岸，立即开炮，痛加剿洗。对定海之敌，一有可乘之隙，即行相机剿办。

与此同时，他还令已被革职、正在接受审查的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复出“协办夷务”等。

琦善不敢抗命，不得不在兵力上作一些局部调整，令潮州总兵李廷钰率官兵 500 名赴虎门，调顺德、增城官兵 1450 名分赴总路口、大湾头、沙尾、猎德一带。但是，他的怯战思想并没有解决。他给道光

帝的报告说广东情况“船炮不坚 兵心不固”自虎门到省城广州 180 里防线上，所筑之土炮台，每台仅容兵十余人至数十人，设置大炮数门，位置又不合适，在横档所设铁链，也阻挡不住来犯之敌。广州历任“文臣 笔下虽佳 武备未谙 现在水陆将士中 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等。就在道光皇帝调兵之际，英国侵略者已决定在广东发动军事进攻，以迫使进退两难的琦善彻底屈服。

义律获知清廷的态度已经变化，想在谈判桌上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已不可能，便照会琦善，一切战后再商。所有战船张挂红旗 战事即将再起。可是 琦善仍在给英方的复照中说，办理不当之臣已经革职，英方所提各款，已逐项代为筹措，若再行滋扰，一切将化为乌有，要英方三思。当英军向虎门发起攻击后，他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841 年 1 月 28 日）一连发出三份奏折，建议朝廷，由英方还我定海、沙角，我方则仿效澳门，允许英国人在香港泊舟寄居。正月初十日（2 月 1 日）琦善又上书历陈我军不堪一击，说广州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各司、道、府、州以及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都认为目前广州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琦善公然声称，他不愿再执行朝廷的指示。说他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朝廷旨意，同一有罪。获咎于未合朝廷旨意，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可借保平安；如获罪

于打仗之未能取胜，损天威而害民生，今后办理中英后事，更无从措手。并随折附送义律要求重开贸易、驻兵香港之照会。道光帝申斥琦善甘愿受人戏弄，迷而不返 胆敢违背谕旨 接递“夷书”代逆恳求 是何肺腑？甘为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 朕不惧焉”，下令将琦善革职查办。

1841年1月17日，英军集中大小兵船20余只，1500余人，分两路猛烈进攻沙角和大角炮台。右路由船长荷伯特指挥“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尼”号和武装轮船4只，攻打沙角；左路由船长斯哥德指挥“萨马兰”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进攻大角。据守沙角和大角的清军不足2000人。上午8时许，英军兵船先用大炮猛烈轰击沙角炮台的正面，登陆部队绕到山后，由穿鼻湾登上沙角炮台。守台清军600多人，在前后夹击下，用刀矛枪箭同敌人近战格斗一个多小时。副将陈连升屡经阵战，作战中身先士卒 身受重伤 不下火线 誓与阵地共存亡。他嘱咐他的儿子陈举鹏，护送关防回营。陈举鹏不肯丢下伤重的父亲，坚守战斗岗位。陈连升牺牲后，陈举鹏投水而死，父子双双壮烈殉国。千总张清龄也同时牺牲，守备程步韩受伤，士兵伤亡过半，沙角被英军占领。大角方面的战斗打得也很激烈，炮台前的护墙和山后围墙，被打塌数处，打断6门大炮的炮耳，火药局被炮击中，爆炸焚烧，烧及营房。守台千总黎志

安，受伤数处，当英军快要占领大角之际，他为了不把大炮留给敌人，督领官兵，将完好的 14 门大炮推落大海。清军扼守三门口的兵船 10 只也遭到英舰攻击，或被击沉，或被打坏，士兵大都伤亡。此次战斗，清军阵亡军官 9 人，负伤 35 人；阵亡士兵 283 人，伤 428 人。英军伤亡 38 人。

面对兵衅又开的局面，琦善向英军乞和。英军坚持赔款、割地的要求，并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穿鼻条约》，提出了割占香港岛、索要赔款烟价 600 万元和恢复广州贸易等。这个条约既未经清朝道光皇帝批准，也未经琦善签字，实际是无效也是不能成立的。英军也就在此后 6 天，强行占领香港岛。

香港岛是香港地区的一部分，位于广东珠江口的东南。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个部分，总面积约 1092 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香港在秦汉时期辖属南海郡，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 年）始置宝安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为东莞县，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香港又从东莞县分出，设新安县直到清代。

香港的名称最初只是一个村庄的称呼，后来逐步成了香港岛乃至整个香港地区的称呼。其来源有许多动人的传说，概括起来至少有两种：

其一，因为香港属东莞县，东莞土产的莞香，一向由东莞运至九龙，再从九龙至沿海各省以及南洋

和日本，作为香料集散地的港口，因此叫香港。

其二，香港岛有一条流入大海的河，河水清澈香甜，当地人叫它香江，香江入海处的港口，也因此称作香港。

此外 还有将香港称做‘大潭’、‘赤柱’等种种说法。今天，我们不去考察哪个说法正确，但第一种说法告诉了人们一个事实，即香港很早就是中国神圣领土，是中国东南沿海海运贸易的枢纽，同时它还是拱卫广东珠江口的重要堡垒。

英军强占香港岛，是资本主义列强以欺诈手法掠夺殖民地的一个例子，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给自己涂脂抹粉 把自己的侵略行动说成是‘合法’。义律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代表。他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耍了狡猾的伎俩，为了制造英军合法占领香港的舆论，他将未经签订的条约说成已签订，将他与琦善尚在讨论中，还未形成共识的各种意向，说成已形成之本，并抓住琦善胆怯和模棱两可的弱点，迅速出兵，通过军事占领将此变成事实。

清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这是英军以武力占领香港岛的日子。

英军占领香港后，由于定海方面英军物资供应困难，人员生病、伤亡，加上定海人民对英军激烈反抗以及英军又急于想用定海换回被俘的安突德上尉和拿布夫人等，因此英军决定撤出定海。道光二十一

年正月十五日（1841年2月6日），英军撤离定海，南下广东。

琦善与英军在广东紧锣密鼓谈判之时，道光皇帝从琦善呈上的奏折中，知道了英国坚持要求割地、赔款和增开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特别是在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的态度又有了变化，原先他对与英国人谈判还抱有希望，而此时他已不再犹豫，下决心中断谈判。他一面大骂琦善“丧尽天良”，一面决定对英大申挞伐，重兵剿办。正月初五日（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这是清廷在英国侵华一年多后才采取的重要步骤。他决定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广东作战，在此之前道光陆续调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江西5省近万名官兵到粤，会同广东军民防堵。

正当道光皇帝调兵遣将，并促奕山迅速赴粤之时，正月初四日（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稍事休整之后，又发动了侵占虎门之战。

义律急于在清军从外省调兵增援之前拿下广州，便立即谋划攻占虎门。他先派出兵船5只、小舢板3只，闯到下横档后山侦察水情。随后，英军调集10只兵船、3只武装轮船，于二月六日（2月26日）包围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派出部分兵力堵截清军各路援军之水道。早晨南风盛发，英军集中兵力对

横档和永安炮台发起攻击。守台副将庆宇、达帮阿、刘大荣等，督率官兵奋力还击，上午 11 时左右清军官兵力竭，英军登陆，两台失守。清军阵亡二百五十余人，伤百余人，被俘千余人。当天上午英兵船“伯兰汗”号、“麦里威尔”号、汽船“皇后”号等合击虎门靖远、镇远、威远和巩固 4 座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坐镇靖远炮台，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指挥部队发炮还击，给英军以重大杀伤。在许多官兵伤亡之际，他亲自燃点火炮，轰击敌人，自己数次身中敌炮，遍体鳞伤，士兵把他负在肩上撤出阵地，关天培坚决不同意，仍在指挥，胸部又中一弹仍久立不倒。虎门天险的靖远、镇远、威远和巩固 4 座炮台先后为英军占领。关天培是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清朝第一位高级将领。

二月十三日（3月5日），主持广东战争的参赞大臣杨芳驰至广州。杨芳是清道光时期著名的将领，曾参与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和平定张格尔之乱，他到达广州无疑给清朝官兵增强了信心。杨芳巡查了广东前线，看到南海海面上英舰急驶如飞，炮弹准确命中，感到颇为纳闷。他思考再三，考虑到广州城大兵单，宜近守不能远攻，故备塞河竹排，每排添置大木桶 20 个，内贮棉絮，洒上毒药，浸透桐油，上盖稻草，乘东南风起，顺水迎烧英船。当时有些人斥责杨芳是用“邪术”破敌，后世的学者以此为据，将此

事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应指出和澄清的。从总体情况看，这一时期杨芳主持广东战事，较琦善时情况有了好转。

靖逆将军奕山在道光皇帝一再催促之下，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到达广州。其一味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患不在外而在内”致使广东战事毫无起色。

英军四出袭击，并占据了广州城北的制高点四方炮台，奕山等人一筹莫展，四月七日（5月27日）被迫与英军订立了《广州和约》，以600万两赎回广州城。同时，奕山还以瞒天过海的欺骗手法，向道光奏报讳败为胜。道光信以为真，以为万事大吉，甚至开始下令沿海各省撤兵。

●三元里抗英

《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城北郊三元里一带焚烧民房、抢劫财物、杀害居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特别是英军在城北轮奸一妇女后，村民愤怒至极，打死英军多人。翌晨，英军大批人马开到，企图报复，广州郊区人民忍无可忍，在当地士绅和义勇等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抗敌。

四月九日，广州北郊士绅、义勇和社学领导人在

南海、番禺的牛栏岗歃血为盟，103 乡群众响应，决定以“三星旗”为号；“旗进人进 旗退人退”。

四月十日拂晓，103 乡万余名群众聚集在英军占据的高地附近，伺机出击。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伪装撤退，把英军引入早已设伏的牛栏岗一带，英军察觉上当，正拟回军之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数米以外难以见物，英军毛瑟枪被雨淋湿，无法打响了。只听一声锣响，几千名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起，他们“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重重叠叠，遍地野山”；“将夷兵围在核心”。在滂沱大雨中，英军进退两难，即使想逃也无法逃脱，成千上万的群众将英军分割包围，展开肉搏战。英军不得不把官兵集中起来，组成方阵以度过难关。

四月十一日上午，广州附近 400 余乡的义勇也起来参战，数万名群众喊声震天，到处军旗飘扬，英军面临着灭顶之灾。义律特派向广州知府余保纯等求救，余保纯请示两广总督祁埏。此时，祁埏等人不敢抗击英军，遂派余保纯等人拿着白旗，带着南海县令梁星源和番禺县令张熙宇，利用威胁和欺骗的手法，要求领导 103 乡人民斗争的士绅、义勇和社学领导人放英军出围。

狼狈不堪的英国侵略军在余保纯等人保护下，才灰溜溜地逃回四方炮台。

广州人民随即发布了《申喻英夷告示》，宣布：“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可杀尽侵略者，充分地表达了广东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决心和意志。

● 战火再起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政府获悉了义律单方面公布的所谓《穿鼻条约》，认为所得权益太少，决定撤消义律职务，改派璞鼎查为英国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璞鼎查到达中国澳门，随即偕海军少将巴加、陆军司令卧乌古少将率领军舰 26 艘以及陆军 3500 人北犯。

英军此次北犯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厦门。

厦门为福建咽喉门户，它远控台湾，近接金门，是福建的军事要地。闽浙总督颜伯焘对厦门的防务密切关注。他在厦门外围屏障嵵屿、青屿、大担、小担 4 岛以及嵵屿以北的白石头、安海、水操台、头巾礁、鼓浪屿等重地，共设大小火炮 279 门，配置水陆官兵 2800 名。安海汛以东的曾厝垵，白石头西北的河厝乡，皆有沙坡，便于敌人登陆。厦门以北的五通汛，以西的高崎汛，舢板可驶入，以上各处均安设大炮。

100 门，部署官兵 1400 名。在高崎汛派出哨船 10 只，官兵 300 名，在江面拦截。全岛共有水勇、练勇 9000 余名，供随时调遣。水师提督奕振彪驻守厦门。

七月十日（8 月 26 日）英军致书奕振彪 要他让出厦门，否则就要开火。当时，奕振彪出海巡缉海盗，当英军进犯时，他逾月尚未归来。颜伯焘督率兴泉永道刘耀春据守白石头一带，传令屿仔尾、鼓浪屿守将，三面夹击来犯之敌。下午 1 时，英军集中北犯兵力，采取攻破一台再攻一台的战术。守台官兵英勇抗敌，驻水操台总兵江继芸身先士卒，持刀追杀上岸英兵，落水牺牲。副将凌志同登岸之敌展开肉搏，杀退前敌，后敌又冲了上来，他重伤力战，被英军割首剖腹，壮烈牺牲。都司王世俊和凌志一起遇难。水师把总纪国庆、杨肇基、李启明临危不惧，也先后战死。游击杨靖头部受伤，率领士兵多次杀退登岸之敌，又被英军用刀砍倒在地，经士兵抢回获救。厦门之战，仅水操台一地清军阵亡士兵 33 人，受伤 370 人 清军不支而退 厦门陷落。颜伯焘、刘耀春退居同安。七月二十日（9 月 5 日）英军洗掠厦门后退守鼓浪屿，留下 500 余名士兵、3 只军舰和 3 只运输船，其余兵力转移浙江。

浙江定海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四日（2 月 24 日）收回后 郑国鸿、王锡鹏、葛云飞 3 位总兵率官兵

3000 人开赴定海，共同防守。

两江总督裕谦亲自指挥浙江对英作战。他将分散在镇海一带的 1800 名原定海官兵，调回定海。此外又调去外地官兵 800 名，定海防守的总兵力达到 5600 人。另招募水勇 1200 名，配备 16 桨快船数百只。在东岳山构筑 400 米炮城一座，在该山南侧修建 60 米月城一座；自青垒山至竹山脚下横筑 5000 余米土城一道，在晓峰岭、青垒山、无样山、锁山等高地各筑瞭望台，安设炮位。

定海原有大炮 50 门，裕谦又调来新铸 2000 斤大炮 10 门、1000 斤铜炮 10 门，还将他从河南带来的抬炮调出 100 杆，交由王锡朋编练。

与此同时，裕谦还指示江南候补知府黄冕、宁波知府邓廷彩、定海石浦同知舒恭受做好民众的救济和抚恤，发给每人三个月口粮，对烧毁的民房，发给补助银两，尽快构造，及早复业。仅用四十多天时间，逃散居民大部回归，秩序正常。

八月十二日（9月26日）下午，璞鼎查、巴加等指挥战舰和武装轮船，乘潮水闯入定海竹山门，葛云飞指挥守军向敌舰突然开火，击断头船桅杆一根，敌船窜出吉祥门，绕人大渠门。游击张绍廷在东港浦土城督率官兵，迎头轰击，敌舰逃跑。十四日（28日），英军以战舰“摩底士底”号、“哥仑拜恩”号和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攻晓峰岭，先向清军前沿阵地猛烈开

炮 300—400 发。清军士兵隐伏于山后岩石之后，英军登陆没有成功。十五日（29 日）英军再犯晓峰岭，在炮火掩护下，乘坐舢板，在竹山碇登陆。总兵郑国鸿督率官兵，用大炮猛烈轰击，又将来犯之敌打退。当天下午，英军攻占了定海南三里许的五奎山，架设大炮，轰击东岳山之关山炮台。十六日（30 日）英船从吉祥门进犯东浦港，清军坚决反击，敌船不敢接近。十七日（10 月 1 日）拂晓，英军武装轮船“复仇神”号、“皇后”号再犯东浦港，“威里士厘”号、“巡洋”号、“哥仑拜恩”号仰轰关山炮台。上午 10 时许，英军乘坐运兵船进犯晓峰岭。王锡朋首当其冲，督率官兵 800 人迎战来敌。官兵义无反顾，前队阵亡，后队冲上，打退敌军数次攻扑。王锡朋一腿被打断，坚持指挥，英勇牺牲。官兵伤亡甚众，所存无几。英军占领晓峰岭。接着，英军进攻竹山门炮台。郑国鸿率领官兵顽强抵御，中炮阵亡。英军再攻关山炮台。葛云飞身先士卒，指挥官兵，奋勇杀敌，展开激烈肉搏，葛云飞伤 40 余处，直至弹片穿胸，壮烈牺牲。定海恶战六昼夜，终于再度落入英军之手。

英军占领定海后，即拟攻占镇海，以控制浙江海域。

镇海位于甬江北岸，招宝山雄峙海口，金鸡山在甬江南岸，和招宝山互为犄角，甬江口外十余里处，笠山、虎蹲、蛟门诸岛为镇海之屏障。镇海清军总兵

力为 4000 人，招宝山由游击张从龙带兵驻守，提督余步云统领清兵驻守招宝山下的东岳宫。东岳宫西的拦口埠炮台，由总兵李廷扬率兵驻守。总兵谢朝恩、候补知府黄冕驻守鸡金山。海口两岸密排火舟，伏有水勇。裕谦督领宁绍台鹿道长、镇海知县叶堃坐镇镇海县城。

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8 日）英军从定海开进到镇海途中的黄牛礁。二十五日（9 日）晨英军的舰队进泊镇海口外。二十六日（10 日）黎明英舰“复仇神”号载官兵 400 余名在甬江南岸登陆，汽船“弗莱吉森”号载官兵在小港口登陆，夹击鸡金山炮台。总兵谢朝恩正在指挥官兵开炮轰击，被敌炮击中，落海牺牲。清军英勇还击，短兵相接，伤亡较大，鸡金山终为敌人所占。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汗”号猛烈轰击招宝山炮台，汽船“皇后”号、“复仇神”号来往接应，上午 11 时许英军 700 余名在招宝山麓登陆，另一部分用小舢板绕至招宝山后，攀援而上，仰攻威远城堡，清军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裕谦亲临第一线，在镇海东门督率官兵，点炮轰击敌人。在激烈战斗中，提督余步云擅离北岸，两次登城，请求裕谦派人求和，裕谦不为所惑。余步云临阵脱逃，退守上虞。英军从东城缘绳而入，城破，清军溃乱。裕谦见大势已去，望阙叩头，跳入泮池殉国。裕谦是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清军职务最高的爱国将领，清军阵亡官兵

1000 余人 英军被打死 16 人，受伤甚多。

英军占领镇海后，海军司令巴加乘汽船“复仇神”号溯甬江而上，八月三十日（10月14日）占领宁波。

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英军攻打余姚 同日入城，抢掠谷仓和财物后，返回宁波。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2年1月10日）英军进攻奉化 入城劫掠 翌日 撤离奉化回宁波。

道光皇帝面对英军大举北犯，特别是获悉浙东诸城失陷的消息后，极为震动，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

九月四日（10月10日）道光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同时再次调集河南、陕西、湖北等省精兵，总计 13000 人赶赴浙江。并指示浙江巡抚作好浙东作战的后勤供应。

道光皇帝寄厚望于皇侄奕经，企望这位扬威将军能扬大清国威，将英军赶出浙江。而这位奕经却视君命、军令如儿戏 从北京南下，一路游山玩水 勒索供给，历经三个月，直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1842年2月10日）方抵杭州 继驻绍兴。为了向道光皇帝交差，他在对英军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以“占卜”得虎头之兆，据此制定了收复镇海

宁波、定海的三路出兵计划。他按照十二属相和地支的顺序，即“虎”与“寅”相应，与幕僚们商议选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时间定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寅刻（1842年3月10日凌晨3—5时）发动进攻，并找到了名生肖属“虎”的总兵来当指挥，将整个计划定名为“五虎制敌”。清军三路进攻的总兵力达12000人，加上从各地招募的水勇约20000人。进兵分成三路：

东路：攻击目标为定海，由海州知府王周宾驻乍浦总办一切，以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为先锋，率兵2000人。

中路：攻击目标为宁波，由总兵段永福等率川、浙、冀等省1600名官兵聚集在大隐山一带，游击张富率官兵800余人为预备队。

南路：攻击目标为镇海，由副将朱贵、侍卫容照等督率陕、浙、豫、甘、西宁、汉南官兵1400人聚集在慈溪西北长溪岭一带，游击黄泰率500名官兵为预备队。

文蔚为前敌总指挥，统领苏、皖、川、晋等省官兵2000人进驻长溪岭一带，指挥对镇海和宁波的攻击。

奕经统领豫、晋等省兵丁1300人进驻曹娥江，指挥全局。并以特依顺统领鄂、陕、甘等省1300人为后援，山西官兵1000人守护粮台。

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凌晨，中路清军准时对英军发起攻击。总兵段永福率部由大隐山向宁波开进。都司李燕标带领乡壮，先行潜赴宁波南门，由城内接应引导入城，歼灭守门之敌，进城后直插英军守将驻守的府署。府署大门紧闭，清军即用抬炮轰击，英军开门冲出，在两边高楼上施放火球火箭。清军不支而退，堵塞道路，使后续部队无法前进，不战而乱。段永福率四川官兵和河北壮勇进抵宁波西门，城门洞开，城内火起，误以为敌人已经溃败，令部队冲入城内，接近城墙时，触发地雷，中敌埋伏，伤亡较大。游击黄泰率官兵500人，进攻南门，遇敌于紫薇街，激战两个多小时，因无后援，伤亡较大，被迫撤出南门，清军即撤出宁波。此战清军伤亡500—600人，英军也受到重大杀伤。

攻击镇海之清军，由都司刘天保、聂定楷率河南、河北壮勇从长溪岭出发。拂晓，得内应攻入西门，英军早有准备，向进攻之清军猛烈射击，清军被击退。主攻部队由朱贵率领，取道慈溪攻击镇海，因黑夜不辨路径，误入风浦岙，第二天中午前后，方始赶到镇海城外骆驼桥。这时前军已经败退，众官兵埋怨朱贵故意不救，朱贵无法再战，只得回兵大宝山营地。金川守备哈里克率部攻击镇海招宝山炮台，官兵冒着敌人炮火，迅速冲入威远城堡，英军在江中用大炮仰攻，哈里克部被迫退下山麓。

二月四日(3月15日)英军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率1200余人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溯江而上,向清军反扑。午前,约有400—500人在大西坝登岸,进犯慈溪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大宝山。副将朱贵亲挥红旗,率领官兵500多人英勇抗击。他的右臂打断,左手再执红旗,继续指挥,颈部又中火箭,壮烈牺牲。朱贵子朱昭南代父指挥,父子双双蒙难。在激烈的白刃战中,官兵伤亡400余人。前敌总指挥文蔚屯兵长溪岭,距大宝山只有20里,却未发兵及时救援朱贵。大宝山失落后,文蔚仅带数人狼狈逃跑,部队不战自乱。

东路攻击定海的战斗,由知州王用宾和泗州知府张应云协定,令郑鼎臣潜伏岱山。英军发现清军意图后,遂派“复仇神”号攻击岱山潜伏的清军,清军伤亡50人,被迫撤退。

浙东战场,清军的失败给了英军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反攻,结果定海、镇海、宁波不但未收复,反而丢失了慈溪。奕经等败退杭州,不敢再战。

四月九日(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进入长江口。

浙江前线战事,是中英战争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先后投入兵力11500人,乡勇22000人,花费银子164.5万两。经此失败,道光对抗英已

完全丧失信心，他无可奈何批谕：“朕之忧愤苦哀，将对谁言之，惟有仰叩天恩，敬祈祖佑，加护大清。”

浙江战事之后，英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调动足够的陆海军，占领足以切断中国内陆主要交通线的一个据点，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英国侵略军把他们的目标选在了长江下游的江苏镇江，而上海宝山县的吴淞则是由长江入外海的门户，是英军进攻镇江的必经之地。

吴淞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江南提督陈化成，吴淞清军的总兵力约有 8000 人。从吴淞到宝山县城两岸安设火炮，其中西岸为设防重点区，安设大炮 154 门，由陈化成督率官兵 1000 余人镇守；东岸安设大炮 27 门，由总兵崔吉瑞等率官兵 500 余人防守。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八日（1842 年 6 月 16 日）上午，英军进犯吴淞，他们以战舰攻打清军炮台，掩护舢板打清军。炮台守军英勇还击，英旗舰“汗华丽”号被击中多次，其他船舰也被多次击中。在英军密集的炮火中，江南提督陈化成面对敌人毫无惧色，手执旗帜，身先士卒，指挥炮兵坚决打击敌人，身上多处受伤，他拔出佩刀，坚持作战，腹部又中弹，最后壮烈战死。

第二天，英军乘兵船溯黄浦江而上，分水陆两路进犯上海。上海道巫宜契、知县刘光斗早已逃离，典史杨庆恩投水而死。英军进入上海，勒索赎城费

100 万两 只缴了 50 万两)

五月二十八日 (7 月 6 日) 英军自吴淞向长江下游城市镇江进犯。

六月五日 (7 月 12 日), 达江阴; 六月七日 (14 日) 至圖山; 十三日 (20 日), 英军全部抵达镇江城下; 十四日 (21 日) 拂晓 英军进攻镇江。

英军进攻镇江的海军官兵 5100 人, 各种兵舰、船只共 73 艘 编成 6 个纵队:

先行纵队: 有军舰 7 艘 武装轮船 5 艘。

第一纵队: 有战舰、武装轮船各 1 艘 运输船 10 只, 由古柏舰长指挥;

第二纵队: 有战舰、武装轮船各 1 艘 运输船 10 只, 由胞诅舰长指挥;

第三纵队: 有运兵船 2 艘, 运输船 10 只, 由孔木舰长指挥;

第四纵队: 有战舰、武装轮船各 1 艘 运输船 13 只, 由革雷舰长指挥;

第五纵队: 有战舰、武装轮船各 1 艘, 运兵船 2 艘 运输船 8 只, 由凯培尔舰长指挥。

参战陆军 6900 人 组成 4 个旅:

炮兵旅有官兵 600 人, 由蒙哥马利陆军中校指挥;

第一旅有官兵 2300 人, 由萨勒顿少将指挥;

第二旅有官兵 1300 人, 由叔得少将指挥;

第三旅有官兵 2150 人，由巴特雷少将指挥。

清军在镇江的守军，城内有驻防旗兵 1200 人，青州应援旗兵 400 人，城外有川、桂、赣、鄂等省官兵 2900 人。全部守军约 4500 人，驻防旗兵副都统海龄是镇江的最高指挥官。

英军在镇江的进攻，遭到清军顽强抵抗。英第一旅和部分炮兵攻击镇江西城。英第二旅攻击北城。英第三旅包抄镇江之西南。城外清军稍抵抗，就败退到镇江东 45 里的新丰镇。惟有镇江副都统海龄，临危不惧，率领八旗官兵，孤军奋战。英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冲开西门和南门，蜂拥而入，守城官兵用极其原始的武器，同敌人顽强搏斗。协领多连统率 400 名山东青州满兵，与英军巷战，伤亡十之八九。海龄见大势已去，便和自己的妻子、19 岁的次孙，自缢尽节。英国侵略者占领镇江后，大肆蹂躏，使繁华的镇江成了一片废墟、一座死城。

●下关签约

英军占领镇江后，除留下第二旅和部分炮兵约 2000 余人屯驻镇江北固山外，其余人员由璞鼎查等率领，船队于六月底（8 月初）驶抵南京下关以西草鞋峡江面。

此时，道光皇帝精神全线崩溃，对各种设防、抵抗建议他仅批谕：“一谋弗展，奈何！”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谕：“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

七月初（8月上旬）道光皇帝宣布对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与英人谈判。中、英双方曾两次会晤于南京下关静海寺和上江考棚内。

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上午11时，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等人，在英舰“汗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又名中英《江宁条约》全文十三款，主要内容有：

- 一、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 二、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 三、赔偿英人鸦片等费用2100万银元。
- 四、协定关税和取消公行等。

八月二日（9月6日）道光皇帝批准中英《南京条约》。据史载，《南京条约》文本送到北京的当天，道光皇帝彻夜未眠，独自一人在殿阶上踱来踱去，前思后想，别无良策。战打不过洋人，和心又不甘，直至五更响起，道光才返身入大殿，草草书写一纸“着俱照所议办理”，才算了却了这一桩心事。

此后，中英双方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税则》和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英国侵略者又从中分别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清王朝来说是十分惨痛的。大清帝国被迫向英国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以及废除公行制度等等。可以说，实际上标志了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它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随之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在这中间，它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在道光皇帝一生的最后 8 年中，麻烦事一桩接着一桩。其中既有来自国内的如天灾、民变等等，还有来自国外的洋人入侵，纠纷迭起。从美国人强迫清廷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到法国人强迫清廷订立中法《黄埔条约》，清廷再度丧失大量的主权。道光皇帝心中十分不畅快，却又无可奈何。但鸦片战争中，清廷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奇耻大辱，却是道光皇帝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幕。

而特别使道光皇帝感到痛苦的是，他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被迫同意割让香港岛。甚至直到临死时，道光皇帝仍耿耿于怀，他在临终遗诏中明确宣布：“朕万年后，断不行郊祀孝配之礼，以免诬朕不德不孝。”

据说，清代祖制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圣德神功碑”，这个说法至今未见有关条文。但是，道光皇帝因在鸦片战争中割让了香港岛，死后却一直未建“圣德神功碑”，确是一个历史事实。

清朝皇帝的陵墓多数是生前建造，道光皇帝的墓地也是其生前选定并营造的，历时 4 年才完工称为慕陵。

清代皇帝的寝陵主要分布在辽宁和河北，其中在东北盛京（今沈阳）有福陵、昭陵和永陵，分别葬努尔哈赤、皇太极和清远祖。而在河北的则主要是入关后的皇帝的陵墓，其中：顺治皇帝、康熙皇帝葬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称为东陵；雍正皇帝、嘉庆皇帝葬在河北易县永宁山，称为西陵。道光皇帝原先选了东陵宝华峪，后因地宫出水，遂决定改在河北易县永定山下龙泉峪，位于西陵最西边，称为慕陵。

清代皇帝寝陵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有一定的规制和相当的规模。其主要建筑物的先后次序是：圣德神功碑、五孔神路拱桥、石望柱、石像生、龙凤门、下马牌、神道碑亭、三路三孔券桥、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玉带桥、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玉带桥、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此外还有神厨的井亭，等等。道光皇帝的慕陵是清代陵墓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它没有按规制建，它没有圣德神功碑，也没有石望柱、方城、明楼等建筑。

应该说，所有这些重要的建筑，道光皇帝都把它们取消了。他立下遗嘱：“朕万年后 著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阴即可镌刻陵名。……断不可于五孔桥南别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树立 碑文亦不可以‘圣德神功’字样率行加弥。”其悲痛心情溢于言表，可谓是遗恨终天。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道光皇帝病重。十四日（25日）他召集宗人府、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等启秘匣宣示御书：“皇四子为皇太子”。当天，道光皇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终年69岁。

正月二十日（3月3日）在紫禁城正式颁发遗诏 宣诏天下。

清廷的一位官员曾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上奏道光皇帝 指出：“国威自此损失 国脉自此伤矣，国贼自此生心矣，边疆从此多事矣。”

“从此多事”这句话 确实是不幸而言中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在蒙受奇耻大辱的同时，从此开始进入多事之年，江河日下，摇摇欲坠。

第三章 无力补天

●咸丰登基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道光皇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訢升太和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此时奕訢刚20岁。

道光皇帝共有19个子女，其中10个女儿，9个儿子。在9个儿子中，奕訢排行老四。道光皇帝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次子奕纲只活了2岁，三子奕继也只活了3岁，由于前三子早就离开人世，而七子奕譞7岁，八子奕詝3岁，九子奕詝2岁，皆年龄尚幼不占优势，加上五子奕詝已过继惇亲王为嗣子，因此，在道光晚年考虑立储范围的仅有四子奕訢和六子奕訢。两人年龄相差仅1岁，道光皇帝心中喜爱的是六子奕訢，但考虑到四子奕訢是兄长，加上其母是正宫的全皇后，故道光权衡再三，长期未能决定。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奕訢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其生母静皇贵妃在道光后妃中的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皇后，加上正宫全皇后去世多年，静皇贵妃摄六宫之事，又担负起养育奕訢的担子，很得道光皇帝信赖，这对奕訢来说得天独厚。加上奕訢本人善骑射，才华横溢，确实是道光皇帝考虑的太子对象之一。

但是他与奕訢相比的劣势也很明显。奕訢是正宫全皇后所生，这在正统观念占主导的清代，嫡庶之别是有严格的界限的，道光皇帝又是一个恪守封建传统的人，要他突破传统观念困难很大。道光即使偏爱六子奕訢，但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奕訢本人书法、绘画皆有所长，且饱读史书，恭谨内敛，工于心计，年龄上大奕訢一岁，相对成熟一点。加上奕訢的老师杜受田等人在其周围形成的智囊团，也对奕訢继位起了一定作用。

据史载，道光皇帝在立储前，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行了一次南苑打猎，诸皇子中奕訢收获最多，顾盼自喜，奕訢根据老师杜受田指点授意，默立一旁，垂手侍立，未发一箭。道光问其原因，仅答：“时值春季，鸟兽哺育，不忍伤生。”这种观点正符合了道光传统道德观念，他不禁大喜曰：此真帝之言。

道光晚年生病，常召见二子。奕訢的老师卓秉恬嘱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以显示才华横溢；奕訢的老师杜受田等人则嘱其，如皇上自言老病，恐不久

于位后 惟伏地流涕 以表孺慕之诚。奕訢依此 曾得道光喜欢，称其仁孝等。

应该说，道光皇帝对继位皇子的考察是颇费心思的，也是符合传统道德的。奕訢继承皇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势所必然。

面对饮恨而亡的皇父和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年轻的皇帝痛心疾首，抱着一番振兴朝纲的理想，开始了挽狂澜、扶大厦的咸丰时代的补天工作。

咸丰皇帝接手的大清帝国是一个烂摊子，内有天灾人祸，外有敌国进逼，加上官场腐败，积弊丛生，特别是文武大员无所用心，大小官员“皆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朝中主政大臣中至少有三类：一类以曹振镛等人为代表，采取的是“少说话，多磕头”的方针，不干事，不惹事，不理事；另一类是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为代表，采取的是巧言令色，结党营私，他们利用穆彰阿几十年的经营，形成了门生故吏遍布的局面，人称“穆党”对道光影响很大。军机大臣王鼎等人虽然正色立朝，但毕竟人单势薄，不能形成气候，属于第三类。在此影响下，京官们采取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斤斤自守”，“亟亟营私”。面对整个官场不思振作的风气，咸丰皇帝为了打开局面，他首先颁诏从“求言”、“求贤”入手，力图振兴朝纲。据统计，自咸丰颁诏求言之后，廷臣献纳不下百

余章，其中如大理寺卿倭仁、礼部侍郎曾国藩、太常寺少卿徐继畲等人的谏言，得到了咸丰的嘉褒，有的甚至为咸丰皇帝置诸左右，时时省览，改变了道光皇帝晚年的十余年无一人陈时政得失，无一折言地方利病的局面，表明咸丰皇帝求治心切的心情。

在颁诏求言的同时，咸丰皇帝还连颁谕旨，命各省督抚和在京部院大臣保举贤才，以备简用。一时间文武大臣纷纷陈奏推荐人才。

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应咸丰皇帝的求贤诏书疏荐起用林则徐大学士祁寯藻提出延纳寒素，保举知名寒士，保举循吏以及优处潜修之士；军机大臣文庆直接向咸丰皇帝提出了“重用汉臣”的用人之策等。

惟独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态度颇暧昧，此人在鸦片战争中一意主和，对林则徐等人多方掣肘，此时为保持过去的局面，则以消极态度对抗。他或者“遇事模棱 缄口不言”或者对文武官员保荐林则徐极力阻挠，甚至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等等。

咸丰皇帝顶住了穆彰阿的阻挠，坚决启用林则徐，命其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平乱。此后林则徐病歿潮州途中，咸丰皇帝除派人致祭外，还颁御祭文和御赐碑文。并断然决定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将耆英降职琦善革职逮问等等。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此时，咸丰皇帝胸中充满了力挽狂澜的信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只要将朝廷一两个奸臣贬斥，并能起用一两个贤臣，自己虚心纳谏，力除积弊，就一定能重振朝纲，抵御外侮，振兴大清王朝。

●金田起义

就在咸丰登基不久，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已在广西爆发。

道光三十年五月（1850年6月）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在创立拜上帝教的基础上，在广西经过长时间艰苦努力，号召广西各地拜上帝会众向广西金田村“团营”组织军队。

洪秀全原名火秀，谱名仁坤，后改秀全，广东花县官禄埗人，他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1814年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洪镜扬为人公正耿直，勤劳朴实，靠种田谋生。洪秀全七八岁时入私塾读书，聪明好学，五六岁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至16岁因“家计困穷”而被迫中途辍学，帮助父兄耕田、放牛，18岁被聘为本村私塾教师。

洪秀全生长在穷乡僻壤，从小就备受生活煎熬，并参加农业劳动，因而亲身感受到农民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是，由于儒家经典的熏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青年时代的洪秀全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支配下，曾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登上仕途。他曾 4 次赴广州应试 结果都名落孙山。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多次的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这时正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这一切都在激荡着洪秀全的心弦；再加上他自己在科场一再失意，便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苦难联系起来，产生了异端思想。洪秀全专门请人铸造一把“斩妖剑”佩带并写了一首《吟剑》诗：“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洪秀全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 希望能将“妖邪”、“奸宄”擒尽斩绝，建立起一个“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

与此同时，洪秀全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同年，他重读 7 年前在广州应考时得到的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布道书《劝世良言》。洪秀全对此书加

以改造，他利用其中独一无二真神皇上帝的思想，来对抗世上一切其他为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和妖魔；利用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应当平等的说教，来对抗封建的人压迫人的等级观念；利用上帝曾派遣其子耶稣降生救世的宗教传说，把自己附会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他宣称自己是受命下凡，要诛妖救世。他自行洗礼，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拜上帝教。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首先受洗礼。冯云山年龄比洪秀全小 8 岁 是洪秀全的同乡同学 又是中表至亲，关系极为密切。他和洪秀全一样，是屡试不第的失意塾师，也是以后拜上帝教的得力组织者和宣传者。最初，洪、冯二人在家乡附近各村镇传教。不久，他们砸毁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至圣先师”孔丘的牌位。这种举动在主观上是基于“拜上帝不拜邪神”的教规，是为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需要，但在客观上是对孔子权威的一个公开冲击。洪秀全等人的行动，激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人求见洪秀全，“极力劝其不必传异教”。洪仁玕因参与拜上帝会而遭到他哥哥的棍打，被逐出家门。有的人企图借灯节、迎神赛会的机会 利用族权 逼着洪秀全、洪仁玕为迎神大会写对联，歌颂神佛偶像。他们倔强不从 断然拒绝 因而受到迫害 洪秀全、冯云山也失去

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决定“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他们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经过半年的努力，赐谷村周围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拜上帝教。七八月（8—9月）间，冯云山转入桂平县紫荆山区活动。十月（11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拜上帝教的写作。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洪秀全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奠定了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离开花县前往广州，跟着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阅读《新旧约圣经》，学了些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罗孝全认为洪秀全思想不纯，不是“合格”的教徒，拒绝为他洗礼。洪秀全在广州仅住了几个月，便去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

紫荆山区纵横 270 平方公里，四面高山环绕，重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居住着壮族、瑶族和汉族人民，大多数以耕地、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富于斗争精神。冯云山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入紫荆山区后，以做工、当塾师为生，走村串寨，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拜上帝会的组织，发展会众 3000 多。

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后，看到冯云山已经开辟了这块基地，信心大增。为了发展和巩固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筹划制定了各种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十款天条》的内容是：（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邪淫乱；（八）不偷窃劫抢；（九）不讲谎话；（十）不起贪心。《十款天条》，平时是会众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战时则为军事纪律，对发动组织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洪秀全、冯云山又派人到附近各县去发展组织，建立据点。贵县、平南、藤县、武宣、象州、博白、陆川以及广东信宜等地的汉、壮、瑶等族人民，纷纷参加拜上帝会。九月（10月）为了鼓舞群众的“诛妖”勇气，洪秀全、冯云山率领会众前往象州捣毁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附近群众都惧怕它显灵降灾，祭祀非常虔诚。洪、冯率众将甘王神像击毁，并宣布其十大罪状。接着，拜上帝会群众捣毁了当地许多的神坛庙宇和各种偶像，严厉地打击了封建神权，使拜上帝会威名大振，入会者甚众。这种活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宗教斗争，但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拜上帝会蓬勃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

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将反对封建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1847年12月）底紫荆山石人村的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纠集团练逮捕冯云山，押送官府。拜上帝会群众卢六等前往拦截，终于把冯云山抢救出来。王作新恼羞成怒，跑到桂平县衙控告冯云山“迷惑乡民 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年1月）王作新亲自率领团练逮捕冯云山、卢六二人，转解桂平监狱。

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和广大会众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洪秀全赶回广东，企图利用清政府允许洋人传教的条约规定，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结果碰了壁。广大会众则把自己烧炭得来的钱捐献出来，聚成一笔巨款，用来疏通官府，以营救冯云山和卢六。卢六入狱后不久就被折磨而死，后追封为殿王。冯云山对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进行了艰苦斗争。这时，拜上帝会失去了主心骨，一些地主士绅乘机叫嚣要铲平拜上帝会，会众人心浮动。在这紧要关头，种地烧炭出身的拜上帝会骨干杨秀清，于三月（4月）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贫苦农民出身的萧朝贵也假托天兄耶稣附体。杨、萧代天父、天兄发言的权力 在洪秀全

归来后得到了承认。这在当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也给后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危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冯云山在紫荆山拜上帝会众的积极营救下出狱。出狱后，即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六月（1849年7月），两人重返紫荆山。

这时，广西饥民成群，哀鸿遍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天地会领导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而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又相对薄弱，在这种形势下，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桂平县紫荆山区为中心，东自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南起陆川、博西，北迄武宣、象州，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许多人参加了拜上帝会。参加拜上帝会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正像李秀成所说：洪秀全教人敬拜上帝，“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除此之外，还有矿工、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小贩、挑夫以及农村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甚至有些受排挤的中小地主也向拜上帝会靠拢。参加拜上帝会的有不少客家人，同时还包括壮、苗、瑶等少数民族。

拜上帝会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其他重要成员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武装起义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道光三十年五月（1850年6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金田团营”，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集中，整编队伍。在获得消息后，各地会众纷纷变卖田产房屋，冲破重重阻挠，有万余人陆续到达金田村。洪秀全用军事制度把前来团营的群众组织起来，实行男妇别营，建立圣库制度，进行军事训练。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终于爆发。

● 扑灭义火

咸丰皇帝获悉广西起义消息后，急谋平乱。他首先调强帅精兵入广西平乱，他在将广西无能的文武官员免职的同时，亲自选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赴桂督师，调湖南提督向荣、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入桂，结果林则徐病死潮州途中，张必禄死于军营，其第一个方略落空。

咸丰接着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并以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结果将帅不和，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在广西连吃败仗，三人互相责骂，致使咸丰第二个方略失败。

咸丰元年三月（1851年4月）咸丰皇帝特派文

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亲赐“遏必隆刀”以壮其行。赛尚阿虽居首辅，打仗却是外行。六七月（7—8月）间，他调集各路清军三万余人与太平军激战，清军一败涂地。太平军突破清军包围进入永安州，赛尚阿率四万余人紧紧围住永安城达半年之久。太平军在永安完成内部清奸和建制工作，并在雨急夜黑中突围北上，冲出了清军包围，袭击桂林。咸丰皇帝闻讯焦急万分，谕令将赛尚阿革职拿问，向荣革职，另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福兴阿为广西提督，这是其第四个方略。

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3月），太平军出桂林攻长沙，转攻岳州，获湖船5000只，组织“水军”。十一月（12月），太平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昌，所过城镇，清军望风而逃。向荣一路紧追至湖北。十二月（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湖北武昌。湖北巡抚自杀，徐广缙退守岳州。咸丰皇帝闻讯后，一怒之下，下令将钦差大臣徐广缙革职，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管两湖军务。至此，咸丰皇帝已四易其帅了。

为了防堵太平军北犯和东下，咸丰起用琦善为河南巡抚、钦差大臣，驻防河南一带，防止太平军北犯；令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扼守苏、皖、赣。

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自武昌沿江东进，水陆两军浩浩荡荡出湖北，过

江西 经安徽 旌旗蔽天遮日 直达南京。

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等人，全歼驻防旗兵，并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

咸丰皇帝闻讯后，惊恐万分，一面调怡良为两江总督、托明阿为江宁将军、许乃钊署理江苏巡抚；一面下令将赛尚阿论斩，稍后又将徐广缙定为斩监候。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大臣无能所造成的。一连数日，咸丰皇帝不思茶饭，夜不能寐。眼看大清江山在自己手上几乎断送一半，不由得忧心忡忡。此时的咸丰皇帝已由即位之初的血气方刚而变为心烦意乱；“为君难”的含义，他算是深深体会了。为了给臣子树样子和激发属下的天良，他先后两次下了罪己诏，并亲手焚香告祖，希望祖宗保佑自己。年轻的皇帝面对的是困难重重的局势。

以财政而言，咸丰登基之初，户部存银总计约410万两，而为镇压太平军起义之故，不到三年时间已花去290万两。此时，国库空虚，加上全国范围内水灾、旱灾和虫灾等等，受灾达1538县，其中单是咸丰元年黄河决口，一次就拨银500万两。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咸丰皇帝不得不同意在国家财政系统之外允许各地自行筹措军费，从而开始了晚清的厘金制度，形成了地方相对独立的财政系统。

厘金最初实行于扬州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

它是在咸丰三年由清帮办江北军务雷以誠派人“劝谕米行捐厘助饷”而形成的。

厘金包括活厘和板厘两种类型。

所谓活厘，也称行厘，它主要是抽行商的货物通过税。

所谓板厘，也称坐厘，它是抽坐商的交易税。

厘金的税率原定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所以称厘金或厘捐。事实上又分“从量抽厘”如每担烟叶抽八十文，也有“从价抽厘”即对价值稍高的商品如药材、海味等值千抽十二文。

厘金制度很快推行全国，它名目繁多、税率不一，对各地清军自行筹措军费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还批准颁发《筹饷事例条款》，先后四次颁谕扩大捐纳和捐输，将公开卖官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来源之一，造成了官吏队伍急剧膨胀，“流品日杂”。由于买官花钱，得官后便拼命捞钱还本，使清政府的腐败恶性循环。此外，咸丰皇帝还采取了借债筹饷——增加赋税、减少八旗俸饷等一系列措施，使清廷得以苟延残喘。

咸丰皇帝对付太平天国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组织军事围剿的同时，还极力发动和依靠地方自卫武装，推行团练政策，发动和组织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疯狂地向太平天国进攻。这对走投无路的清廷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它在挽救清政府统治，发

动地方自救的同时，也为汉族地主阶级集团中的湘、淮军的崛起，造成晚清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地方武装各自为战开了口子，实际它也是晚清天下最终崩溃之滥觞。

咸丰皇帝对清王朝国家经制兵八旗、绿营“屡屡败退”的情况痛心疾首，决计采取“兵不足而兼勇”的方针。从其登基不久的道光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开始，咸丰皇帝多次颁谕“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资保族党”。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他终于在全国推行团练政策。这一时期他是煞费苦心，他在咸丰二年八月任命了第一个团练大臣，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此后直至咸丰三年，他在江西、湖南、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贵州、福建等10个省总计任命了45个团练大臣。详情见下表：

湖南省：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

安徽省：工部左侍郎吕贤基

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

前广西巡抚周天爵

江苏省：前左都御史沈岐

前闽浙总督季芝昌

前吏部侍郎侯桐

前左副都御史程庭柱

前宗人府府丞温葆淳

前江西巡抚钱宝琛

前湖南布政使王藻

前浙江布政使汪本铨

直隶省：前兵部侍郎孙葆元

前浙江巡抚梁宝常

前甘肃凉州总兵杨禄

河南省：前广西巡抚周之琦

前内阁学士祝庆蕃

前广东布政使王庭兰

山东省：前山西巡抚梁萼涵

前江苏布政使李璋煜

前河南布政使王简

前浙江按察使孙毓桂

前湖南按察使王允中

前四川按察使刘耀椿

前闽浙总督刘韵珂

前广东巡抚黄恩彤

前江苏巡抚傅绳勋

前湖南巡抚冯纯馨

前漕运总督李湘棻

前江西巡抚陈阡

前工部侍郎车克慎

浙江省 前兵部侍郎戴熙

前内阁学士李品芳

前内阁学士朱澜

前湖南巡抚陆费璟

江西省：前刑部尚书陈孚恩

前江苏布政使程焕采

前大理寺卿邢福山

贵州省：前漕运总督朱 澍

前陕西布政使陶庭杰

前湖北布政使唐树义

福建省：前太常寺卿廖鸿荃

前光禄寺卿杨庆琛

前浙江提督李廷钰

前江南福山总兵孙云鸿

团练又称乡勇和练勇，属于一种清代民办的地方武装。在全国众多的团练大臣中，曾国藩在湖南创办的湘军独占鳌头，取得了相当成功。

湖南举办团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末年，辰州府凤凰厅同知付鼎曾用筑堡办团练的办法镇压农民起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雷再浩在新宁发动反清起义，江忠源再倡团练，训练团丁达三百余人，镇压了雷再浩起义，此后这支团练发展为与湘勇并列的楚勇。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攻打全州，湖南官绅朱孙诒、王鑫、刘蓉等倡办练勇。咸丰二年（1852年）朱孙诒、王鑫等率 1000 余人，分为中、左、右三

营由罗泽南、王鑫、康景辉等统辖。同年左宗棠也向湖南巡抚张亮基建议以新勇代制兵的主张；同年七月，礼部侍郎曾国藩回湘乡办理母亲丧事，十二月，他接到咸丰皇帝命令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他顾虑重重，后在郭嵩焘等人劝说之下，从湘乡往长沙途中与朱孙诒、罗泽南、刘蓉、王鑫等人相遇，会同湘乡团练勇 1000 人赶到长沙，成为日后湘军的起源，又称老湘军。

直至咸丰四年（1854 年），曾国藩等人练成湘军。全军分水、陆两军。其中水师 10 营，每营 500 人；陆师 13 营，合计 17000 余人。湘军以募兵制代替了清代绿营的世兵制和八旗的世袭制。湘军只在湖南募兵，尤以湘乡为多。入伍须具结取保并将儿女妻子父母登记入册。其队伍中往往为同乡、师生、同学、亲友等，其将领则是地方士绅。由军官招募士兵，统领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依次而下，帅不为制，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建立严格的个人隶属关系。

曾国藩等人以程朱理学为旗帜，向士兵灌输名教、纲常的思想，使湘军终于脱颖而出，与清代兵制形成明显区别，成为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劲敌。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天王洪秀全一面在天京城内加强政权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文件，同时，又布置了直捣北京清廷的北伐和解除天

京上游围困的西征。

太平军的北伐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三万余人分三路出发，过长江，入安徽，进山东，过河南，渡黄河，克山西后，又折而向东，经河南入直隶，奇袭临洺关，克天津独流镇和杨柳青镇，距天津城仅 10 里。北伐军与清军鏖战三月，因四面受敌被迫主动南退。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1855 年 3 月 7 日），北伐军领导人林凤祥在退守山东连锁镇时被俘，后被解送京城杀害。李开芳则在山东茌平一带被俘，后也被解京杀害。历时二年，转战六省的太平军北伐震撼了清廷。

太平军西征的目标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三大据点，以控制长江中下游，解除天京的围困。咸丰三年（1853 年），由夏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率领战船千艘，溯江而上，首占安徽和州。五月（6 月）克安庆，占湖口，攻南昌不下，转战九江，占泸州，并围困武昌。咸丰四年二月（1854 年 3 月），太平军石祥贞率部与曾国藩部队在湖南宁乡激战，太平军在靖港炮击湘军水师，湘军兵败，其水师几乎全部被歼，曾国藩羞愤投水，被属员救起逃回长沙。后清军副将塔齐布率湘军攻湘潭获胜，太平军北退。曾国藩乘势指挥水陆两师反攻岳州、武昌。咸丰五年（1855 年），咸丰皇帝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与罗泽南部协助其反扑，相继攻占岳州、武

昌、汉阳 进逼九江，曾国藩叫嚣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太平军西征战场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

面对这种局势，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西线湘军。咸丰五年（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为统帅，率西征援军达湖口后，坚壁固守，引诱湘军入鄱阳湖，痛击湘军水师，并夺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林启容、陈玉成等率军坚守九江，多次挫败清军配合进攻湖口的战斗，改变了太平天国西征战场的不利局面。咸丰五年三月（1855年4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年底，石达开从湖北移军江西，短短三个多月之中，太平军席卷赣南、赣北，占领江西8府50多个州县，曾国藩被困守南昌。

当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取得大胜之际，太平天国领导人又组织了天京破围战。这场战斗首先从解镇江之围开始。镇江是天京的下游屏障。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太平天国燕王秦日纲会同镇江守将吴如孝等，内外夹攻，大败清军。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江北大营营垒一百二十余座，江北大营溃不成军。五月（6月）太平军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进攻江南大营，翼王石达开和燕王秦日纲率军配合各路太平军全线出击，直扑清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由各门出击，鏖战终日，江南大营终被攻

破，钦差大臣向荣兵败逃往丹阳，自缢而死（一说病死）。

太平军解除了威胁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肘腋之患，打通了自湖北武汉至江苏镇江的千里长江通道，形成了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南方天地会系统的反清起义，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边钱会等，从福建、台湾一直扩大到长江流域；广西天地会在胡有禄、朱洪英领导下，在广西灌阳建立了“升平天国”，坚持转战湘、桂、黔一带；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人领导了红巾军起义，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在广西肇庆、梧州、浔州等地活动；福建小刀会黄威率众起义，攻占厦门、海澄、漳州、同安等城，在厦门建立政权，后在闽、粤海面坚持斗争；福建红钱会在林俊等人领导下，攻克永安、仙游等县，后在北上拟与太平军会师途中遭团练袭击；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人在上海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建立大明国，后上书洪秀全，接受太平天国领导，相继攻占南汇、川沙、青浦、嘉兴等县，终因封建统治者与英、美、法等国侵略军勾结，在被迫突围过程中，刘丽川牺牲，余部突围至南京加入太平军。北方的捻军是皖、苏、豫、鲁一带贫苦百姓的一种民间组织，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捻党首领张乐行等人在雒河集聚众起事，会盟建号“大汉”，张乐行被

推为“大汉盟主”在鲁、皖一带活动后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封为“征北主将”，晋升“沃王”转战豫、皖、苏等省屡败清军。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此时也风起云涌，其中如：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队伍发展到 10 万，活动在贵州东部以台拱为中心数十个州县。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建立“平南国”遥奉太平天国天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易正朔蓄全发易衣冠等等先后占领滇西 53 个州县。与此同时，云南彝族李文学领导哀牢山区 5000 人起义活动在蒙化、镇南、楚雄、景东等 10 余个州县人口达 50 万人李文学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

所有这些起义此起彼伏，互相配合，极大地牵制了清王朝兵力的调动，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的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正当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达到全盛时期之际，太平天国内部的各种弱点和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和激化起来，其中特别是领导集团之间，以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斗争尤为激烈。

本来，天王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但在洪秀全、冯云山广西传教期间，杨秀清利用冯云山被清衙役逮捕之时，假托“天父”附身下凡传言，稳定了广西的拜上帝教会众，也进一步证实和丰富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的神话。金

田起义后，杨秀清被封为东王，成为仅次于天王之下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杨秀清以其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依靠广大太平天国将士，终于取得太平天国初期的一系列胜利。随着太平天国的胜利，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骄横倾向日益严重。他建立的东王府“官员达 3564 人，各级官兵 2—3 万人，太平天国一切政务都先在东王府决定，然后令奏洪秀全，洪秀全照例‘画诺而已’”。杨秀清则进一步利用“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令洪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欲杖责之。与此同时，杨秀清还随意杖责领导集团其他成员，如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溶、卫天侯黄玉昆等，扩大了杨秀清与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咸丰元年（1851 年），当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相继被击溃之机，杨秀清乘机扩大个人权势，假借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东王有咄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答应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等等，虽然表面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中一面在天王府设防自卫，一面即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江苏督师的秦日纲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速回京。

韦昌辉当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余人赶到天京，与秦日纲部队一道包围了东王府，并在当夜凌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部下全部杀死，此后又诱杀东王部下五千余人，造成了天京的恐怖局面。石达开从湖北前

线赶回天京后，批评韦昌辉滥杀，韦昌辉不服，企图杀害石达开，石达开闻讯逃跑，其留在天京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要求严惩韦昌辉。

此后，洪秀全接受广大将士要求，下令处死韦昌辉、秦日纲及部属 200 人，结束了天京内部的混乱局面。

石达开后率部队回到天京，总理朝政。洪秀全猜忌石达开，不授予实权，石达开担心悲剧重演，遂于咸丰七年四月（1857 年 5 月），率 20 万精兵离京出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兵力。自此，直至咸丰十年（1860 年），石达开经安庆入江西，进浙江，下福建，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虽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反清斗争有一定推动作用，但终因无后方，流动作战，故而军心涣散。同年，吉庆元、朱依点等人率 10 万大军万里回朝。石达开自己则率军从云贵攻四川，同治二年（1863 年），在进抵四川紫打地（今安顺场南）准备跨越大渡河时，四面受敌，援兵无望，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入清营投降，企图舍命以安三军，结果其部被遣散杀害，石达开本人则被押解成都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内乱，搞垮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开国元勋的核心层中仅存洪秀全一人，人心离散，朝政不修，结

党营私，加上内讧中相互残杀，大批优秀将士被冤杀，损伤了革命的元气，迫使太平军在东线和西线的进攻停顿下来，给了清政府喘息的机会。

当清政府获悉太平天国内乱的消息后，咸丰皇帝欣喜若狂，在西线他一再催促湘军乘此机会，设法进兵。曾国藩踌躇满志，力图卷土重来，在西线侵占武昌、汉阳，顺江而下进窥九江、安庆。在东线，咸丰皇帝又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自安徽庐州移营丹阳、句容，与张国樑部进逼天京高桥门、太平门，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则令总兵成明率马步军前往浦口，督军进攻江浦，天京再度陷入清军围攻之中。

如果说，太平天国的造反把咸丰皇帝搅得精疲力竭、心烦意乱的话，那么此时英法联军趁火打劫，在美、俄支持下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无疑是给了咸丰皇帝当头一棒，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应该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并没有完全打掉清王朝皇帝的自大心理，继道光皇帝之位的年轻的咸丰皇帝对外也没有服气和认输，他只是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方针，对洋人敬而远之，尽量不理、不睬、不惹事，然而西方侵略者给父皇道光皇帝留下的痛苦和耻辱，却深深地烙在年轻皇帝的脑海中，他在仇恨与疑惧中，对西方侵略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第四章 国门再破

● 武力换约

贪婪的西方侵略者，并没有因为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已从中国获取了各种权益而感到满足，其中特别是英、法、美、俄等国 他们处心积虑地伺机扩大对华侵略战争，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

咸丰四年（1854年）夏，英、法、美三国乘着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激战争夺，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互相勾结，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的要求。

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中英《南京条约》里的部分内容，扩大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特权，其中他们着重强调并要求的有：

- 一、公使驻京；
- 二、中国全境开放，准许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内

地；

三、免除子口税；

四、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

对于英、法、美等国的侵略要求，咸丰皇帝坚持“稍有变通 其大段断无更改”^①；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咸丰皇帝力图以微小的让步来阻止外国侵略者的“修约”要求。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咸丰皇帝颇为器重的一位地方大吏和“外交人才”。此人在道光二十八年升任广东巡抚，因支持广州民众抵制英人入城，受到道光皇帝的嘉奖，咸丰皇帝即位后，提拔他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处理两广的外交事务。因为清廷并无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和机关，此时的外交事务多由理藩院和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叶名琛的外交策略是：既不主动与洋人接触，也不与洋人挑起事端。对于洋人各种要求，其基本方针是：一避、二拒、三拖延。

应该说 叶名琛的这种“外交方针和策略”是与咸丰皇帝的思路不谋而合的。咸丰皇帝对洋人惧恨猜忌，始终保持警惕。

但咸丰皇帝不谙世界大势，满脑子仍是“华尊夷卑”的传统思维定式，他对西方侵略没有采取明确的有效的防范措施。在他看来，西洋诸国不过是“蛮夷之辈”，因此他既不愿研究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

西方，甚至连接触也不愿意，他把各种外交事务统统推给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远隔千里之外的叶名琛领会和揣透了咸丰皇帝的心思，君臣二人可谓是如出一辙。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等国再次提出“修约”的要求，面对清政府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一推、二拒、三拖延”的方针，英、法决定寻找借口挑起战争。

英国方面编造了“亚罗”号船英国旗在广州被清水师扯落和英水手被捕，英国主权受到了侵犯的所谓“亚罗”号事件，法国方面则找出了所谓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玉林县被杀的借口，决定对华发动战争。这两个借口实际都是站不住脚的。

“亚罗”号船实际上为中国商人方亚威购置，因为航行到香港，故在香港领取了1855年9月—1856年9月为期一年的营业执照，此船到达广州时已经期满，加上船上水手参与海盗抢劫被捕，这完全是中国政府内部之事，根本不存在所谓“扯落英国国旗”等事，甚至连英国公使包令也承认：“经过调查，‘亚罗’号无权悬挂英国国旗”；执照于9月27日已经期满，此后它就无权受保护等”。而“亚罗”号事件发生的时间恰恰是10月1日，英国的借口不攻自破。

法国找出的所谓马神甫事件，实际是马赖神甫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传教士可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口传教”的

规定，擅自去了广西的南宁而致死，应该说法国马神甫违约在先。

对于英、法企图发动战争的借口，两广总督叶名琛置之不理，他采取的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态度，没有积极备战。

咸丰七年（1857年），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驻华特使，并伙同法国共同策划武装侵略中国。

同年八九月（9—10月）间，英、法舰队抵达香港，组成英法联军。此时，英在华军舰达49艘，官兵6400余人，加上香港的陆军部队3000—4000人，总兵力已逾万人。法国在华舰艇12艘。整个舰队大部分集结于广州—香港一线江面。

九月中旬（10月底），英法联军向两广总督叶名琛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

- 一、两国特使入城见叶名琛；
- 二、索取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地方；
- 三、赔偿被烧洋楼银两，继续通商贸易。

叶名琛驳斥了英法照会，除允许正常通商贸易外，逐一拒绝。英法决定兵戎相见。

同年十一月（12月）底，英法特使向清两广总督等发出最后宣战通牒：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发炮攻城，要求城内军民速避90里外。

面对英法联军挑衅，两广总督叶名琛仍不予理睬，对于迫在眉睫的战火，他也未采取有效的防卫措

施。

此时，英军在广州作战的部队约 4700 人，法军近 1000 余人，在珠江配合作战的舰艇共 20 余艘。

守卫广州城厢内外的清军 10000 人，乡勇 3000 人，合计 13000 人。

十一月十三日（12 月 28 日）黎明，英法联军炮轰广州，持续达 27 小时之久。主要目标是两广总督衙门，待叶名琛撤离督署至粤华书院不久，督署就为敌炮火击中焚毁。上午，联军由东边上岸，意在攻城，千总邓安邦率东莞乡勇 1000 人，奋起还击，血战大半天，双方互有死伤。下午，叶名琛派标兵和乡勇一部前往支援，因战斗力不强，抵挡不住联军的炮火攻击。傍晚，东固炮台为联军攻占。

十四日（29 日）拂晓，联军 2000 人进攻广州北门外四方炮台。清军都统来存率炮台官兵死守，“任飞炮迸裂，镇静不移”，并发巨炮还击，毙伤联军数百，将其击退。联军又分路进攻东门和小北门，因防御力量薄弱，守城器械缺乏，城外又无援兵夹击，联军终得从小北门城墙扒城而入，广州城遂破。广州将军、巡抚柏贵等竖起白旗，两广总督叶名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1858 年 1 月 5 日）在总督衙门花园的八角亭被英法联军俘获，后囚禁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虽然占领了广州城，囚禁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但“修约”问题仍无着落，他们的侵略目的并

未达到，遂决定派联合舰队北上。

咸丰八年正月（1858年2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分别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代表限定于二月底（4月上旬）前到上海与英、法特使谈判，向清政府提出索赔军费、增开口岸、改订关税以及公使驻京等一系列要求。咸丰皇帝拒绝派钦差大臣赴上海谈判，仅发上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他们回到广东，听候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处理。

英、法侵略者眼见不能得逞，遂决定实施其早已决定的第二步行动计划：派英法联军北上天津，胁迫清廷就范。此时美、俄两国也趁火打劫，鼓动英、法军队北上，欲把事情闹大。美国的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沙俄政府则企图染指我国东北大片领土。

同年二月（3月），英使额尔金乘战舰到达上海。三月一日（4月14日）到达天津白河口。接着英法联军的战舰也陆续驶达天津附近海面，战争一触即发。

三月十日（4月23日）英、法特使照会清廷，要求清廷派全权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谈判，并限六天之内答复。直隶总督谭廷襄根据咸丰皇帝旨意，仍通知英、法特使回到广东去。

此时，咸丰皇帝采取了两方面措施：其一，加强天津大沽一带防务，委派刑部左侍郎国瑞等人督率京营马、步队及内火器营官兵二千余人，扎营白河两

岸，作为后路接应。加上清军驻大沽炮台的守军、直隶提督张殿元和直隶总督谭廷襄的直属部队，以及天津一带练营，总兵力达一万三千余人，火炮五百余门。其二，就近与英、法谈判并寄希望俄、美两国帮助。为有助于谈判，他甚至不惜将已被自己革职的耆英弃瑕录用，授其侍郎衔，与崇纶等人赴天津海口与洋人谈判，以挽救危局。

英、法公使拒绝与耆英等人会面，耆英等人狼狈不堪，只得惶恐而返，且不待咸丰皇帝批准便擅自回京。耆英的行为震怒了咸丰皇帝，命将耆英下狱治罪。

清廷欲以俄、美来制英、法，甚至不惜通过先与俄、美谈判订约，以此让步来换取沙俄劝说英、法两国，放弃公使驻京等条款，结果被英、法公使拒绝。

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直隶总督谭廷襄递交最后通牒，声称中国方面并未派出全权大臣来谈判，又不准英、法特使进京，因此限令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并护送特使进京。英法联军的蛮横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

此时，清军在大沽南北4座炮台兵力近1000名，后备部队近10000名。

英法联军方面，共有舰艇26艘，火炮394门，官兵2054人。英法联军拟以3艘舰艇炮击大沽北岸炮台，另以3艘舰艇炮击大沽南岸炮台，另有6艘炮艇

运载登陆部队。

从中英双方兵力看，各有优势。从兵力数量上看清军明显占优势，但从武器如炮、舰船看，英法联军则明显优于清军。

同日上午 10 时，英法联军炮舰向大沽南、北炮台猛烈轰击，清军守炮台官兵发炮还击，击沉联军舰艇 4 只。因此时正值海潮退潮，清方炮台的火炮无升降装置，发射出去的炮弹大多从联军舰艇上呼啸而过，而英法联军的炮弹却纷纷击中清大沽炮台。联军又以登陆陆战队抄袭炮台后路，清游击叶春元在北炮台亲自指挥发炮，击沉敌船 1 只，后因腹部中炮壮烈牺牲，都司陈毅等 300 余名官兵也先后战死。直隶总督谭廷襄闻讯，率先乘轿逃离前线。

天津大沽的南、北两炮台终因双方力量悬殊，被英法联军攻占。

大沽炮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京都的门户天津局势顿时紧张。

咸丰皇帝为加强天津地区防务，先后采取两条措施：

其一，派头侍卫托明阿管带八九千名官兵直赴天津；同时又令僧格林沁派部队增援天津守兵。

其二，令直隶总督谭廷襄设法夺回炮台，以赎前过。

四月十二日（5 月 24 日）谭廷襄率余部撤出天

津城外一线，同时他认为津城无险可守，惟有“羁縻”即议和才是上策。

十四日(5月26日)联军炮艇溯白河直逼天津城下，扬言将进攻北京，力图胁迫清廷订立城下之盟。

咸丰皇帝感到局势严峻，遂于四月十六日(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全权谈判议和。

从四月二十日(6月1日)开始，经过20多天谈判，清廷代表讨价还价，终于被迫于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两国公使订立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并规定一年后到北京换约。其主要内容为：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外国人可以入中国内地经商、游览、传教；外国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各口岸；赔偿英国400万两白银，赔偿法国200万两白银等等。

这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美国和沙俄以调停人身份从中斡旋，乘机大捞一把。

早在英、法策划北犯之机，俄、美两国便鼓动联军北上，把战火扩大，以便渔翁得利。其中沙俄公使

态度尤为恶劣，他一方面为英、法出谋划策，为英法联军北上提供情报；另一方面他又装出同情清政府的样子，拉着美国一道作为调停人，狐假虎威，以售其私。与此同时 沙俄政府还直接派出马、步、炮兵两万余人，集结黑龙江和蒙古，逼迫清政府先行缔约。惶恐不安的咸丰皇帝明知沙俄居心险恶，却又百般无奈，五月三日（6月13日）终于同意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里 沙俄政府未费一枪一弹，获取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与此同时，沙俄集结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军代表还逼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沙俄，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海边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美国也不甘落后，于五月八日（6月1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同年十月（11月），桂良、花沙纳等人又与英、法、美等在上海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修改税则，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子口税按时价值百抽二点五，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等等。在上海谈判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和双方商订税则过程中，清廷代表根据咸丰皇帝旨意，试图以全免进口税来取消英、法提出的公使驻京等条款，英、法坚持公使

驻京 甚至扬言如果没有这一条 整个《天津条约》一文不值。

此时，咸丰皇帝坚持要取消公使驻京这一条款，实际上是他坚持“华尊夷卑”思想的反映。在他看来，洋人“蛮夷”长驻京城 与大清皇帝同城而居 不仅是对天朝统治的威胁，而且也影响天朝夷夏之辨的思想体系，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他情愿用全免进口税等优惠条件来换取英、法取消公使驻京这一条款。在咸丰皇帝看来，与列强订立《天津条约》也只是缓兵之计，因此他派桂良、花沙纳等人南下活动改约，希望把一切问题在上海的谈判中解决，不要闹到北京。同时，他也考虑到洋人狡诈刁横，万一上海谈判顶不住时，洋人必然由海口入京的话，他规定其数额不得超过 20 人，且不得携武器，并指定由大沽稍北的北塘登陆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天津大沽，京畿威胁暂时解除。清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就加强天津一带沿海防务，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

其一，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坐镇津沽，统一负责津沽一带防务，改变了过去军政分割、事出多门、指挥不灵的缺陷。

其二，调兵遣将，增强津沽一带布防的力量。咸丰八年十月（1858 年 11 月），调水师、马步队 3000 人，其中水师 2000 人；咸丰十年初（1860 年），又调

京师健锐营、火器营、巡捕营精兵 3000 余人，并从直隶、察哈尔等地调兵 4000 余人；至此，津沽一带总兵力达万余人。与此同时，清廷还调闽、广一带大型战船 4 只，水师将弁近 100 名，出海训练水师。

其三，勘察地形，严密设防。咸丰八年（1858 年）底，清直隶总督庆祺组织人员对天津至山海关一带和天津至山东半岛一带沿海地形进行勘测，提出了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的方针，并据此制定了总的防务计划。即以大沽海口为重点，在濒海近岸拦江沙一带分别设横江铁钺、铁链以防敌舰入海口。在天津沿海一带修筑长围、壕沟以阻英法联军登岸。同时，修筑炮台近 20 座，加宽加高围墙，大沽炮台增加 30 多门火炮，增强炮台防守能力。

● 津京激战

《天津条约》虽已签订，但按规定必须一年后互换批准书，否则不能最后生效。

英、法侵略者心存疑虑，一心想在北京实现互换批准书，以扩大各种在华特权。

此时，英使额尔金离职返英，其弟弟普鲁斯新任驻华公使。咸丰九年三月（1859 年 4 月）普鲁斯抵达香港，获悉清廷在天津大沽海口加强防务的信息

后，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实现北上换约。

五月（6月），英公使普鲁斯和新任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达上海，他们根据英、法两国政府指示，主张武力换约。他们拒绝与清政府所派的代表桂良、花沙纳会面。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参与了英、法两国密谋，决定乘军舰北上。

同月，英法联军的 22 艘舰艇集结天津大沽口外，其中英舰 20 艘（含巡洋舰 1 艘），法舰 2 艘（含巡洋舰 1 艘），火炮 150 门，官兵 2000 余人。美国军舰 3 艘也游弋于大沽海面。负责登陆指挥作战的是英舰队司令贺布，英国投入的舰艇和兵力占联军中多数。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一指挥的清军总兵力约 20000 余人，其中：驻屯山海关一带约 5000 余人，属机关部队；驻守在大沽南、北炮台守军约 4000 余人，配有各种火炮 60 门；此外在北塘一带驻军 2000 余人，在双港沿河两岸驻军 6000 余人；另有 3000 余人分驻新城、新河、草头沽等地，以接应炮台守军。

面对英、法、美等诸国的挑衅，咸丰皇帝指示直隶总督恒福同意允许英、法公使带 20 人，从北塘登陆，至天津去北京换约。

此时，英、法公使趾高气扬，拒绝了清政府的安排，坚持要沿白河经天津进北京换约，并提出了撤除天津白河、大沽防御，由他们自己乘军舰、带兵而

行的无理要求。

五月二十四日（6月24日）英海军司令贺布将最后通牒送到清军手中。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上午10时，英、法舰队向大沽炮台驶近。其中3艘直逼南岸炮台附近海面，并靠近清军在海面铺设的铁钺，派人潜入水中，用缆绳紧套铁钺，以炮艇开倒车，前后放倒10余架，然后放下浮标，以作航道标记。

清军派人告知：大沽一带为军事禁地，英、法如需赴津换约，可在北塘登岸，由清地方官吏护送。英法联军不听劝阻，舰队悍然越过铁钺，直接驶向炮台附近。

下午1时30分，英海军司令贺布下达攻击令，向大沽口清军南、北各炮台猛烈轰击，企图一举摧毁大沽南、北炮台。早已隐蔽伪装的清军南、北炮台守军，迅速掀掉火炮上掩盖的草帘，各炮台火炮向英舰队猛烈还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参战的英、法舰队几乎全部被击伤，其中旗舰“鸽鸟”号的舰长拉桑被弹片击毙，英海军司令贺布本人也中炮受伤，迫使贺布一再转移旗舰的标志旗。此次战役英海军阵亡官兵25人，受伤93人。

在激烈的大沽炮战中，直隶提督史荣椿率部坚守南岸炮台，多次指挥炮火还击，击沉敌舰，后终因腹部中弹，大呼杀贼而死。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北岸

炮台，亲自点火发炮，终因胸部中弹牺牲。此次大沽炮战 清军伤亡 32 人。

同日下午，英法联军联合舰队已溃不成军，有的沉没，有的搁浅，有的受伤。舰队司令贺布仍不死心，强行组织陆战队 1500 余人登岸，他们携带轻武器，向炮台南岸攻击。由于清军在沿海滩头开挖了壕沟、土墙等，英、法联军的陆战队一上岸便陷入困境，清军的火炮、抬枪齐发，联军陆战队官兵成了射击的靶子。英、法联军陆战队被迫就地隐蔽于芦苇和沟岸之中。直到夜幕降临，清军又以火弹喷筒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一批批英法联军陆战队官兵应声倒下，指挥官勒蒙本人也身负重伤。联军陆战队术穷力尽，不敢恋战，纷纷向回逃窜，直至第二天天明始行收队。

此次登岸的英法联军陆战队官兵伤亡达 448 人，几乎占整个陆战队的 1/3。

咸丰皇帝担心影响今后和议，一再告诫僧格林沁“驾驭外夷 终为议抚”。

六月(7月)英、法公使与他们的残舰败兵终于在美舰的掩护下灰溜溜地退出大沽，英公使普鲁斯和法公使布尔布隆逃到上海。一直充当帮凶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佯装若无其事，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入北京，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为美国捞到了不少利益。

正当西方侵略者把枪口逼近清政府的咽喉之

际，太平天国又重振旗鼓向清廷进攻。

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亲自执掌朝政，他首先恢复了前期五军主将制度，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等一批年轻将领，使太平天国后期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咸丰八年，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传檄 100 多名将领在安徽枞阳聚会，调动各路将领发动了著名的浦口大战，歼灭清军万余人，第二次击破江北大本营，打通了天京与江北通道。同年底，陈玉成在安徽发动了三河大战，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部 6000 余人，给湘军以沉重打击。

咸丰九年，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后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依据他在香港等地所学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篇》这一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张，其中绝大多数意见得到了洪秀全的支持和赞同。

咸丰十年，洪仁玕与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由李秀成等人率军从皖南入浙，迫使清军江南大本营援救杭州，而也就在清江南大本营援救杭州之际，太平军立即撤出杭州，迅速以五路大军合围江南大本营，迫使江南大本营主帅、钦差大臣和春逃至浒墅关自杀，江南提督张国樑逃到丹阳落水而死。至此，包围太平天国天京周围的江南大本营彻

底溃败。

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的两次崩溃，使咸丰皇帝气急败坏，连吐数口鲜血。以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这是他精心设计的钳制太平天国的重要战略步骤，如今江南、江北大营溃败，江南局势愈发不可收拾，加上此时洋人还虎视眈眈，不肯善罢甘休，妄图乘虚而入，大清王朝前途不堪设想。年轻的皇帝思想负担很重，前思后想，他力图寻找一块精神寄托之处。此时，他已逐渐失去了重振河山的雄心。

平心而论，咸丰皇帝早年确有一番抱负，他少年英发，风流倜傥，诗文书画皆有所长。登基之初，他对声色、娱乐还是有所克制的。然而由于种种努力无济于事，内忧外患日愈加剧，大清王朝江河日下，他外未能御侮，内未能定邦，加上国势日弱，其早年的英气奋发的锐气已逐渐消磨殆尽，此时他力图麻醉自己，纵情于声色之中，以寻求慰藉解脱。

西方侵略者并没有因为咸丰皇帝放纵而停止侵略中国的步伐。

英法舰队在天津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和法兰西，震惊了英、法侵略者，他们纷纷叫嚷“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报复”，并决定再次对华发动战争。

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1860年3月8日），英法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对大沽之战认咎，赔偿兵费，送还炮械、船只等，并允诺公使驻京和履行

《天津条约》限定清廷 30 天答复。此份照会通过两江总督何桂清转达清廷。咸丰皇帝谕何桂清转告洋人：如果真心换约，仍可以照美国公使样子，不带兵船，只带护从人员由北塘进京，完成使命。如要大沽撤防 则不可能 并提出要设法去掉《天津条约》中的游历内地和长江设码头条款等。

为了迫使清廷屈服，从而在华攫取更多特权和利益 英、法政府决定调集重兵 远涉重洋 同时分别任命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集谈判与战争大权于一身，再次来到中国。

英、法两国政府陆续从国内及各殖民地调遣了大批陆海军部队。

至咸丰十年六月（1860 年 7 月）英、法两国在华的各类军舰达 119 艘，其中英国 79 艘，法国 40 艘；来华的陆军部队总兵力达 28000 余人 其中英国陆军总兵力超过 20000 余人，由格兰特中将为司令；法国陆军总兵力也近 8000 余人，由孟托班中将统率。在这中间，英法联军还配备了突击力强的骑兵、炮兵以及工兵，企图直取津京。

咸丰皇帝也预料到英法联军来华报复，曾要求僧格林沁加强天津防务。僧格林沁在及时整修大沽沿海的防御工事后，也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

至咸丰十年六月，清军在大沽、天津一带兵力达 20000 余人，其中大沽一线守军 10000 名 营城一带

3000 名，天津守军 7800 余名，较之英法联军，兵力上并无优势。特别是此时咸丰皇帝一再告诫统帅僧格林沁“不可先行挑衅 实为要言”其基本方针是“避战求和”。统帅僧格林沁基于上次大沽之战的胜利，开始盲目乐观，甚至夸口：可将大沽一带水陆布防告诉英法联军，如其敢来，清军“必控胜算”等等，轻敌麻痹的危机已明显潜伏。

北塘在大沽口以北，是天津的门户之一。这里原有炮台，且埋设地雷，后由于清政府决定在此接待英、法公使登陆赴津 故命令清军撤离北塘 炮台、工事等皆废弃不用，成为不设防的地段。僧格林沁认为此处至天津间为荒地，联军未必会经此登陆，因此作出了弃守北塘，诱敌深入的部署。

英法联军在沙俄的指引下，确定联军“在北塘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会齐”。

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1860 年 7 月 30 日），英法联军 100 余艘战舰，集结于拦江沙外距海口四十公里处。

六月十四日（7 月 31 日）英法联军 30 余艘军舰运送陆战队驶至北塘河口。由于清军无一兵一卒把守，英法陆战队也就不费一枪一弹顺利登陆，占领了北塘一带村庄。

六月十七日（8 月 3 日）英法联军 2000 余人直扑唐儿沽清军营垒，僧格林沁急令德兴阿带马步卒

抵御 激战半日 联军被迫返回北塘。

六月二十六日（8月12日）黎明 英法联军集中 10000 余名步、骑兵 在炮车掩护下 兵分两路：一路以法骑兵为主力，配合英步兵进攻新河；另一路以英步兵主力进攻新河以北的军粮城。9时 清军蒙古八旗马队 2000 人，分两路迎击联军。由于英法联军炮火猛烈，清军蒙古八旗骑兵冒着敌人浓密的炮火，一排排倒下，又一排排跃起，终因敌强我弱，被迫后撤，退守至距大沽 8 里处的唐儿沽。

唐儿沽在新河北岸。唐儿沽城高 7 米 城墙上有机眼 40 个，与大沽仅一河之隔，是大沽炮台的后路。

六月二十八日（8月14日）凌晨 4 时 英法联军近 6000 人在炮车 100 余辆掩护下，从新城出发，6 时到达唐儿沽。7 时半，联军远程炮火向唐儿沽要塞猛烈轰击，清军守军还击。双方炮战持续了 1 个多小时，英法联军的援兵由苇塘袭击清军后路，唐儿沽守军腹背受敌，炮手大多英勇牺牲，其余守军被迫退守大沽。大沽两岸危在旦夕。

咸丰皇帝感到形势严峻，他一面命清军主帅僧格林沁退守天津，一面派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偕往北塘 伴送英、法特使进京换约。英、法联军执意攻占大沽，武装进京换约，不屑于与等级较低的清方代表会商。

僧格林沁感到事态严重，以为守天津不如守大沽，因此仍在增加两岸炮台力量，并沿河筑墙。

七月二日（8月18日）英法联军的工兵部队在唐儿沽与大沽间的白河上架桥，清军组织反攻。从七月三日到四日（8月19日—20日）驻守在白河两岸的清军以树丛、沟河为掩护，顽强地抗击英军。

五日（21日）英法联军以两个旅 10000 余人分两路猛攻大沽南、北炮台。凌晨 4 时，联军炮火猛轰，密集的炮火映红了天空，炮战一直持续到上午 8 时。联军陆战队直扑大沽北岸石缝炮台，清军官兵用大刀、长矛和弓箭与英法联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他们有的用刀劈英法联军，有的用弓箭射，有的甚至赤手空拳将联军官兵推入水壕，他们用尽了一切手上现有的东西，鲜血染红了战壕。直至中午，联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清军守军缺乏后援，守军一个个倒下，大沽北岸各炮台陆续被联军攻占，直隶提督乐善壮烈战死。

此次战斗，英法联军伤亡共 400 人，清军伤亡近千余人。

北岸炮台尽失后，南岸炮台难以扼守，僧格林沁遂令各营竖免战白旗。

僧格林沁本人则率余部于午夜撤赴通州。

从新河、唐儿沽直到大沽北岸炮台之战，清军共毙伤联军官兵 3000 余人。

七月八日（8月24日），英法联军舰队抵天津，守城清军不战而撤，联军入天津城。

咸丰皇帝见事态严重，急令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

此时，英法联军无意谈判，步步紧逼，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天津为商埠和赔偿 800 万银两的新条款，以及通州撤防和允许英、法公使带兵入京换约等一系列苛刻条件，态度极其蛮横，引起清廷上下不满，不少大臣上奏言战。

侵略者的骄横，朝廷上下的奏章，使得年轻的皇帝此时不觉热血上涌，竟亲笔指责桂良等人“怯懦无能”令其“不准与该夷盖印画押”同时他作出聚集兵力和与英法决战的决策，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亲统六师和洋人决战。英法联军遂决意兵临北京。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英法联军照会清廷，拟进兵通州。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 3000 余人自天津启程，为后进部队打先锋。中、英两军短兵相接。

咸丰皇帝只得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法谈判，拟答应英、法原先所提出的各项条件。眼看战争就要结束。

然而就在同一日，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巴夏礼却提出了须进京见大皇帝面递国书，且立而不跪，清

皇帝盖玺的条约批准书亦须当场交英国使节，及撤出通州清军防御部队等要求。咸丰皇帝见奏后，愤怒交加，他感到洋人反复无常，得寸进尺，最后的和平希望破灭。他坚持“洋人亲递国书”，必须“拜跪如仪”否则“万难允许”并指出这是国体所在。而对于撤除通州清军防御部队之事，无异于束手待毙，万难答应。

年轻的皇帝怒火与仇恨再度燃烧，终于决心与洋人再作一战。

此时，清政府已加强了在京城一带的防卫力量，通州一线由僧格林沁率从大沽一带撤回的马、步卒 17000 余人，同时咸丰皇帝还增加 3000 余人由其统一调遣，驻守在张家湾和郭家坟一带。另外瑞麟率 8000 余人驻守八里桥，胜保率 6000 余人驻守定福庄 总兵力达 34000 余人。与此同时，咸丰皇帝还先后调集西安、太原、绥远、归化、察哈尔、热河、山东、黑龙江、盛京、吉林和蒙古等各处兵力赴赶京师。

八月四日（9月18日）清三支军队与英法联军在张家湾一带展开一场激战。英法联军 4000 余人投入战斗，僧格林沁率部阻击。他根据咸丰皇帝旨意，下令扣留了巴夏礼以及英法人员共 38 人为人质 载垣等人拍手称快，他们甚至认为：巴夏礼就擒，夷人必乱，乘机出兵一定会稳操胜券等。

英法联军加大攻势，中午，联军步兵在骑兵掩护

下向张家湾清军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率马、步队还击。英法联军借机向僧部骑兵的马群施放火箭，战马受惊，冲击步兵队，整个部队队形大乱，以致不能成列，被迫撤退至八里桥，以扼守北京的通道。

● 火烧圆明园

英法联军攻占张家湾后，形势更为严重。

当天，咸丰皇帝发布上谕，宣布“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并嘱僧格林沁与瑞麟、胜保同心协力，抗击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乘势兵分三路，袭击清军八里桥大营。

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 20 多里，是僧格林沁所率的清军大营。

八月六日（9月20日）英法联军马队侦察出击，在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被僧部清军击退。

八月七日（9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 6000 余人在骑兵掩护下，向八里桥挺进。

英军格兰特中将统率的部队主攻西路；法军第一、二旅主攻东、南二路。英军格兰特中将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率部队直扑八里桥，僧格林沁率部抵抗西路的英军。僧部骑兵奋起还击，直冲到联军阵前，

双方鏖战多时，伤亡均甚重。清军奋力抵抗，为保卫京城，忠于清王朝的八旗将士几乎个个手持大刀、长矛，以血肉之躯和拥有火枪、大炮的英、法军队展开了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大决战。

清军八旗的骑兵全线出击了，一排排骑兵呼啸而出，又一排排倒下，他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仍大呼杀贼，视死如归，有的甚至一直冲到了敌军阵前，和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通州城外杀声阵阵，八里桥边沙土蔽日。英法联军的炮弹炸碎了石桥的栏杆，炸坏了桥上安放的石头老虎，可清军八旗的骑兵却仍勇敢地冲杀，倒下去的人立即由新的禁卫军所补充，连亲身参加这场战斗的一位联军目击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没有一个后退，全部以身殉职”。

英法联军占领了通向北京的道路，兵临北京城下。此时，英法联军也死伤枕藉，弹药物资均消耗甚多，暂时也无力向北京进发，急待休整，因此也就借清廷更换钦差大臣之机，同意恢复谈判，以此作为其补充弹药和给养的时机。

八里桥失守的当天晚上，清军溃败的消息即已传到京城。咸丰皇帝气急败坏，他所持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圆明园灯火终夜不息。他召集亲信大臣商议对策，一方面命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与英法谈判言和；一方面决定金蝉脱壳，在召集了惠亲王、

恭亲王等人作了最后安排之后，第二天清晨，咸丰皇帝即在扈从护送下匆匆出圆明园，前往热河行宫，名曰“北狩”。

这是清朝历史上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逃出京城，也是华夏 5000 年历史上第一个被西方人赶出皇宫的君主。尽管美其名曰“北狩”，也就是北出巡狩之意，按照清廷规矩，皇帝出巡至少准备半个月，沿途膳食行宫都得仔细安排。可这一次全无供张，既无跪迎官员，也无酒宴，甚至连几人合用的被褥也无人安排，凄凄惨惨，匆匆忙忙，咸丰皇帝甚至连圆明园美丽的秋景也无心看一眼，便仓皇而去。

八月十六日（9月30日）咸丰皇帝一行终于到达热河行宫，住进了烟波致爽殿。这里自嘉庆皇帝死后，已近 40 年无人来过，显得异常的荒凉、萧条，此时的咸丰皇帝如同惊弓之鸟，魂魄未定，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恭亲王奕訢在北京能与洋人和谈成功。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从背后击败僧格林沁部的清军八旗兵，他们以为清朝皇帝还在圆明园，便集中力量冲进圆明园。当天傍晚，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开始疯狂抢掠，自此整个抢劫持续了十余天。

圆明园是闻名世界的皇家花园，从康熙开始修建，已经历了 5 朝皇帝，将近 150 年，耗费近 2 亿两白银，终于建成了这座占地 5000 亩的中西合璧的世

世界级花园。它既有江南园林的秀丽，又有北方山水的雄浑，更兼中西庭园的合璧。作为皇家花园，它还藏有数不清的金银珠宝、陶瓷古玩、名人字画和孤本秘籍等。同时，这是咸丰皇帝诞生的摇篮，也是道光皇帝传位咸丰的地方，在咸丰皇帝的眼中，圆明园是可与紫禁城相提并论的地方。

穷凶极恶的英法侵略军蜂拥而上，扑向了这些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争先恐后，相互扭打，摔倒了又爬起，手上抓的、背上扛的、肩上搭的、口袋里装的，都是数不清的各种珍宝，他们成群结队地抢着，一时不能拿走的就扯破了，有的珍奇的孤本秘籍被当作废纸烧成灰烬。

英军统帅部较为“文明”明确规定军官或上午或下午人均半天轮流去抢。士兵当然也沾其光。法军则显得较为“粗鲁”不分军官、士兵不分时间全部上去大肆抢劫，每人都满载而归。为了公平地处理战利品，英法联军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拍卖，以便官兵直接将现金带回，与此同时，他们还向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也分别献上了一份抢劫的礼品。

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同时，还催促释放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从八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九日（10月8日—13日）僧格林沁先后分三次释放了巴夏礼等19人，另有20人在狱中死去。为了报复清王朝，英国公使作出了一项给清朝皇帝“永久性教

训'的决定。

九月五日（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数百名士兵和骑兵再次狂奔进入圆明园，他们四处纵火，整个圆明园顿时成为一片火海，熊熊烈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所有宫殿、宝物都化为了灰烬。

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恰好是咸丰继位10年，咸丰皇帝本人又恰是30岁。咸丰皇帝在热河获悉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当时站立不稳，口吐鲜血，终于病倒。

第五章 伤心国事

●城下之盟

当英法联军大肆焚烧、抢掠圆明园之际，恭亲王奕訢等人见形势危急，想抽身出逃，因其北行之路已被联军切断，故只得与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惊走万寿寺。内务府大臣、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投池而死，奕訢等人则不敢露面。

英法联军找不到和清政府进行接触的高级官员，他们希望在惩罚过清廷后，还能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们急切希望深谙清王朝情况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能尽快入城，帮助他们寻找躲藏起来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并劝说清朝王公大臣重开谈判。

此时，躲藏在北京的清廷官员，从文祥、瑞常直到崇伦、宝鋆等人，也在为摆脱困境而卑躬屈膝地请

求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固礼劝说俄国公使出面调停。固礼则建议这些官员们直接向俄国公使正式提出调停的请求，同时应允诺俄国政府的全部要求。

经过一夜的争论，走投无路的清廷王公大臣们终于同意并当面向伊格那提耶夫提出调停的要求，他们希望这位俄国公使能接受他们的请求。

从咸丰八年（1858年）以来，俄国驻华公使像走马灯似的连续换人。最先的公使是普提雅廷，此后是彼罗夫斯基，咸丰九年（1859年）则换为伊格那提耶夫。伊格那提耶夫是俄国陆军军官，曾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少将，被称为“外交能手”。此人是一位“聪明而又诡计多端”的人。他的主要使命就是迫使清廷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

从咸丰九年六月至咸丰十年四月（1859年7月—1860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清廷方面坚持，鉴于中俄《天津条约》已签订，因此所谓的《璦琿条约》是无效的；同时奕山仅仅是将黑龙江空旷的部分地方借给俄国，并未将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借给俄国。沙俄方面强调：清政府必须接受俄国提出的条件。中俄双方争论十分激烈。

清政府方面代表肃顺愤怒地将所谓的《璦琿条约》草本掷在桌上，大声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沙俄代表则大吵大闹，抨击清廷，甚至拂袖而

去，并要求清廷另派他人。

此后，伊格那提耶夫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北塘，并登上了“德日基特”号军舰直驶上海，去煽动英法联军扩大侵华战争。伊格那提耶夫利用其从北京到北塘之行的机会，刺探出清廷在天津北塘海口未设防的情况。当英法联军云集大沽口之际，他便以俄国公使身份公开向英法联军首领透露，“在北塘一道障碍物也没有碰到过”，为英法联军登陆天津提供了许多类似的重要的军事情报。

咸丰皇帝对沙俄公使是有一定警惕的，他宁可直接与英法联军交涉，也不要沙俄充当“调停人”。

由于大沽口失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咸丰皇帝便直接派大学士桂良和恒福等为钦差大臣，与英法联军谈判。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由于担心《璦琿条约》得不到承认，急忙赶赴天津，要求以“调停人”身份进京，被清廷拒绝。

在此情况下，沙俄公使转而大肆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包括北京详图和从天津到北京的道路等在内的地图和其他多种情报。

当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后，面对危急的形势，咸丰皇帝被迫违心地允令沙俄公使出面充当“调停人”。此时，伊格那提耶夫又拿起了架子，乘机要挟清廷，必须答应其全部要求，才肯出面“调停”。

九月三日（10月16日）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

夫进入北京，驻扎俄罗斯使馆，他主动向恭亲王奕訢提出赴英法联军处“代为说合”等等。此时奕訢病急乱投医，他的思路是：暂时先利用俄国公使。咸丰皇帝也同意了奕訢的方案。他亲自批谕：“不必拒绝。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如同将要溺死之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紧紧不放。

清廷王公大臣找到伊格那提耶夫，同意其充当清政府与英、法之间的“调停人”。伊格那提耶夫心里很高兴，乘势大吹所谓“俄国强盛”以及俄国在英、法诸国中的威望，同时又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对俄国来说，在边境线上对你方任何一地发动攻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接着，他又恶狠狠地吓唬清廷官员们：“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要炮轰京城了，还要烧掉皇帝的宫殿和你们所有的房子。”最后他才明确地向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说：“如今你们都该明白，只有俄国才是对清朝政府真诚亲善的，也只有它才能拯救你们，如果要我同意你们的请求，出面充当贵国和联军的调停人，那么你们必须满足我下列要求：

- 一、恭亲王必须立即向我提出进行调停的书面请求；
- 二、中国政府和欧洲进行谈判，必须就谈判内容事先征询我的意见；
- 三、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我首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即承认并批准《璦琿条约》。”

清廷的官员们赶紧找到恭亲王奕訢，他们用俄国公使的名义劝奕訢进城，直接和英、法两国的翻译进行接触，并由恒福、崇厚等人与英法联军的翻译具体商议了条约的草案。

关于签约的仪式和地点，英国公使额尔金坚持放在景山，清廷官员几次反对皆无效，最后只好求助于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由他劝说额尔金放弃在景山签约的要求，指出这样才能“顾及清廷的面子”和“不伤中国政府的心”等等。沙俄终于接受清廷建议放在礼部签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恭亲王奕訢与英公使额尔金在礼部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互换了中英《天津条约》。

十二日（25日）恭亲王奕訢与法公使葛罗在礼部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了中法《天津条约》。

在承认《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清政府又被迫同意：

- 一、开放天津为商埠；
- 二、准许华工出国；
- 三、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 四、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及财产，允许在各省传教、租地、建教堂；
- 五、赔偿英、法军费各 800 万两银子，恤银英国

50 万两，法国 20 万两。

法国侵略者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上，偷偷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这一内容在法文本上是没的。

英国侵略者则夺取了香港地区的九龙半岛。九龙在香港岛以南，是个多山环水的半岛。半岛上有九座山峰形似九条飞舞的龙，故得名九龙。九龙半岛不仅风光美丽，而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东临大鹏湾，西靠深圳湾，南有尖沙嘴，与香港岛隔水相望。英国殖民者认为它比香港岛的地理环境还要优越，因此一直在挖空心思从多方面寻找占领九龙的理由。英国海军的一名舰队司令名叫西马糜各厘的曾提出：占领九龙半岛是绝对必要的，一可以防止它沦入他国之手；二可以为香港提供安全保证和必要的供应，在台风季节还是英国船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等等。因此，英国侵略者决定耍弄老把戏，先占领，再签约。英军先是窜到尖沙嘴修建营房和炮台，派兵驻守，接着伺机占领。

咸丰六年（1856 年），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英国即想乘机夺取九龙半岛，但担心刺激法国等国家，引起分赃纠纷，便暂时未吭气。

咸丰九年（1859 年），英法联军强行闯入天津大沽口，遭到中国军队的还击，狼狈逃窜。

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再度侵华，英国

侵略者认为夺取九龙机会来了。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分子，他于二月（3月）即将一份炮制好的租借九龙尖沙嘴的文件交给了清政府两广总督劳崇光。这个文件称“由于‘不法之徒和其他坏分子’利用九龙半岛‘为非作歹，危害香港安全’因此提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一、中国当局派官员和军队到那里驱逐‘坏人’并必须常驻军队；二、如不能做到；则中国当局应当划出一条界线，把界线内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劳崇光见英军在尖沙嘴登陆，因此便在文件上签字。九龙半岛南端的 11.1 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落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

同年六月（7月），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给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一纸训令，认为：不能满足于对九龙半岛的永租权，而是很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全部割让。额尔金为保险起见，对这个阴谋一直秘而不宣，而当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1860年10月24日）即将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时，他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提出增加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的条款，限令清政府全权代表、钦差大臣奕訢“定于十一日未刻……盖印画押”奕訢只得接受。

同年年底，英国侵略军还强迫清朝官员前往九龙，举行所谓“授土仪式”。由趾高气扬的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将装着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清朝官员，

4 名清朝官员毕恭毕敬地将这袋中国泥土交给香港总督罗伯逊。

英国侵略者就这样乘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占领了九龙。

就在中英《北京条约》签约的这一天，英国陆军大臣已从伦敦发来通知，说：“英国公众……他们厌倦中国战争……在议会中也无人支持战争……除了结束战争，政府再也不能得到拨款。”

英法联军的军事首领在侵入北京安定门以后，便立即通知英、法公使：他们希望用 12 天时间完成所有一切。

而就在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咸丰皇帝刚批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之际，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便以促使英法联军从北京撤离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重开谈判。清刑部尚书瑞常等人赶到俄国东正教教会在北京的主持人的房间，与俄国人塔塔里诺夫和固礼等人接触，从每日上午 9 时直至下午方离开。为防止英、法两国专使获取其中讯息，俄方从不主动邀请瑞常等人去俄国公使住所。一旦中俄双方谈判受阻或进展缓慢之时，伊格那提耶夫便从幕后踱到前台，他大发雷霆，并对清廷的谈判代表加以威胁，“是我而不是别人，说服了英法联军撤离了北京”，而“现在要将他们召来……只要致函英法两国全权专使”等等，终于迫使清廷接受了中俄

《北京条约》。

九月二十六日(11月8日),咸丰皇帝发布谕旨对中俄《北京条约》所议条款“即着所议办理”并允许奕山、瑞常与俄国公使声明“即可定期画押盖印”。

二十七日(9日)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

十月二日(11月14日),奕訢代表清廷与伊格那提耶夫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至此俄国公使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其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璦琿条约》的内容,而且还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的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改为划归沙俄。因此可以说,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沙皇俄国政府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与此同时,沙俄政府还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的勘界原则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又强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样,沙皇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前后割占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十月五日(11月17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迫不及待派人携带中俄《北京条约》正本,赶回彼得堡向沙皇报功。

十月十日(11月22日)伊格那提耶夫洋洋得意地离开北京。他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即完成对华扩

张领土，狠狠地咬了清王朝一口之后，却还要清政府感恩戴德的作法感到暗暗高兴。

整个英法联军战争的最后阶段的两年时间里，清政府被迫两次订立城下之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这对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来说，如同虎落平阳，成了西方国家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咸丰皇帝感到非常痛心。

自此之后，德国、葡萄牙等国接踵而至，也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大清王朝的国门在纷至沓来的西方各国面前终于破毁洞开。

●天子蒙尘

咸丰皇帝在批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希望英法联军撤离北京后，能“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也正基于此，他在与英、法签订条约后，对英、法公使不肯放弃“公使带兵驻守”和“亲递国书”等条款感到十分恐惧。因为此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赔款之外，兵饷、口粮等均无着落，万一饷竭兵变，洋人反复，大局更不堪设想。加上此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天国起义尚未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咸丰斟酌再三：宁愿滞留热河，而不想贸然回銮。

尽管早在九月六日（10月19日）为了促成英法联军退兵北京，咸丰皇帝曾谕告奕訢“俟夷酋进城，即行前往画押换约……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等等，并任命奕訢留京议后“办理抚局”。在咸丰皇帝看来，所谓“办理抚局”其本意就是与洋人讨价还价，以便争取时间再作部署。咸丰皇帝未曾料到的是奕訢等人却在此时仗着与洋人谈判之机，假戏真唱，并乘机扩大了在北京的势力和地盘。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在热河的咸丰皇帝的猜忌和警觉，加上此时肃顺等人乘机中伤，行宫内外甚至谣传奕訢等人要借助洋人势力“以图不轨”等等，更使咸丰皇帝心中疑虑重重。

咸丰皇帝的统治后期，在宫廷内已逐渐形成了两大政治势力，到了此时则更加明显，即：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御前大臣载垣，郑亲王、领侍卫大臣端华等人为首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为首的“北京派”。

其中“热河派”主要是指随从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的一些王公大臣，如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瀚、焦裕瀛以及御前大臣、额附景寿和吏部尚书陈孚恩等人。这一派以肃顺、载垣、端华等为核心，深得咸丰皇帝宠信，他们主持朝政，起草政令，是有影响力的实权派。

“北京派”则是指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和谈签约的一批王公大臣，如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兵部尚书沈兆霖、内务府大臣宝鋆以及鸿胪寺少卿曹毓英等人。“北京派”以恭亲王奕訢为核心，该派在与洋人谈判的过程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逐步得到洋人的好感和支持，他们主张借助洋人力量剿杀太平天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河派”与“北京派”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其表现在关于咸丰回銮问题上，至少有三次大的冲突：

其一，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60年11月8日），北京派”以恭亲王奕訢为头，与大学士桂良、文祥和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请旨豫定回銮折》，明确提出：“近闻和议已成，迎銮有日……皇上为天下臣民之所仰望……况时届冬令……皇上以亿兆仰赖之身……尤冀及早迎銮，若乘舆早日还京，不但京内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亦为之一定。”

“热河派”对于“北京派”的回銮之请，无法明确拒绝，他们惟恐落入洋人虎口，便鼓动咸丰皇帝明谕。三天之后，咸丰皇帝以“惟时尚早”作了朱批，并指责胜保作为武将“亦不应干涉”。

其二，“北京派”在首次吁请回銮折被批回之后，又进行了组织发动，由恭亲王奕訢会同留京大臣等联合上奏《合词吁请回銮折》，再次提出：“夷兵现已

撤尽……切望及早回銮……以定人心。”

“北京派”针对“热河派”和咸丰皇帝恐惧落入洋人虎口的心理，明确告诉洋兵已撤尽，以去咸丰皇帝的疑虑。

尽管如此，“热河派”仍不同意回銮。载垣、肃顺等人以廷寄的形式阐述了暂缓回銮的理由在于：驻京公使亲递国书、洋人挟制和恐有后患等，咸丰皇帝则以“天气渐届严寒 朕拟暂缓回銮”把回銮之事推到了第二年，并明确下令禁止再奏。

其三，恭亲王奕訢在连续二次奏请回銮的要求遭挫之后，仍不灰心，他不顾载垣、肃顺等人代表皇帝所下的禁止再奏的禁令，九月三十日（11月12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咸丰皇帝回銮，他明确告诉咸丰皇帝：现在“夷酋已退，夷兵撤尽，为今日计 惟有仰恳圣驾回銮”。

载垣、肃顺等人无法再挡，只好请咸丰皇帝答复。以“究无确实把握”为由拒绝了奕訢的奏请。十月七日（11月19日）咸丰皇帝发上谕：“朕拟暂缓回銮 俟明春再降谕旨”把奕訢等人发动的回銮吁请活动明确推到了第二年再议。

奕訢等人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在回銮问题上没有得手，转而又提出奏请咸丰皇帝“西巡”的方案。

十月十三日（11月25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

桂良、以及文祥、胜保等人会商后 提出了“西巡”方案，“吁请圣驾西巡”；“莫若以西安为临幸之所”并具体抛出了《西巡事宜条款十条》，详尽而周密地做了这方面的计划安排。

载垣、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支持下 以“廷寄”形式答复奕訢等人，“西巡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图维……须俟明年二三月间，察看夷人如何举动，再行酌量办理”。

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度过了咸丰十一年春节。正月初 他曾考虑回銮；北京派“闻讯鼓舞 不久咸丰便又以“偶抱微疴”为由，而再度将回銮之日改期。

咸丰皇帝一再推迟回銮并拒绝“西巡”的举措，使得留在京城以奕訢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具折 痛劾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銮舆未还 皆其荧惑”。而肃顺等人则针锋相对 攻击奕訢等人是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

此时“北京”与“热河”两派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

咸丰皇帝执意不肯回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中间既有载垣、肃顺等人的阻挠，但更多的还是咸丰皇帝自己的考虑 包括他对“英法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事项仍未议改的疑虑。咸丰皇帝本人是一位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封建君主，其脑海深处深深地

烙印着‘华尊夷卑’的思想，在他看来，“与外使同居一城为耻”因此，“他宁愿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加上他此时个人病情时好时坏，“咳嗽不止，屡见红痰”，肺癆病已到晚期，更是疑神疑鬼。因而，当与洋人开始搭上线且关系日趋密切的恭亲王奕訢和大学士文祥等人提出亲赴热河给咸丰皇帝“请安”之时，咸丰皇帝特谕“著不必赴行在”并特别指出“文祥亦不必来”，拒见奕訢和文祥。

● 临终托孤

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夏季。这一段时间，咸丰皇帝虽以种种借口推迟回銮，由于圆明园被烧，加上太平军在东南一带尚未平息等等，咸丰皇帝显得十分心烦意乱。

每天当他见到捧进的盛奏折的黄匣子之时，他甚至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一匣折子即使粗粗浏览一遍，也要个把时辰，加上有的折子中话中有话，还得细细品味，留神研读，精批慎批，否则，搞不好就会掉进陷阱。除了这种正常的每天要进的黄匣子里的奏折外，有时还有紧急奏报的折子，其中如有关东南长毛的局势折子，更是随到随读随批，确实惹人心烦。

咸丰皇帝本是位风流皇帝，他少年英发，风流倜

饶 擅长于书画 尤擅画马 他对京戏不但能唱 还进行过理论钻研。他喜欢二黄（他说 黄冈、黄陂 二黄）居全国之中，高而不折，扬而不漫。他常亲召伶工进宫清唱，供奉切磋。应该说，早年的咸丰皇帝是抱有振兴大清的志向，因此他个人在娱乐方面还很理智，并有所克制的。然而由于时局日坏，面对土崩瓦解的半壁江山，咸丰皇帝在伤心国事的同时，他个人的意志和身体也随之急转直下。他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他开始寻找麻醉自己的地方，他在热河这一时期，除沉醉于美丽的湖光山色之外，把玩音律戏曲，还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好饮酒 每酒必醉 每醉必怒 每怒又必有宫女遭殃。然而他在酒醒之后又常懊悔不已。

咸丰皇帝有名位的皇后和妃嫔等先后共 19 人，由圆明园逃往热河随侍的后妃也有 13 人。然而他对她们仍感不称其意，又常额外寻开心。有位山西籍的孀妇曹氏 美貌冠群 加上她是裹脚的汉人女子“足尤纤小 仅及三寸”尤得咸丰皇帝欢心 使咸丰皇帝玩赏不已。

长时期的沉湎酒色，严重地损害了咸丰皇帝的身体。他体弱气虚，面部呈黄色。御医们建议其饮鹿血以补阳治病。咸丰欣然采纳，养了 100 多头鹿 命人取鹿血让其喝。

咸丰十一年六月九日（1861 年 7 月 16 日），咸丰皇帝 31 岁寿辰，面对肃顺等人精心安排的祝寿活

动，弱不禁风的咸丰皇帝勉强地接受了大臣们的朝贺，支撑着身体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如意洲的戏台听戏。尽管风景如画，凉风送爽，气候宜人，然而未待戏唱完，咸丰皇帝便已起驾还宫。

七月十二日（8月17日），是皇后钮祜禄氏25岁的生日“千秋节”。咸丰皇帝病情稍有稳定，便硬撑着身体参加“千秋节”。结果盛典未完便已倒下。

七月十五日（8月20日）是传统的中元节，这是民间供奉祖先的节日之一。极度衰弱的咸丰皇帝自知病情难以好转，生命危在旦夕。宫廷内外乱作一团，懿贵妃那拉氏赶紧把爱子送到咸丰皇帝身旁。

望着花团锦簇般的后妃们，望着活泼可爱的孩子，想着百孔千疮的大清江山，咸丰皇帝瞻前思后，他实在不愿死，也实在不想死，然而他却不得不考虑他死后的安排。他想到大清江山，想到了火烧圆明园的英法洋人，他想到长毛造反，在这中间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今后的孤儿与寡母。

咸丰皇帝先后有过两个儿子，长子载淳，二子早夭。在其19个后妃中，最早给他生下孩子的是丽贵人，这是咸丰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结果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竟是女孩，即以后的荣安公主，咸丰皇帝很不高兴。咸丰六年（1856年），懿嫔那拉氏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27日）下午2时给他生下了大阿哥载淳，咸丰皇帝欣喜万分，竟提笔写诗“庶慰在天六年望，更

欣率土万斯人”，并晋封懿嫔为懿妃。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晋封懿妃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父亲是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其原籍为满镶蓝旗，后因生下皇子载淳，“抬旗”入为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她在家里被人称为“兰儿”又称兰姑娘。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入宫，最初封号为兰贵人。

清朝的后宫制度，自康熙以后日趋完备，皇帝的正妻称皇后，主内治，居中宫。皇后以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随居东西各宫。为了稳定嫔妃来源，清朝的选秀女制度规定，从八旗女子中三年一选，由户部主办。入宫的秀女开始得到的封号为答应、常在、贵人，以后可凭机遇获晋升，但不能出宫嫁人。当然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实际执行中又是一码事了。清朝后宫制度等级森严，嫔妃的各种待遇都是根据各自的称号和地位决定的，据《清宫述闻·述内廷》记载：每年皇后俸银一千两，皇贵妃八百两，妃三百两，嫔二百两，贵人一百两，常在五十两，答应五十两。此外，在服饰、住宿、生活等各方面也都如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咸丰年间编撰的满

文《玉牒》，曾记载了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入宫的部分情况：

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征之女，咸丰四年甲寅二月封懿 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祖居满洲叶赫，其家族即叶赫那拉。据说，叶赫部是被努尔哈赤灭掉，于是后人便附会出兰姑娘叶赫那拉氏进皇宫，并终于听政掌权，使清王朝衰亡，正是应证了为叶赫部报复灭族之仇之说。

当然，爱新觉罗家族与叶赫家族的传说是否真实，如今已无法考证。但从历史上看，这两个部族之间是有过友好、也有过为敌的时期。

叶赫部的祖先是蒙古人，姓土默特，在始祖星根达尔汉时，灭扈伦那拉部，改姓那拉，是汉语“太阳”之意。此后，那拉部迁居叶赫河岸，称为叶赫那拉氏。当年，努尔哈赤为报祖父与父亲被杀之仇，便投奔了叶赫部，酋长扬吉努曾把小女儿孟古许配给他，此后纳林布禄也将妹妹孟古送与努尔哈赤，生下了儿子即清太宗皇太极。此后，叶赫贝勒布扬古将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纳林布纳之弟金台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应该说，两个部族之间关系开始是好的。

直至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

建州过程中最后灭掉叶赫部，缢杀了叶赫贝勒金台石和布扬古，并宣布“其叶赫部诸城军民皆弗罪”。

此后，叶赫那拉部落消失了，但作为叶赫那拉的家族却依然存在，并成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清朝历代皇帝后妃之中，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女儿还有不少，从皇太极的侧妃直到咸丰可以排出姓名的后妃至少有 6 人。叶赫那拉家族后裔在清朝任官封爵的更不在少数。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家族也是官宦，其曾祖父吉郎阿曾任内阁中书，此后任军机章京、刑部员外郎。祖父景瑞曾任刑部郎中，后因户部银库大量亏空银案件的牵连，被捕下狱。其父惠征变卖家产，四处告贷，凑足需赔银款 21600 两的六成，方使景瑞得以释放。惠征本人曾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员外郎、山西归绥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生二女二子。

长女即兰姑娘那拉氏。据说兰姑娘生来聪明伶俐，容貌出众，性格活泼，入宫之初被称为兰贵人。她是咸丰皇帝亲自过目挑选的，此后，她为咸丰皇帝生下了大阿哥，自然也就青云直上，加上她粗通汉字，也通满文，这在当时满洲女子中实属难得。

咸丰后期，咸丰皇帝体弱多病，心烦政务，想到万一百年之后，惟一的儿子载淳年龄尚幼，咸丰皇帝深知能帮助儿子处理军国重务的担子，除了宠信的大臣外，更多地将自然落在其生母那拉氏身上。那拉

氏本人当然也明白地看到这一点。因此，她多方设法了解朝廷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典章制度，并学习处理朝政的办法和驭下之道。她经常帮助咸丰皇帝批阅奏章，成为咸丰皇帝的得力助手，在此过程中也慢慢地培养了她的政治才干并扩大了其政治野心。

尽管有时咸丰皇帝对那拉氏干预朝政的作法和野心也颇感不快，并注意限制她，甚至有时想除掉她，但想到惟一的儿子载淳年龄尚幼，实际年龄不足6岁之时，咸丰皇帝便不得不调转念头。

想想这些，确实令人心烦意乱。咸丰皇帝自知死期不远，不觉一阵凄凉，在百般无奈之中，他想着大清江山和孤儿寡母，强打起精神，从大处着眼，设计了其死后的政治体制：以其信任的王公大臣为顾命赞襄大臣辅佐皇子，同时用皇后和懿贵妃力量来钳制顾命赞襄大臣，以防止各自擅权，形成互相牵制的一股均势，这样就会保证大清江山和皇子的平安。想到这儿，他的心情方有些平静。

在考虑顾命赞襄大臣人选时，咸丰皇帝首先考虑到的是肃顺、载垣、端华、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这一班自己继承皇位以来提拔重用的年富力强的王公大臣，其中：怡亲王载垣现为御前大臣，是咸丰皇帝的政治支柱之一，郑亲王端华是镶黄旗领侍卫大臣、步军统领，担负皇室警卫部队重任；穆荫曾任

理藩院尚书、兵部尚书，是咸丰倚重的军事与外交的重臣；匡源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左侍郎，是咸丰皇帝的财政总管之一；杜瀚是咸丰皇帝老师杜受田之子，时任军机大臣，其勇于任事，忠心不二；焦祐瀛是个很有写作才能的人，此时任军机大臣、太仆寺卿，是咸丰皇帝赏识的笔杆子。

这中间的核心人物、也是咸丰皇帝最为赏识的人是肃顺。此人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祁的七世孙，是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弟弟。他在道光朝仅是闲散的宗室，爵位是三等辅国将军。肃顺貌魁伟，眉目耸拔，为人机敏勤快，曾在咸丰皇帝召见时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之策，受到咸丰皇帝器重，步步升迁。他先后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銮仪卫使、乾清门御前侍卫、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肃顺敢于任事，不畏谤怨。他秉承咸丰皇帝“猛以济宽”的旨意，主张严刑峻法，不惜屡兴大狱。他曾监斩震撼晚清的“戊午科场案”，处死一品大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俊；并直接处理咸丰九年（1859年）“钞票舞弊案”等，使户部尚书周祖培、大学士翁心存等受到革职留任处分。肃顺对清王朝和咸丰皇帝不避劳怨，忠心耿耿，并为咸丰皇帝担了不少骂名，咸丰皇帝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因此，直到病逝前六天，咸丰皇帝还任命其为署正黄旗领侍卫内

大臣统帅侍卫亲军，可谓“炙手可热”。但是肃顺其人气势凌人、刚愎自用，却又使咸丰放心不下，尤其是他与载淳生母懿贵妃那拉氏关系紧张，皇后钮祜禄氏又过于老实，留下孤儿寡母，不由不使他担心大权旁落。但是，咸丰皇帝环顾左右，真正能保大清江山不落入洋人之手的，也只有肃顺这班人。因此就这一点，咸丰皇帝倒也放下心来。

真正使咸丰皇帝左右为难、放不下心的是恭亲王奕訢。按理将他放进顾命赞襄大臣之列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偏偏就是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让咸丰皇帝一直放心不下。对这位当年与自己竞争皇位的弟弟，其精明、干练和才气，咸丰皇帝是清楚的。对于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前坚决主张对外言战和认为洋人“居心叵测、日久难安”的看法，咸丰皇帝也是听得进且表示赞同的。然而就在奕訢留京与洋人谈判签定条约后，他频繁接触洋人，态度迥变，处处为洋人说话开脱，甚至认为洋人极为驯顺，与历代蛮狄不同，可以遣使通好、信义笼络等等，加上奕訢在其老丈人、大学士桂良支持下，提出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后又一再坚持将“通商”二字去掉，这显然是想在京城设立与洋人接触的官方正式机构，这是与大清典制不相符合的。特别是咸丰皇帝注意到奕訢在留京与洋人谈判期间，已笼络团结了一大帮留京的王公大臣，甚至连洋人也常常对奕訢

表示亲切之意，其势力之大已不可低估。想到清入关之初，顺治皇帝的叔叔多尔衮作为摄政王苛待世祖顺治之举，想到皇太后甚至被迫下嫁多尔衮等等，仿佛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一般，虚弱至极的咸丰皇帝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前思后想之后，他已深思熟虑，咸丰皇帝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奕訢的名字从其赞襄大臣的行列中抹去，而将道光皇帝的驸马爷景寿替换上去。

咸丰对自己设计的政治体制颇感满意，同时他也感到自己为大清江山和孤儿寡母的将来作了最后的努力，似乎隐约地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也就仅仅隔了一天，咸丰皇帝病势就明显加重起来。

七月十六日（8月21日）一早起来，咸丰皇帝便感到头重脚轻，晌午前后出现昏厥，随侍的御医们连灌了几次参汤才把他救过来，但精神却始终萎靡，稍一动弹便大喘不止。大臣们都被传聚到烟波致爽殿的西间，连皇子载淳也被带到门外不远处听候传唤。直到子夜，咸丰皇帝在还阳汤的支撑下才苏醒起来，强打精神，处理最后的事务。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廷《随手登记档》所记的七月十六日的情况：

本日子初三刻 寢宮召見共一起 御前

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端华、军机大臣穆、匡、杜、焦面奉谕旨，写朱谕递上发下当即发抄。

此时，咸丰皇帝已不能亲笔写字，故而召见大臣，口述谕旨由人代写，据当时在热河皇帝周围的目击者所写《热河密札》所记：

十六日午后晕厥……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子初三刻见，传谕清楚，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

咸丰临终前共发了两道朱谕：

一、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二、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尽心辅佐，赞襄一切政务。

应该说，咸丰皇帝去世之前头脑是清醒的。他首先确定载淳为皇位继承人；同时，由于载淳年龄尚不足6岁，因此，他又任命了八位大臣辅佐小皇帝，赞襄一切政务，以防止历史上母后控制幼子局面的出现。在基本确立了八位大臣辅佐的政治体制之后，为防止小皇帝大权旁落，他又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两枚随身印章：一枚“御赏”赐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枚“同道堂”赐给儿子载淳，由其生母懿贵妃代为保管，作为下达诏谕的信符。作为皇朝权力的象征，“御赏”

章为印起，“同道堂”为印讫。凡应用朱笔者以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有了这样二枚印章，皇后就有了权力参政，从而形成咸丰皇帝所设计的那种互相钳制的政治体制，即：借八大臣来辅佐小皇帝，以防止母后专擅。同时又用两印（“御赏”、“同道堂”）为符信，来控制八大臣擅权。这是咸丰皇帝为保证爱新觉罗家族牢牢控制皇权的应急措施。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1861年8月22日）凌晨，爱新觉罗·奕訢病逝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年仅31岁。

●垂帘听政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行宫的顾命赞襄大臣们照旧运转着大清王朝的国家机器。

他们首先公布了大行皇帝临终颁发的两道谕旨，立载淳为皇太子和八个赞襄大臣名单，接着又公布了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宣布为大行皇帝治丧，公布了为大行皇帝治丧的名单。并明确宣布奕訢等“北京派”人物“无庸赴行在”。

其次，他们还拟定了新皇帝的建元年号为“祺祥”，并根据清朝祖制家法精心设计了两宫皇太后的称谓，即：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

太后。前者住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称东太后；后者住西暖阁，称西太后。在这中间最关键的是：确定解决章奏处理的权限。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八个赞襄大臣之间斗争激烈，最后才议定为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印才能生效。

面对握有重权的八个赞襄大臣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颇有心计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感到势单力薄，她除了在宫里与东宫皇太后紧紧结成联盟，形如姐妹一般，她更多地考虑的是：必须在朝廷上有一班自己信得过的王公大臣。她把目光首先投向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北京派”集团。该集团人多势众，加上已攀上了洋人这条线，其力量颇为可观。再说，奕訢好歹也是大行皇帝的亲弟弟，“打仗还须父子兵”，只有与奕訢联手合作，才能对付肃顺这一班顾命大臣的专擅。

此时的奕訢因为被大行皇帝公开排斥在顾命赞襄大臣之外，眼睁睁地看着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也十分恼怒，他把这一切统统归咎于肃顺等人的挑唆。奕訢也急切地希望与两宫皇太后结盟，进入权力中心。

此时，奔走于两宫皇太后和奕訢之间的，主要是太监安得海和醇郡王奕譞等人。

有关安得海奔走于热河和北京之间的说法很多，有说是西太后用苦肉计的方法打了安得海，将其

遣送回京，也有的说是安得海化装成女尼，方得以潜出热河报信奕訢。

与安得海相比，奕譞联系奕訢就方便和容易得多。奕譞是咸丰皇帝奕訢和恭亲王奕訢的七弟 加上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奉旨婚娶了懿贵妃那拉氏的胞妹为福晋，因此，他既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又是西太后妹夫。他与西太后之间可谓是亲上加亲。他在咸丰九年八月（1859年9月）随咸丰皇帝同赴热河，此时年仅18岁 出入宫闱颇为方便 因此“受命驰还京 三日与恭亲至”等。

当然，有关两宫皇太后召恭亲王奕訢的说法还有其他多种，如有的说是两宫皇太后派厨役赴京，也有的甚至说醇郡王奕譞的福晋、西太后的胞妹派人送信等等。

不管何种说法，对奕訢来说，迫不及待赶往热河以便了解两宫皇太后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

八月一日（9月5日）晨 奕訢赶到了热河行宫，一见大行皇帝的梓宫 便“伏地大恸 声彻殿阶 旁人无不落泪”。他祭奠后 两宫皇太后便召见恭亲王 肃顺等人企图偕往，被两宫皇太后拒绝。此次召见前后约一个小时。

应该说，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此次会见 标志了两宫皇太后与“北京派”集团的联盟。双方确定，联手解决八大臣的时间为返京之后，并确定了两宫

皇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思路。

八月七日(9月11日)奕訢启程回京。

可以说，咸丰皇帝精心设计的这种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由于第三者的插足已难以维系。“太后派”与“北京派”的结合力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取全部权力，这就必然导致这种政治体制的失衡和最终破灭。

在“太后派”与“北京派”集团的密谋下，“北京派”集团中的头面人物之一、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人、御史董元醇首先上奏奏请“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此事董氏先向恭亲王和醇郡王透露，颇得支持。奏折到达热河时，载垣等人拟旨驳斥，而两宫皇太后则不表态，宣布此折“留中不发”。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斗争。

从八月十一日到十二日(9月15日—16日)，肃顺等人以本朝“无太后垂帘”等勃然抗论，声震殿陛，太后气得手颤，小皇帝载淳被这种大声争吵的场面吓得尿湿了衣服。载垣等人见太后不让步，便“决意搁车”，用丢担子的方式公开对抗。直至两宫皇太后让步，八大臣方才照常办事。从表面看，八大臣此时已经获胜，但从全局看，八大臣在政治策略上却犯下了重大错误，并最终导致了失败。

八月十日(9月14日)奕訢悄悄达京。他为调兵遣将忙得不可开交。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由热河启程回銮，载垣、端华等人随行。

肃顺等人则护送梓宫缓缓而行，返回京城。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到达北京。

三十日（2日）清晨，两宫皇太后召见群臣，西太后痛哭流涕，指斥肃顺等人“图谋不轨”。奕訢等人乘间请旨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革职拿问。

过一天，载垣、端华上朝来得很早，当时恭亲王奕訢和大学士周祖培等人与他们相见时，载垣气势汹汹大声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恭亲王奕訢答：“太后有诏。”说着，便大声传旨：“将载垣、端华革去爵职拿问。”

载垣、端华勃然大怒，言：“我辈未入，诏从何来？”

奕訢大喝一声：“给我拿下。”早已埋伏好的侍卫冲上来，将载垣、端华摘去帽子、拔掉花翎之后，捆的捆，绑的绑，推推搡搡地押走了。

景寿、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也都毫不费事地一一收拾。

同日晚上，肃顺等人护送大行皇帝梓宫到达密云县，刚刚睡下，醇郡王奕譞奉旨破门而入，将其五花大绑押进京城，关入宗人府。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皇太后以小皇帝名

义连发五道谕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谕内阁恭亲王奕訢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著桂良、沈兆霖、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与此同时，下令惩处所谓“八凶”并查处余党。

十月六日（11月8日），由内阁、宗人府、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全体人员通过了处置“八凶”的办法，即要求将载垣、端华、肃顺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与此同时，两宫皇太后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均是皇亲，照大清律议亲、议贵条文，决定降旨优待，赐令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

接着宣布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革职。其余党也分别或革职或发新疆效力等等。

一场宫廷内的刀光剑影的流血斗争，在咸丰皇帝死后不足百日，便告结束。

咸丰皇帝精心设计的互相制衡的八大臣辅佐的政治体制，随同肃顺等人命归西天而彻底告吹。这是咸丰皇帝未曾料到的。

随着咸丰皇帝遗命被否定，八个赞襄大臣精心设计的新皇帝的年号“祺祥”也被弃置，代之而起的新年号为“同治”即母子同治天下之意。而在这场腥风血雨的斗争中，西太后那拉氏终于在初试手段之后，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顶峰。

“北京派”集团和“太后派”在宣布“八凶”的八大

罪状时，其重要之处有二：一是对外国侵略者不能尽心议和；二是对太后听政不满，这大约是他们丧生和下台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也就在这一年，清政府“借师助剿”的政策正式确定，中外反动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终于联手来，将太平天国淹没在血泊之中。

正是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太平天国的硝烟之中，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总结语

从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经历了西方侵略者的两次沉重打击。从初破国门到国门破毁，这对大清帝国来说如同雪上加霜。西方侵略者终于用暴力即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手段，把中国纳入世界市场，从而使中国从孤立的状态渐变为世界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一场较量，这场较量的起因是西方的商品侵略，即西方企图奴役东方，而鸦片则只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可耻而又罪恶的鸦片贸易并扩大商品侵略而发动了对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历时两年的战争从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直到北京、天津终于以清王朝失败并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告结束。

随着战争的失败，西方侵略者先后把《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

头上，大清帝国的主权从领土、司法直到海关等遭到严重侵犯，主权大量丧失：割让香港岛，中国领土的主权开始丧失；外国军舰擅自在中国沿海港口航行，损害了中国的领海主权；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低关税率及协定关税，使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受到侵犯；还有在通商口岸租地造房、永久居住的规定，导致了此后“租界”的形成，使之成为西方列强侵华的据点和“国中之国”。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侵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中国传统的棉纺业和家庭手工业等日趋破产，丝、茶贸易等逐步为外商操纵，中国社会的经济呈现出半封建的状态，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逐步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西方资产阶级并没有因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而满足。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便向中国倾销更多的商品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英、法等国又在美、俄等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从 1856 年 6 月开始直到 1860 年 10 月结束，前后达 4 年之久。西方侵略者把战火从广东烧到北京、天津等地，直至攻陷北京城，火烧圆明园，

并把清朝皇帝赶出了皇宫。大清帝国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并与沙俄订立了《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等。清王朝被迫进一步开放了牛庄(营口)、登州(烟台)、潮州(汕头)、琼州、台湾(台南)、淡水、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 11 处通商口岸，被迫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被迫赔款英、法各 800 万两白银，被迫将九龙割让给英国，被迫允许由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并允许外国军舰可以驶入长江流域等。特别是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乘机吞并了中国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明确宣布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场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鸦片战争不仅是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而且它也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并没有麻醉中国人民，相反却起了惊醒的作用。”

正是由于外国资本入侵和鸦片的泛滥，加剧了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连绵不断的各族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终于汇合成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太平天

国起义，从 1851 年 1 月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开始，直到 1864 年天京陷落 前后历时 14 年 席卷 18 省，先后攻克了 600 余座城镇，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从道光皇帝、咸丰皇帝直到西太后等人，对西方侵略者，从抗争、屈服直到投降并先后与之勾结，特别是西太后等人在 1861 年发动北京政变 开始执行‘借洋助剿’的方针 终于把太平天国淹没在血泊之中，标志了中外反动派的正式勾结。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的思想界，它使得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中惊醒过来，开始把目光转向世界，注意学习、研究西方及外部世界，并明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种思想实际就是中国近代化的思想的启蒙和先驱。在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爱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面对来自西方的双重挑战，作出爱国主义的双重回应，即抵抗外国侵略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终于将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

[附录]

中英南京条约

(《江宁条约》)

1842年 8月 29日 道光二十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

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 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

1844年7月3日 道光二十四年

五月十八日 望厦

.....

一、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规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一切规费全行革除，如有海关胥役需索，中国照例治罪。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一、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挈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五港口之船只，载满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令者，应按规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国入官。

一、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议定租息，内民不得

抬价措勒，远人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倘坟墓或被中国人毁掘，中国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其合众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闲游，尤不得赴市镇私行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

中法黄埔条约

(《中法五口贸易章程》)

1844 年 10 月 24 日 道光二十四年

九月十三日 黄埔

.....

第二十二款 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 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佛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英北京条约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咸丰十年
九月十一日 北京

.....

第三款一、戊午年原约后附专条，作为废纸，所载赔偿各项，大清大皇帝允以八百万两相易。.....

第四款一、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许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

第五款一、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第六款一、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

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外，其有该地华民自称业户，应由彼此两国各派委员会勘查明，果为该户本业，嗣后倘遇势必令迁别地，大英国无不公当赔补。

.....

中法北京条约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咸丰十年
九月十二日 北京

.....

第四款 己未年在天津所定遗补第四款内载，中国赔补军需银二百万两，兹以删去；今复议定，赔补银共八百万两。在此数内，已收到去岁粤海关缴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零。其余银两，宜在中国各海关每年收税银若干，按五分之一扣归。其交银之时，系三个月交一次，首次宜于咸丰十年八月十七日起而于十一月二十日止。但所交之银，或纹银，或洋银俱可，其银应交大法国驻扎中国之钦差大臣，或所派之员亦可，但限于十月十八日在津郡一盘现交银五十万两。将来大法国驻扎中国钦差大臣暨中国大臣各派委员，会议定立如何交收银两，如何立定收单等事，再为妥定。

第五款 中国今所赔补之银本系为军需 又为法国商人及其所保护者在广东省城所有行内物件被百姓或烧、或劫。将来大法国将此赔补之银，均公充分摊与被累之法国人；其银扣一百万两，派与法国民人及其所保护者，为补其害，或慰其苦，其余皆抵军费。

第六款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 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

中俄北京条约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
俄历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

第一条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璦琿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琿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其地图上必须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为据。

上所言之，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牌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

第二条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

第五条 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库伦准设领事官一员，酌带数人，自行盖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间若干，并喂养牲畜之地，应由库伦办事大臣酌核办理。中国商人愿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亦可。俄罗斯国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国通商之区一处往来，人数通共不得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与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人多少、前往某处贸易、并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所有路费由该商人自备。

第六条 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一律办理。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屋、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并给与设立坟墓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与空旷之地。

一块，以便牧放牲畜。以上应给各地数目，应行文喀什噶尔大臣酌核办理。其俄国商人，在喀什噶尔贸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进卡抢夺，中国一概不管。

.....

中国近代史大事年表

道光十八年(1838 年)

闰四·一 (6·2) 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禁鸦片

八·二(9·20) 湖广总督林则徐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主张严禁鸦片

十一·十五 (12·31) 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东禁烟。

道光十九年(1839 年)

一·二十五(3·10) 林则徐抵广州

二·四(3·18) 林则徐传见十三洋行行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并具结保证嗣后永不夹带

四·二十二—五·十五(6·3—6·25) 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余万斤

七·七(8·15) 林则徐下令禁止供给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工人

七·二十七(9·4) 英国兵船在九龙附近炮击广东水师兵船,清水军抗击

八·二十四(10·1) 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侵华

九·二十八(11·3) 英舰在穿鼻洋挑衅,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抗击

十一·一(12·6) 林则徐奉道光帝命令,停止中英贸易

道光二十年(1840 年)

一·十八(2·20) 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

三·九(4·10) 英议会正式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决定派兵侵华

- 五·二十(6·21) 英舰船四十八艘,士兵四千余人,陆续开抵广东海面,鸦片战争开始。
- 五·二十九(6·28) 英舰封锁广州江面与海口,主力北上。
- 六·七(7·5) 英军攻占定海知县姚怀祥死难。
- 七·十八(8·15) 乔治·懿律向清政府投递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赔款、割地等侵略要求。
- 八·四(8·30) 直隶总督琦善受道光帝命,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
- 八·二十二(9·17) 道光帝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
- 九·八(10·3) 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 十一·六(11·29) 琦善到达广州;乔治·懿律因病返英。
- 十二·十五(1841·1·17) 英军乘琦善裁撤海防,向大角、沙角炮台进攻,守将陈连陞父子力战牺牲。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 一·三(1·25) 查理·义律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
- 一·四(1·26) 英军强占香港。
- 一·五(1·27) 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驰往广东。
- 二·六(2·26) 英军攻虎门,虎门失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
- 四·一(5·21) 英舰驶入虎门。
- 四·四(5·24) 英军攻陷广州城郊泥城、四方两炮台。
- 四·七(5·27) 余保纯与查理·义律订立《广州和约》。
- 四·十(5·30) 广州郊区三元里一百零三乡民众聚集于牛栏岗,抗击英军。
- 四·十一(5·31) 三元里附近番禺、南海、花县各乡义勇数万人包围四方炮台。
- 五(6) 广州北郊八十余乡联合组织抗英义勇,成立昇平社学东北郊、南郊先后成立东平社学、南平社学、隆平社学等。

- 六·二十四(8·10) 英国新任全权公使璞鼎查到达中国
- 七·十(8·26) 英舰队突袭厦门,厦门失守
- 八·十七(10·1) 定海再次失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战死。
- 八·二十六(10·10) 镇海失陷,总兵谢朝恩战死,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国,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逃
- 八·二十九(10·13) 宁波失陷
-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 一·十六(2·25) 奕经率军到达浙江绍兴
- 春 浙江镇海、宁波黑水党,多次奇袭英军。
- 一·二十九(3·10) 奕经率军反攻宁波、镇海,失败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开始求和活动
- 五·八(6·16) 英军占领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19日攻陷上海
- 六·十四(7·21) 英军攻陷镇江,副都统海龄自缢。
- 七·八—九(8·13—14) 英军向清政府提出议和条件
- 七·二十四(8·29) 耆英全部承认英军提出的条件在南京订立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 五(6) 洪秀全开始劝人拜上帝
- 八·十五(10·8) 璞鼎查与耆英在广东虎门签订《虎门条约》
- 九·二十六(11·17) 上海开埠
- 本年 英国在香港设立码头,向华商收税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 四·五(5·21) 洪秀全、冯云山入广西活动。
- 五·十八(7·3) 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 九·十三(10·24) 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 十(11) 洪秀全返广东冯云山仍在广西桂平紫荆山活动

清政府设立五口 通商大臣由两广 总督兼任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

十一·一(11·29) 上海道宫慕久与 英驻沪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这是外国在华设立租界的肇始

十二 (1846·1) 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广州城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

三·三 (3·29) 福州英人横行，群众捣毁洋馆

八(9) 湖南宁远天地会胡有禄起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

六·十·(7·21) 洪秀全再次到广西，与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制定《十款天条》

七·二十七(9·6) 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

九·十 (10·18) 湖南新宁天地会雷再浩起事

九·十六(10·26) 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

三·三(4·6)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号令拜上帝会众

九(10) 冯云山出狱，赴广东花县

本年 广东钦州、横山等地天地会联合起事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

三(4) 广州社学群众十万人守卫珠江两岸，取得反入城斗争第三次胜利

五(6) 洪秀全、冯云山复返广西桂平紫荆山。

沙俄海军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

道光三十年(1850 年)

一·十四(2·25) 道光帝死

一·二十六(3·9) 咸丰帝 奕訢 即位

五(6) 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命各地拜上帝会员向金田集中。

七·六(8·13) 沙俄强占中国黑龙江口庙街,改名尼古拉也夫斯克。

十一·二十九(1851·1·1) 拜上帝会众与清军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展开战斗,大败清军。

十二·十(1851·1·11)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咸丰元年(1851年)

闰八·一(9·25) 太平军攻克广西永安州。

十·二十五(12·17) 洪秀全在永安封王。

咸丰二年(1852年)

二·十六(4·5) 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桂林。

四·十八(6·5) 太平军蓑衣渡之战。冯云山伤重牺牲。

四·二十五(6·12) 太平军克湖南道州,决定进取南京的战略方针。

五(6) 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檄文。

七·三(8·17) 太平军攻占郴州。

七·二十九(9·12) 萧朝贵在进攻长沙时中炮牺牲

十一·三(12·13) 太平军占领岳州,获得大批船只,建水军。

十一·十三(12·23) 太平军克湖北汉阳,围攻武昌,29日占汉口。

十一·二十九(1853·1·8) 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

十二·四(1853·1·12) 太平军攻克武昌。

咸丰三年(1853年)

二·十(3·19) 太平军攻破南京。

二·二十(3·29)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

- 二·二十二(3·31) 罗大纲等率太平军攻克镇江,清钦差大臣向荣建立江南大营。
- 二·二十三(4·1) 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太平军攻克扬州
- 三·九(4·16) 清钦差大臣琦善、胜保建立江北大营。
- 三·十六(4·23) 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 四·一(5·8) 林凤祥等率太平军北伐。
- 四·七(5·14) 福建同安小刀会黄得美、黄威起义。
- 四(5) 林俊领导红钱会在福建永春起义。
- 四·十二(5·19) 胡以晃、赖汉英率太平军攻克和州,西征开始。
- 八·五(9·7) 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发动起义。
- 九(10月底) 北伐军攻占静海、独流,逼近天津。
- 冬 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 咸丰四年(1854年)
- 四·二(4·28) 西征军于靖港大败湘军,同时,湘军水陆进攻湘潭。
- 四·五(5·1) 湘潭失陷,太平军突围走靖港。
- 四·三十(5·26) 沙俄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兵站
- 五·四(5·30) 北伐军李开芳率军占领山东高唐州。
- 六·二(6·26) 西征军再克武昌。
- 六·十一(7·5)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公布。
- 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在佛山镇起义。
- 六·二十六(7·20) 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十余万人围攻广州。
- 七·一(7·25) 湘军攻陷岳州。
- 八·二十三(10·14) 湘军及湖北清军反攻武汉,武昌、汉阳相继失守。
- 十二·十二(1855·1·29)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湖口大败湘军。
- 本年 湖南宁远胡有禄率天地会起义军与朱洪英攻克广西灌阳,建号昇平天国

咸丰五年(1855 年)

- 一·一(2·17)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 刘丽川牺牲。
- 一·十九(3·7) 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 于 15 日在北京就义。
- 二·十七(4·3) 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
- 四(5 月中旬) 沙俄再次武装侵入黑龙江, 并迁来大批“移民”。
- 四·十六(5·31) 清兵引水灌冯官屯, 李开芳被诱俘, 北伐失败。
- 七(8) 捻党首领张乐行召集各地捻党首领在雒河集会盟, 建黄、白、蓝、黑、红五旗军制。

咸丰六年(1856 年)

- 三(4) 秦日纲与镇江守将吴如孝大败清军, 解镇江围, 渡江克扬州、浦口, 破江北大营。
- 三一五(4—6) 英、法、美在广州进行第二次修约交涉。
- 五·十八(6·20) 太平军第一次破江南大营。
- 八·四(9·2) 太平天国内讧, 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等。
- 八(9月中旬) 石达开赶回天京, 谴责韦昌辉, 韦欲杀石, 石缒城逃走, 全家被杀。
- 九·十(10·8) 英国侵略者挑起“亚罗”号事件。
- 九·二十五(10·23) 英舰向广州进犯, 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 九(10) 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樑重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重建江北大营。
- 十·十一(11·8) 石达开自安庆出师, 东讨韦昌辉。不久, 洪秀全诛韦昌辉、秦日纲, 石达开回京辅政。

咸丰七年(1857 年)

- 四(6 月底) 石达开离京出走, 带走约二十万太平军。
- 十一·十二(12·27) 清军江南大营攻陷镇江, 围困天京。
- 十一·十三(12·28) 英法联军炮击广州, 次日广州沦陷。
- 十一·二十一(1858·1·5)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咸丰八年(1858年)

- 三·四) 英、法、俄、美公使率舰陆续到达天津白河口。
- 四·七(5·19) 湘军攻陷九江。
- 四·八(5·20)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
- 四·十(5·22) 穆拉维约夫率兵侵犯瑗珲，次日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领土要求。
- 四·十六(5·28) 沙俄用武力胁迫奕山签订中俄《瑗珲条约》。
- 四·二十一(6·2) 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京津军务。
- 五·三(6·13) 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 五·八(6·18) 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 五·十六(6·26) 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 五·十七(6·27) 签订中法《天津条约》。
- 五·二十八(7·8) 英法联军撤离天津。
- 八·二十(9·26) 太平军发动浦口战役，第二次破江北大营。
- 十·十(11·15) 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大破湘军，取得三河大捷，安庆之围不战自解。

咸丰九年(1859年)

- 三·二十(4·22) 洪仁玕由香港来天京，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向洪秀全呈上《资政新篇》，后颁行。
- 五·二十五(6·25) 英法联军轰击大沽炮台，被清军击退。

咸丰十年(1860年)

- 一·二) 英法政府再派额尔金、葛罗为特使，率军侵华。
- 闰三·二(4·22) 英法联军侵占舟山。
- 闰三·十六(5·6) 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
- 四·十三(6·2) 太平军攻克苏州，建立苏福省。美国人华尔在上海组成洋枪队。
- 六·二十四(8·10) 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

江南军务。

- 六·二十八(8·14) 英法联军攻占塘沽。
- 七·八(8·24) 英法联军占领天津。
- 七(8) 洋枪队两次进犯青浦,被击退,太平军乘胜收复松江。
- 八·七(9·21) 英法联军进攻八里桥,次日咸丰帝逃往热河。
- 八·二十二(10·6) 英法联军开始抢劫圆明园。
- 八·二十九(10·13) 英法联军控制北京。
- 九·五(10·18) 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
- 九·十一(10·24)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
- 九·十二(10·25) 签订中法《北京条约》。
- 十·二(11·14) 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 十二·十一(1861·1·20) 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咸丰十一年(1861年)

- 七·十七(8·22) 咸丰帝病死热河。子载淳继位。
- 八·一(9·5) 太平军保卫安庆失败。
- 九·二十九(11·1) 慈禧太后回京,与恭亲王奕訢等发动“祺祥政变”,免除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大臣职。
- 十·五(11·7) 改年号“祺祥”为“同治”,两宫太后听政,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 十·六(11·8) 下诏杀肃顺,令载垣、端华自尽。
- 十·十八(11·20) 清廷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
- 十一·二十八(12·29) 李秀成部占领杭州。
- 十一(12)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
- 十二·八(1862·1·7) 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

同治元年(1862 年)

五·八(6·4) 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就义。

八·二十九(9·22) 太平军在浙江慈溪击毙常胜军领队华尔。

闰八·十九(10·12) 左宗棠在浙江与法国侵略军组成“常捷军”，
由法军水师副将勒伯勒东统领。

闰八·二十(10·13) 李秀成率部援天京，与湘军在雨花台激战。至
11月 26日天京解围战失利。

十一·二十八(1863·1·17) 太平军在绍兴击毙“常捷军”统领勒
伯勒东。

本年 京师同文馆在京成立。

同治二年(1863 年)

二·五(3·23) 捻军首领张乐行被俘。

四·二十五(6·11) 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灭;6月 25
日在成都被杀。

十·二十四(12·4) 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被杀害，次日苏州失守。

本年 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拟在上海建立机器厂。

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

同治三年(1864 年)

一·二十一(2·28) 清军攻陷天京钟山要塞天保城。

四·二十七(6·1) 天王洪秀全病逝。

五·三(6·6) 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

六·十六(7·19) 天京失陷。

七·六(8·7) 李秀成在南京被曾国藩杀害。

九·九(10·9) 洪仁玕等在江西广昌被俘执。二十五日幼天王被
俘执。

十·九(11·7) 西北太平军在霍山兵败，扶王陈德才自杀殉国。

十·二十(11·18) 幼天王在南昌遇害。

十·十一(11·23) 干王洪仁玕在南昌就义。

十一(12) 捻军和西北太平军结合，推遵王赖文光为领袖。

本年 李鸿章在苏州设西洋炮局。

同治四年(1865年)

四·一十四(5·18) 捻军赖文光、张宗禹等在山东大败清军，杀死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

八·一(9·20)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建立

本年 金陵机器局在南京建立

汇丰银行成立。

同治五年(1866年)

九·十二(10·20) 捻军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等率东捻军，张宗禹等率西捻军。

十一·一(12·7) 清廷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剿捻。

本年 福州船政局在福州建立。

同治六年(1867年)

一·十八(2·22) 清廷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

三(4) 天津机器局在天津建立。

十·二十六(11·21) 清廷派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为出使大臣，赴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

十二·十一(1868·1·5) 东捻军失败，赖文光在扬州被俘，10日就义。

同治七年(1868年)

六·九(7·28) 中美签定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六·二十八(8·16) 西捻军败于山东在平徒骇河，张宗禹牺牲(一说不知所终)，捻军起义至此失败。

同治八年(1869年)

十一·二十(1870·1·2) 四川酉阳发生反洋教斗争。

同治九年(1870 年)

- 五·二十三(6·21) 天津教案发生。
- 五·三十(6·28) 清廷派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
- 十·十二(11·4) 天津机器局建成。

同治十年(1871 年)

- 五·十七(7·4) 俄军占据伊犁。
- 本年 左宗棠设兰州机器织呢局。

同治十一年(1872 年)

- 三·二十三(4·30) 美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
- 七·九(8·12) 容闳等率第一批学生詹天佑等三十人赴美留学。
- 十一·二十三(12·23) 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二年(1873 年)

- 一·二十六(2·23) 慈禧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
- 十·一(11·20) 安邨率法军占领越南河内。
- 十一·五(12·24) 刘永福率黑旗军与法军战于河内,杀安邨。

同治十三年(1874 年)

- 四·八(5·23) 沙俄拒不交还伊犁,清廷命左宗棠率部迅速西进。
- 四·十八(6·2) 日军分三路进攻台湾。
- 九·二十二(10·31) 中日议定《北京专条》。
- 十二·五(1874·1·12) 同治帝死 载湫(光绪帝)即位。
- 十二·八(1874·1·15) 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1875 年)

- 一·十六(2·21) 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永昌被打死。
- 八·一(8·31) 清廷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为清政府正式派遣常驻各国公使的开端。

光绪二年(1876 年)

- 闰五·九(6·30) 淞沪铁路通车。4 月后,清廷收买该路后拆毁。
- 闰五·二十九(7·20) 清军击败阿古柏部,攻占乌鲁木齐,平定天

山北路

七·二十六(9·13) 英借口 马嘉理案,与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

光绪三年(1877年)

四(5) 左宗棠率军相继克复达坂城、鲁克沁、吐鲁番等地,阿古柏败逃自杀。

本年 四川机器制造局在成都设立

李鸿章派唐廷枢在滦州筹办开平矿务局。

光绪四年(1878年)

五·二十二(6·22) 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前往谈判索还伊犁问题。

十一(12) 海关附设邮政局。

本年 道员朱其昂在天津设立贻来牟机器磨坊,使用蒸汽机磨面。

光绪五年(1879年)

三·八(3·30) 日本侵占琉球,废琉球国王,改为冲绳县。

八·十七(10·2) 崇厚在俄谈判,擅订《里瓦基亚条约》。

光绪六年(1880年)

一·三(2·12) 清廷任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取代崇厚继续对俄谈判。

八·十四(9·18) 天津设立电报总局。

本年 天津设立水师学堂。

光绪七年(1881年)

一·二十六(2·24) 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六·一(6·26) 吉林设立机器局。

九(10) 英商创办上海自来水公司。

十·十(12·1) 第一条电报线(上海至天津)敷成并使用。

光绪八年(1882年)

三·六(4·23) 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

九·十八(10·29) 中俄签订《伊犁界约》。

十·十一(11·21) 李鸿章与法驻华公使签订备忘录，初步确定中国撤退驻越武装，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和不贬削越南国王的权力，开放保胜为商埠

本年 李松云在上海设立均昌机器船厂，广州商人合股设立造纸厂

徐鸿复等在上海集股设立同文书局，购置机器，影印古书。

光绪九年(1883年)

四·十三(5·19) 黑旗军大败法军，取得纸桥大捷。

九·二十三(10·23) 中法谈判终止。

光绪十年(1884年)

二·二十三(3·20) 越南太原为法军所陷。

四·十一(5·4) 清廷命李鸿章办理中法和议。

四·十七(5·11)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闰五·一(6·23) 法军挑起谅山事变，被守军击退。

闰五·二十(7·12) 法驻华代公使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

六·十四(8·4) 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进犯台湾基隆。

六·二十九(8·19) 法代公使借口基隆事件，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

七·三(8·23) 马尾海战爆发，福建水师船舰大部被毁。

七·六(8·26) 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八·十三(10·1) 孤拔率法国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进攻基隆，次日占基隆。

八·二十(10·8) 法舰炮轰淡水炮台，被守军击退。登陆的法军亦遭溃败。

九·五(10·23) 孤拔宣布封锁台湾。

九·三十(11·17) 清廷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任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督办新疆事务。

光绪十一年(1885 年)

- 一·九(2·23) 法军占领镇南关。
- 二·六(3·22) 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议和。
- 二·八(3·24) 清将冯子材等取得镇南关大捷。
- 二·十九(4·4) 中法签订《停战条件》。
- 二·二十二(4·7) 清廷诏令前线停战。
- 三·四(4·18) 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
- 四·二十七(6·9) 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越南条款》，
中法战争结束。
- 九·五(10·12) 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刘铭传为台湾巡抚。
- 九·六(10·13) 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 年)

- 十·十一(11·6) 《天津时报》创刊，李提摩太任主笔。
- 本年 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在天津合资设立自来火公司。李鸿章在天津筹建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1887 年)

- 十·十七(12·1) 中葡《北京条约》签订。
- 本年 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
张之洞在广州设机铸制钱局，开设广东水师学堂。

光绪十四年(1888 年)

- 六·7) 张之洞在广州筹设枪炮厂。
- 九·10) 康有为上万言书，请求变法，未达。
- 十一·十五(12·17) 北洋海军正式建立，任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光绪十五年(1889 年)

- 二·三(3·4) 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
- 八·二(8·27) 芦汉铁路开始筹办。
- 十二·八(12·29) 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

光绪十六年(1890年)

二·二十七(3·17) 中英签订《藏印条约》，英国向西藏地区伸展侵略势力。

七·二十九(9·13) 海军衙门准允汉阳铁厂筹办。

本年 上海商人设立燮昌火柴公司

光绪十七年(1891年)

四·六(5·13) 芜湖教案发生。

四·二十九(6·5) 武穴教案发生。

七(8) 康有为设万木草堂学馆于广州长兴里，讲学著书。

七·二十九(9·2) 宜昌教案发生

光绪十八年(1892年)

二·十五(3·13) 杨衢云、谢缙泰在香港设立辅仁文社。

六·三十(7·23) 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

光绪十九年(1893年)

一·一(2·17) 《新闻报》创刊于上海。

十·二十八(12·5) 中英签订《藏印条款》。

光绪二十年(1894年)

二·十一(3·17) 签订《中美华工条约》。

四·二十九(6·2)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

五·十七(6·20) 李鸿章要求俄使喀希尼出面调停朝鲜事，中日撤兵。

五(6) 孙中山赴天津上书李鸿章。

六·二十一(7·23) 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组织傀儡政府。

六·二十三(7·25) 日舰击沉中国运兵船“高陞”号并击伤“济远”等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七·一(8·1) 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同日宣战。

八·十六(9·15) 日军进攻驻平壤清军，左宝贵战死。

- 八·十八(9·17) 黄海海战发生,互有损失,清海军管带邓世昌等战死
- 九·一(9·29) 慈禧太后起用奕訢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沙俄,共同调停中日战争
- 九·二十六(10·24) 日军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进犯旅顺、大连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边境。
- 九·二十八(10·26) 日军占领九连城和安东。
- 十·九(11·6) 日军陷金州。
- 十·十(11·7) 日军占大连。
- 十·二十五(11·22) 日军占旅顺。
- 十·二十七(11·24)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 一·五(1·30) 日军占领威海卫南帮炮台。
日本公开指名要李鸿章为全权代表。
- 二·十八(2·12)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17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 二·十九(2·13) 清廷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
- 二·二十七(2·21) 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后,成立香港兴中会,旋在广州设立兴中会分会,谋划发动广州起义。
- 二·十二(3·8) 康有为、梁启超自广东到北京。
- 二·二十(3·16) 孙中山、杨衢云等在香港谋划攻取广州
- 二·二十四(3·20)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开始议和谈判。
- 三·二十三(4·17)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 三·二十九(4·23) 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外务省,要求放

弃辽东半岛。

四·七(5·1) 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在京会商拒约自强。次日上书都察院，即公车上书。

四·八(5·2) 清廷批准中日和约。

四·十(5·4) 日本政府向俄、德、法三国政府声明愿放弃辽东半岛

四·二十九(5·23) 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

五·六(5·29) 日军在台湾登陆。

五·一(6·2) 清廷派李经方办理割让台湾手续。

闰五·十九(7·11) 台湾义军反攻新竹。

六·七)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

六·十一(8·1) 古田教案发生。

七(8) 帝党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叙》。日军占领台湾大甲溪、台中、彰化等地。

九·四(10·21) 台南陷落，日军占领全台。

九·九(10·26) 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次月陆皓东等就义。

十·二十二(12·8) 清廷命温处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就胡燏棻定武军扩练新建陆军。

十一·二十八(1896·1·12) 康有为于上海创刊《强学报》。

十二·六(1896·1·20) 清廷谕令封禁北京强学会。

本年 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立张裕酿酒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四·二十二(6·3) 中俄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七·一(8·9) 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

九·五(10·11) 孙中山被诱禁于伦敦中国使馆，后因康德黎等的援救获释。

本年 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 一·二十一(2·22) 康广仁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
- 二·十三(3·15) 法国强迫清廷同意海南岛不割让他国。
- 三·七(4·8) 康有为在桂林发起组织圣学会，并出版《广仁报》。
- 三·二十一(4·22) 江标、唐才常等在湖南创办《湘学新报》后改为《湘学报》。
- 七·五(8·2) 孙中山离加拿大赴日本横滨。
- 十·一(10·26) 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
- 九(10) 维新派于长沙设立时务学堂。
- 十·七(11·1) 山东巨野教案发生。
- 十·二十(11·14) 德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
- 十一·二十二(12·15) 沙俄舰队侵入旅顺湾，强占旅顺、大连。
- 十一(1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所著《孔子改制考》刊行。
- 十二·十三(1·5) 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粤学会。
- 夏粹(瑞)芳等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 一·三(1·24) 李鸿章、翁同龢等与康有为讨论变法事宜。
- 二·八(1·29)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
- 一·二十一(2·11) 英迫使清廷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与他国。
- 二·一(2·21) 谭嗣同等在长沙成立南学会。
- 二·十四(3·6) 清廷与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 三·六(3·27) 清廷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 二(3) 谭嗣同、康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
- 三·二十(4·10) 法强租广州湾，迫清政府宣布两广、云南不让与他国。
- 三·二十二(4·12) 保国会于北京成立。

- 闰三·二(4·22) 严复《天演论》出版。
日本迫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割让与他国。
- 闰三·十七(5·7) 沙俄与清廷订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 四·二十一(6·9) 清廷与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 四·二十三(6·11) 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 四·二十七(6·15) 慈禧太后迫光绪帝免翁同龢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
- 四·二十八(6·16)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 五·十三(7·1) 四川余栋臣再次发动反洋教起义。
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
- 五·十五(7·3) 诏立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
- 六·八(7·26) 《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 七·五(8·21) 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
- 七·二十(9·5) 光绪帝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 七·二十九(9·14) 光绪帝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以政变危机，速筹良策。
- 八·二(9·17) 光绪帝命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
- 八·三(9·18) 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企图借袁力以胁慈禧。
- 八·五(9·20) 袁世凯泄谭嗣同等密谋于荣禄。
- 八·六(9·21) 慈禧太后再出“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戊戌政变发生。
- 八·十三(9·28)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被杀。
- 八·二十五(10·10) 与英中英公司订立《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 十一·十一(12·23) 梁启超在日横浜创刊《清议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二(3) 山东义和团朱红灯起事。

三·二十八(5·7) 中俄订立《勘分旅大租界专条》及《辽东半岛租地专条》

四·九(5·18) 英、德与清廷签订《津镇铁路草合同》。

六·十三(7·20) 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

八·二(9·6)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九·十四(10·18) 朱红灯部与清军战于平原、恩县之间的森罗殿。

十·十四(11·16) 法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

十(11) 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集于香港，议定成立兴汉会，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十一·四(12·6)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军镇压义和团。

十一·二十二(12·24) 朱红灯等被杀。

十二·二十四(1900·1·24) 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皇储)准备废光绪帝。

本年秋 孙中山命陈少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次年1月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三·七(4·6) 英、美、德、法四国照会总理衙门，请于两月“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剿”。

三·十三(4·12) 山东部分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境内。

四·二十四(5·22) 义和团大败清军，取得涞水大捷。

四·二十九(5·27) 义和团毁长辛店铁路，次日又破坏丰台铁路的附属设施。

五·四(5·31) 英、美、法、俄、日、意水兵三百余人入北京使馆。

五·十四(6·10) 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二千人从天津向北京进攻，抵杨村

- 五·十五(6·11) 联军与义和团接战。自十七—二十二日,义和团在廊坊、杨村痛击联军。
- 五·十七(6·13) 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焚烧教堂。
- 五·二十一(6·17)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义和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
- 五·二十五(6·21) 清廷向各使馆下达宣战书。
- 五·二十九(6·25) 慈禧太后下令停攻使馆,派兵保护。
- 五·三十(6·26) 刘坤一、张之洞等派代表与各国领事会订《东南保护约款》。
- 六·三(6·29) 清廷命驻外国公使向各国解释清政府宣战出于被迫。
- 六·十(7·6) 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调集近十八万军队,分六路大举入侵中国东北。
- 六·十二(7·8) 清廷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向联军乞和。
- 六·十八(7·14)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
- 六·二十一—二十一(7·16—17) 沙俄先后制造海兰泡惨案及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 七(8) 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鄂、湘、皖、赣等省起义。
- 七·五(7·30) 沙俄占海拉尔、瑯春、三姓。
八国联军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
- 七·九(8·3) 沙俄军队占领哈尔滨。次日占领瑯瑯、营口。
八国联军占北仓。
- 七·二十(8·14) 八国联军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
- 七·二十八(8·22) 唐才常在汉口被捕牺牲。
- 闰八·十五(10·8) 兴中会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至22日失败。
- 闰八·二十四(10·17) 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使臣,和议开始。

- 九·四(10·26) 慈禧太后逃至西安
- 九·六(10·28) 史坚如响应惠州起义,在广州炸总督衙门,次日被捕后牺牲。
- 九·九(10·31) 沙俄军占锦州。
- 九·十七(11·8) 沙俄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 十·十九(12·10) 八国联军设立管理北京委员会。
- 十一·一(12·22) 八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
- 十一·六(12·27) 清廷照允十二条大纲。
- 十二·十(1901·1·29) 清廷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 三·三(4·21) 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
- 三·二十二(5·10) 秦力山、沈翔云等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
- 六·九(7·24) 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派奕劻总理事务。
- 七·二十五(9·7) 清廷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
- 八·二十四(10·6) 慈禧太后自西安启程回北京。
- 九·二十七(11·7) 李鸿章死,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 一·一(2·8)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 三·一(4·8) 中俄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
- 三·十六(4·23) 景廷宾在直隶巨鹿起义,提出“扫清灭洋”口号。
- 三·十九(4·26) 孙中山、章炳麟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为日警察所阻。
- 三(4) 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
- 十·十七(11·16) 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得中国教育会之助,成立爱国学社。

十一·十八 (12·17) 京师大学堂开学。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一·一 (1·29) 湖北留日学生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刊《湖北学生界》

三·二十一 (4·18) 沙俄向清廷提出新要求七项。

四·一 (4·27) 上海人民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新约

四·三 (4·29)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

四·六 (5·2) 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主持人蓝天蔚、黄兴等。

四·十五 5. 11 黄兴、陈天华、叶澜、秦毓璠、蔡锷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

四 (5) 邹容《革命军》出版于上海。

闰五·三 (6·27) 上海《苏报》发表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摘要，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闰五·五 (6·29) “苏报案”发生，章炳麟被捕。

闰五·七 (7·1) 邹容以“苏报案”事向英租界巡捕房自投入狱。

九·十六 (11·4) 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次年2月15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十一 (12) 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15日发行《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

十一·二十四 (1904·1·11) 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

十二·二十三 (1904.2.8) 日本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

秋至冬《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在上海出版。

光绪三十一年 (1904年)

五·二十 (7.3) 刘静庵、曹亚伯等于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

六·二十二 (8.3) 英军侵占西藏拉萨。

七·二十八 (9.7) 英军迫西藏签订英藏《拉萨条约》。

十 (11)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 一·十(2·15) 许雪秋等在潮州密谋起义,失败。
 - 一·二十(2·23) 刘师培、邓实等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
 - 二·二十九(4·3) 邹容病死上海西牢。
 - 四·七(5·10) 上海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响应。
 - 六·二十八(7·30) 孙中山等在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十七省代表参加。
 - 七·二十(8·20)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通过会章,举孙中山为总理。
 - 八·二十六(9·24) 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炸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吴樾牺牲。
 - 十·三十(11·26) 《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揭示“三民主义”。
 - 十一·二十六(12·22)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签订
- 本年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 二·三(2·25) 南昌群众毁教堂,毙法国传教士六人、英国传教士三人,即“南昌教案”。
- 一(2) 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日知会。
孙中山在新加坡创立同盟会分会。
- 七·十三(9·1) 清廷下诏准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开始。
- 十·十二(11·27) 《民报》在东京开周年纪念会到会六千人 孙中山及新出狱的章炳麟等发表演说。
- 十·十九(12·4) 同盟会组织萍、浏、醴起义。
- 冬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在东京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 三·八(4·20) 清政府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

- 四·十一(5·22) 潮州黄冈起义,旋失败。
- 四·二十二(6·2) 惠州七女湖起义,旋失败。
- 五·二十六(7·6) 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
- 六·五(7·14) 秋瑾响应徐锡麟,谋在浙江绍兴起义,事泄被捕,次日牺牲
- 七·二十四(9·1) 钦廉防城起义爆发,历时半月失败。
- 十·二十七(12·2) 镇南关起义爆发,历时七日失败。
- 十二·十(1908·1·13) 中、英、德《津浦铁路借款合同》签订。
- 本年 江浙两省开展收回沪杭甬铁路利权斗争,抵制英货
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成立。
-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1908 年)
- 一(2) 盛宣怀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在农工商部注册。
- 二·二十五(3·27) 钦廉上思起义,转战四十余日后失败。
- 三·二十九(4·29) 云南河口起义,历时1月失败。
- 六·二十八(7·26) 杨王鹏等在武昌成立军队同盟会,后改组为群治学社
- 八·一(8·27) 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 十·二十一(11·14) 光绪帝死,溥仪继位,改元宣统,以载沣为摄政王。
- 十·二十二(11·15) 慈禧太后死
- 十·二十六(11·19) 熊成基安庆起义。
- 十·三十八(1909·1·9) 清廷罢斥袁世凯。
- 本年 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广东、广西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 宣 统 元 年 (1909 年)
- 七·二十(9·4) 中日订立《间岛协约》。
- 八·十二(9·25) 詹天佑主持的京张铁路建成。
- 十·一(11·13) 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在苏州成立南社。

十一(12月中旬)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

十二·六(1910·1·16) 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第一次请愿

十二·二十(1910·1·30) 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后牺牲

宣统二年(1910年)

一·三(2·12) 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起义,次日失败。

一·二) 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会,推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

二·二十一(3·31) 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炸载沣,败露,被捕入狱。

四·八(5·16) 胡鄂公在保定成立共和会。

九·一(10·3) 清廷资政院行开院礼。

九·九(10·11)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

十·十二(11·13)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同盟会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广州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

一·一(1·30) 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文学社。

三·十(4·8) 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刺死署广州将军孚琦,温亦被捕遇害。

三·二十九(4·27) 黄兴等在广州起义,牺牲八十六人,由潘达微收得烈士遗骸七十二人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四·十(5·8) 清廷成立皇族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

四·十一(5·9)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四·二十二(5·20) 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代表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闰六·六(7·31) 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七·二十二(9·14) 武昌文学社、共进会组成统一起义领导机构,决定总动员计划。

- 八·四(9·25) 四川同盟会起义军占领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
- 八·十九(10·10) 武昌起义爆发
- 八·二十(10·11) 湖北军政府成立，推黎元洪为都督。
- 八·二十三(10·14) 清廷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 八·二十六(10·17) 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
- 九·一(10·22) 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占长沙，宣布湘独立；陕西新军、会党起义，占西安 25 日成立军政府。
- 九·六(10·27) 清廷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
- 九·九(10·30) 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
- 九·十(10·31) 江西新军起义，不久在南昌成立江西军政府。
湖南立宪党人发动政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举谭延闿为都督。
- 九·十一(11·1) 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 九·十三(11·3) 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任都督。
- 九·十四(11·4) 贵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军政府。
- 九·十五(11·5) 江苏独立，成立军政府。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 九·十七(11·7) 广西独立，成立军政府。
革命党人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杀。黎元洪致电各省，请派代表在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鄂州约法》公布。
- 九·十八(11·8) 安徽独立，成立军政府；福建新军起义，11 日成立军政府。
- 九·十九(11·9) 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
- 九·二十五(11·15) 已光复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 九·二十六(11·16) 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
- 十·四(11·24) 上海代表联合会决定赴武昌开会。
- 十·十(11·30) 各省代表在汉口开会，公举湖北军政府为中央政府。
- 十·十二(12·2)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重心由湖北转移到长江下游。
- 十·十四(12·4) 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元帅。
- 十·十八(12·8) 袁世凯派代表与民军议和。
- 十·十九(12·9) 各省军政府派代表与清方代表议和。
- 十·二十二(12·12) 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 十·二十七(12·17) 各省代表会议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 十·二十八(12·18) 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
- 十一·六(12·25) 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到达上海。
- 十一·十(12·29) 各省代表会议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 民国元年(1912年)
- 十一·十三(1·1) 孙中山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 十一·十五(1·3)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省代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 十一·十六(1·4) 章炳麟与张謇等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嗣发刊《大共和日报》。
- 十一·十八(1·6) 甘肃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
- 十一·二十三(1·11) 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陆军参谋长。
- 十一·二十六(1·14) 陶成章被刺死于上海。
- 十二·四(1·22) 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当即辞职，推袁为总统。

- 十二·十(1·28)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 十二·二十五(2·12)宣统帝下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 十二·二十六(2·13)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 一·二十二(3·10)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 三一四(5)河南宝丰白朗起义，并于1914年改称公民讨袁军。
- 七·十二(8·24)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赴北京。
- 七·十三(8·25)孙中山、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基础，合并其他党派，成立国民党。
- 九·二十九(11·7)中国政府声明不承认《俄蒙协定》。
- 民国二年(1913年)
- 二·十三(3·20)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
- 三·二十(4·26)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 四·二十(5·25)“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
- 六·九(7·12)李烈钧占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 六·十二(7·15)黄兴入南京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 八·一(9·1)南京被袁军攻破，江苏讨袁军失败。
- 八·十二(9·12)熊克武放弃重庆，二次革命失败。
- 九·七(10·6)袁世凯强迫召开国会，当选为正式总统。
- 十·七(11·4)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
- 十·十四(11·11)白朗进攻河南信阳。
- 十一·十八(12·15)袁世凯御用的政治会议开会篡夺国会职权。
- 十一·十九(12·16)袁世凯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江苏都督

民国三年(1914年)

- 十二·十五(1·10) 袁世凯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
- 四·七(5·1) 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 闰五·十六(7·8) 孙中山在日本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并于
9月1日公布宣言。
- 六·十五(8·6) 袁世凯政府宣布对欧战中立
- 七·十三(9·2) 日本对德宣战,派兵在中国山东半岛龙口登陆
- 九(10) 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轮船公司中国海员举行总同盟罢工。
- 九·二十(11·7) 日军侵占青岛。

民国四年(1915年)

- 十二·四(1·18)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阴谋灭亡中国。
- 三·二十六(5·9) 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
- 四·十二(5·25) 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使日置益签订草约。
- 四·二十五(6·7) 《中俄蒙协约》签字。
- 五·四(6·16) 袁世凯重申取缔排斥日货命令。
- 六·三十(8·10) 袁世凯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
- 七·十三(8·23)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成立
“筹安会”杨度、孙毓筠任正副会长 公开鼓吹帝制。
- 八·七(9·15)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
- 十·十四(11·20) “国民代表”投票结束,全体“赞成君主立宪”。
- 十·二十九(12·5) 陈其美受孙中山命在上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
炮轰上海制造局。
- 十一·五(12·11) 参议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世凯宣布承
受帝位 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
元年。

十一·十九(12·25) 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民国五年(1916年)

十一·二十六(1·1) 云南都督府成立，唐继尧任都督，并组成护国军总司令部，以蔡锷、李烈钧分别任第一、二军总司令

十二·二十三(1·27) 贵州宣布独立。

二·十二(3·15) 广西宣布独立。

二·一九(3·22)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

四·八(5·9)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

五·六(6·6) 袁世凯死。次日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

五·二十九(6·29)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六·七(7·6) 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

八·四(9·1) 《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

十·四(10·30) 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十·二(11·26) 上海江南造船厂全体工人千余人罢工。

民国六年(1917年)

十二·十六(1·9) 安徽督军张勋等及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会，提出修改约法、解散国会、改组内阁等主张。

一·十(2·1) 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

二·二十一(3·14) 北洋政府宣告与德国绝交。

四·三(5·23) 北洋政府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28日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四·二十三(6·12) 黎元洪解散参众两院。

四·二十五(6·14) 张勋率军自徐州抵北京，阴谋复辟。

五·一(6·19) 各省陆续通电取消脱离中央宣言。

五·十三(7·1) 张勋等拥宣统帝复辟。

五·十四(7·2) 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 五·十五(7·3) 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通电反对复辟
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率军讨伐张勋
- 五·十八(7·6) 孙中山为进行护法活动，偕廖仲恺、朱执信、章炳麟等人乘“海琛”号军舰自上海启程赴广东。17日到达广州。
- 五·二十四(7·12) 段祺瑞军人北京，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 14日黎元洪通电去职。
- 六·一(7·19) 孙中山在广州倡议召集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
- 六·十四(8·1) 冯国璋就任总统。
- 六·二十七(8·14) 北洋政府通告对德、奥两国宣战。
- 七·十五(9·1) 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 七·二十四(9·10)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宣告军政府成立。
- 八·二十二(10·7) 孙中山通电否认冯国璋、段祺瑞政府，并令进军北伐。
- 九·二十三(11·7)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 十·六(11·20) 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
- 十·十六(11·30) 冯国璋任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12月1日正式任命王为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民国七年(1918年)

- 二·十一(3·23) 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
- 二·二十九(4·1) 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挤孙中山。
- 三·八(4·18) 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成立新民学会。
- 三(4) 直系吴佩孚军攻占长沙、衡山。
- 三·二十四(5·4) 孙中山向广东非常国会辞大元帅职。
- 四·十二(5·21) 孙中山离广州赴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北京大学等大专学校学生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废

除中日军事协定。

七·二十六(9·1) 北京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非常国会在广州否认选举有效。10月10日徐世昌在北京就任。

十·八(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十·十三(11·16) 徐世昌宣布停战令。22日广州军政府亦通令停战。

十一·二十(12·22) 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刊《每周评论》。

十一·二十八(12·30) 《孙文学说》完成 是日自序。

民国八年(1919年)

十二·十七(1·18) 巴黎和会开幕。

十二·二十(1·21) 北洋政府派陆徵祥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三·一(4·1) 中国代表抗议巴黎和会三国会议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

四·五(5.4) 北京学生三千余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清帝世系表

清帝姓名	年号	起迄年代	庙号	谥号	陵名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天命	天命元年—天命十一年 (公元 1616 年—1626 年)	太祖	高帝	福陵
爱新觉罗·皇太极	天聪	天聪元年—天聪九年 (公元 1627 年—1635 年)	太宗	文帝	昭陵
	崇德	崇德元年—崇德八年 (公元 1636 年—1643 年)			
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	顺治元年—顺治十八年 (公元 1644 年—1661 年)	世祖	章帝	孝陵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	康熙元年—康熙六十一年 (公元 1662 年—1772 年)	圣祖	仁帝	景陵
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	雍正元年—雍正十三年 (公元 1723 年—1735 年)	世宗	宪帝	泰陵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	乾隆元年—乾隆六十年 (公元 1736 年—1795 年)	高宗	纯帝	裕陵
爱新觉罗·颙琰	嘉庆	嘉庆元年—嘉庆二十五年 (公元 1796 年—1820 年)	仁宗	睿帝	昌陵
爱新觉罗·旻宁	道光	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 (公元 1821 年—1850 年)	宣宗	成帝	慕陵
爱新觉罗·奕訢	咸丰	咸丰元年—咸丰十一年 (公元 1851 年—1861 年)	文宗	显帝	定陵
爱新觉罗·载淳	同治	同治元年—同治十三年 (公元 1862 年—1874 年)	程宗	毅帝	惠陵
爱新觉罗·载活	光绪	光绪元年—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 1875 年—1908 年)	德宗	景帝	崇陵
爱新觉罗·溥仪	宣统	宣统元年—宣统三年 (公元 1909 年—1911 年)			